全球化
GLOBALIZATION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之鑫　朱　民
李　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　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　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　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月刊）

刊名题字　曾培炎

全球化 2018 年第 10 期（总第 87 期）

·本刊专论·

“九五”“十五”计划的编制、实施过程及主要成就

曹文炼　张力炜（005）

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的成功经验　霍建国（02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的变化

姜长云　刘振中（036）

·国际经济·

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与新时代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杨丹辉（062）

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助推服务业开放新格局　朱福林（07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分析

于　倩　侯玉山（089）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宏观经济·

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的评估、原因与对策

张焕波　孙晓涛　郭迎锋（104）

·权威观点·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8）

·国际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5）

Maiook 麦格网
电子阅读　扫一扫

CONTENTS

The compi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Ninth and Tenth Five-Year Plans *Cao Wenlian and Zhang Liwei* (005)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Huo Jianguo* (025)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status and func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ng Changyun and Liu Zhenzhong* (036)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China's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ew era *Yang Danhui* (062)

China's undertaki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service outsourcing promotes the new pattern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up *Zhu Fulin* (074)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Yu Qian and Hou Yushan* (089)

The evaluation,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ssue of China's economy leaving real for virtual *Zhang Huanbo, Sun Xiaotao and Guo Yingfeng* (104)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本刊专论·

“九五”“十五”计划的编制、实施过程及主要成就*

曹文炼　张力炜

摘要：“九五”计划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变化的新特点。“十五”计划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WTO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十五”计划，是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实施阶段，也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阶段。总结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旨在以史鉴今，为未来改革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九五计划　十五计划　计划编制　计划实施

作者简介：曹文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张力炜，国家发展改革委培训中心原处长。

一、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九五”计划（1996—2000年）开始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我国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对我国经济建设比较有利。冷战结束以后，

* 我国自1953年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

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跨国公司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都已完成或超额完成，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从 1995 年开始，我国商品供求总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比重逐年上升，供不应求的商品比重逐年下降。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

（一）“九五”计划编制过程和主要特点

从“九五”开始，我国五年计划编制程序越来越走向规范化。国家计委首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进行编制计划的前期调研，在此基础上起草五年计划《基本思路》《纲要》框架和《纲要》草案。其间，由中共中央起草小组负责提出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简称《建议》），《建议》经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在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建议的要求和精神，具体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纲要》进一步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方方面面要求，最后再经过全国人大通过。“九五”计划编制的时间也有明确规定，在前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半时开始编制，到计划通过前一年的 2 月份开始起草《建议》，10 月份通过《建议》；最后，到新的计划期第一年的 3 月份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计划纲要。

“九五”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决定了其性质、内容和编制方法都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中长期计划。时任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指出：在计划的性质和作用上，计划要以市场为基础，使市场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计划要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计划指标总体上应该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在计划的内容上，一要根据新时期的任务和要求，充分体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三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四要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编制计划的方法上，更加强调科学性和民主性。重视解决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新的中长期规划的特点。

“九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为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1993 年 3 月，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及编制与之相关的计划的决定。当年夏天，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按照中央部署，开始着手进行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那段时间，仅国家计委机关就展开对 22 个重大专题

的研究，形成了上百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提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基本思路。另外，国家计委还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部分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以及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专家、学者，对“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若干指标，特别是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货币供应和信贷收支、国际收支、人民生活和就业、物价水平、主要产业发展等指标反复测算，运用多种数学模型进行方案的分析比较，筛选出各项指标的最佳组合，初步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发展任务的设想。

1995年3月8日，中共中央《建议》起草小组正式成立。为使《建议》的提出与《计划》的编制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科学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批准，在文件起草的同时，组织有关政府部门继续集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深入调查研究。3月14日，由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农业部、人民银行、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派出人员组成了15个专题研究组，深入到各地、各部门，广泛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内容包括：

（1）提出全国人民生活实现“小康”的具体标准和主要措施；（2）如何加强农业，实现全国粮食产量登上一万亿斤新台阶，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的政策措施，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步骤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途径，真正做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较快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4）如何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造、改组结合起来，培育一批技、工、贸一体化的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进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5）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提出“九五”期间“重建财政”的设想，合理调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以及居民内部的分配关系；（6）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技术先进、规模经济的原则，研究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培育支柱产业及军转民等发展规划；（7）研究加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更加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8）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后，如何保持港澳繁荣和稳定，使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9）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如何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10）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提高全民族素质，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控制人口、保障就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

1995年4月下旬，起草小组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拟定出《建议》的送审提纲，共分为六部分，框架内容涉及七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经验；

二是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些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三是“九五”期间和到 2010 年的奋斗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四是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重点；五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六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七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

在《建议》稿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的同时，起草小组还先后召开了四次座谈会，邀请一些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老同志和经济界的专家学者，对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与会者就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搞好国有企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其中许多意见和建议都被《建议》采纳和吸收。

1995 年 8 月中旬，为了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中央决定将《建议》稿印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委和解放军各大单位征求意见。8 月 31 日，遵照党中央在重大问题上都事先同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的一贯做法，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准备提交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的《建议》稿，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同一天，李鹏总理也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到中南海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收到各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共 139 份，小组成员逐条研究，并根据这些意见对《建议》稿作了 200 多处修改。

1995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随后，“九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正式起草《纲要》的阶段。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组成了《纲要》起草小组，小组成员由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

1995 年 10 月 31 日，国务院总理召集文件起草小组开会，部署《纲要》起草工作，要求根据中央《建议》的精神，突出《纲要》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计划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充分体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不要过多安排具体项目。要回答今后 15 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粮食稳定增长、国有企业改革、地区经济发展等，要有明确的政策措施。12 月中旬，起草小组在就《纲要》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后，初步形成了《纲要》草稿。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全国政协及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区市分别对草稿进行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1995 年 12 月底和 1996 年 1 月初，总理办公会议和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议对《纲要》的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党中央由总书记主持会议，多次讨论、审议。2 月 26 日，经过九易其稿，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将《纲要》提交全国

人大审议。陈锦华认为："这次《纲要》制定工作的范围之广，参与人员之多，是我国历次计划编制工作所没有的。"① 专家、学者通过参与前期研究来参与"九五"计划政策咨询，这表明我国计划工作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编制计划中，还委托世界银行组织一批专家对一些专题提供咨询意见。

1996 年 3 月 17 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次人大会议批准的《纲要》，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时期，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对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制定出的宏伟蓝图。"九五"计划的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 2000 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粮食总产量要保证达到 4900 亿公斤，力争达到 5000 亿公斤。"九五"以至今后 15 年，要集中必要的力量，在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工业方面，建设一批大型工程，包括：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山西、陕西、内蒙古煤炭基地，南昆铁路、南疆铁路和神黄铁路，公路国道主干线，通讯光纤干线网络，以及一批大型港口、机场等，使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根据市场需求，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和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九五"期间的宏观调控目标为：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为 30%，物价上涨幅度明显降低，努力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

关于"九五"的经济增长速度，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九五'经济增长速度按 8%左右安排，比'八五'的速度低一些。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要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把目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下来；二是要为深化改革创造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三是把经济工作的重点从偏重追求速度转到注重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上来。"②

"九五"计划最突出的特点是：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九五"计划的调整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1997 年 7 月，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使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造成不小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与国内一系列问题叠加在一起，

①参阅：1996 年 3 月 8 日国家计委主任答中外记者问。

②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6 页。

使我国经济发展受阻，外贸出口增幅从 1996 年的 20%猛跌至 0.5%，利用外资额也跌至 20 年来的最低点；到 1998 年上半年，国内消费品零售市场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产能过剩在随后的几年中呈加剧的态势，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1997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降到 2.8%，1998 年和 1999 年均为负增长（下降 0.8%和 1.4%），呈现通货紧缩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也从 1997 年 9.2%，分别降到 1998 年的 7.8%和 1999 年的 7.6%。经济趋冷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企业开工不足，工业经济下滑，投资减速，消费乏力，失业增加等，给中央决策层带来新的挑战。

国际投机势力借机发动了对于香港股市和港币汇率的进攻。中央提出，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并对香港特区政府给予了全力支持。在 10 个交易日中，香港特区政府约运用相当于 1200 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上拉 1169 点。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特区政府最终获得全胜。①

1998 年 3 月 19 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本届政府的任务概括起来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 8%，通货膨胀率小于 3%，人民币不能贬值。"三个到位"，一是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确定在三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

1998 年 3 月，曾培炎任国家计委主任，他到任后面临的使命就是扩大内需，提振经济。当时，如何扩大内需是让国家计委"焦头烂额的事"。此时，国家计委和财政部都分别向国务院主要领导建议发行特别国债筹集建设资金。国家计委的报告建议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六个领域：第一，农村电网改造；第二，高速公路建设；第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扩大大学招生；第五，国家粮库建设；第六，长江干堤加固。

针对内需不足、外需下滑、经济增长乏力的新情况，中央当机立断作出批复，决定对"九五"计划作出重要调整，即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由"九五"初期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预算赤字，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加大政府支出，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1998 年增发 10 年期建设国债 1000 亿元，银行配套增加 1000 亿元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强调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不生产积压产品，不搞重复建设。基础性建设要有总体规划，注意合理布局，充分发挥

①吕平：《香港金融保卫战》，《南风窗》1998 年 11 月。

现有设施潜力，加快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不能盲目铺新摊子，原则上不新上一般工业项目。

曾培炎主任根据中央指示，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和各地方计委的同志，将高速公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等六个投资方向的资金分配下去，项目也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决策快，行动也快。1998 年，全国新增高速公路 1741 公里，通车总里程达 8733 公里，跃居世界第六；至 1999 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 11650 公里，跃居世界第三；2000 年底，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1．9 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中国创造了世界罕见的高速公路建设奇迹。

国家在发行长期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采取了降低存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也从 1998 年开始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这同之后开始的节假日“黄金周”等措施一起，发挥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999 年初，为了刺激投资需求，中央决定在 1998 年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再增发 500 亿元长期国债，继续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这年中，由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十分严峻，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双下降；1999 年上半年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了 7.6 个百分点。当年 6 月，中央决定再增发 600 亿元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更加重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决定从 1999 年 7 月 1 日起，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水平、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社会保障“三条线”标准）提高 30%；增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月人均基本工资提高 30%）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适当提高了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一次性补发了 1999 年 6 月底前各地拖欠的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提高了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等。采取上述措施，国家财政共支出 540 亿元，使全国 8400 多万人受益。这期间，中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实现三年脱困；同时深化金融、投融资、粮食流通、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等改革，推进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由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宏观政策调整的共同作用，终于阻止了经济增长率的继续下滑，2000 年回升到 8.4%。

除了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国家计委还提出鼓励发展民间投资的政策建议。当时全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只有 7%，而浙江省的投资增长速度却有 30%多，尤其是台州市温岭县更高，主要是民间投资。2000 年年初，曾培炎主任带着国家计委的一些司长们，先后到浙江省温州、台州、宁波等地调研如何扩大民间投资，回来后组织起草了一个鼓励民间投资的 13 条政策文件，第一次提出对民间投资要同国有投资一视同

仁；要在税收政策、信贷支持、项目审批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13 条”以国家计委的红头文件下发，通过鼓励民间投资启动经济，产生了好的作用。

（三）“九五”计划的实施和主要成就

“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总量跃上新的台阶。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8.3%，远高于世界平均 3.8%的增速。2000 年我国 GDP 达到 8.94 万亿元，按当年汇率折合成美元，突破 1 万亿美元。按照当年 12.7 亿人口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50 美元，进入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九五”期间也是国家财力增长最多的一个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6.5%，五年累计超过 5 万亿元，比“八五”时期增加了 1.3 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有较大提高，位居世界前列。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粮食年生产能力达到 1 万亿斤左右的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工业淘汰落后和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取得成效。电子、信息等一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产业稳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显著，“瓶颈”制约得到了较大缓解。区域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1999 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九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基本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2000 年，进出口总额达 4743 亿美元，其中出口 2492 亿美元，这两项指标分别比 1995 年增长了 69%和 67%。出口商品结构改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提高。对外开放领域逐步扩大，投资环境继续改善。吸收外资规模增大、质量提高。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2894 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了 79.6%。2000 年底，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1656 亿美元，比 1995 年底增加了 920 亿美元。随着“九五”计划的完成，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实施“十五”计划，开始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九五”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许多新突破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我国在“九五”期间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改革不再是单兵突进，而是重点突出，综合配套，全面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大支柱，改革在这些方面都有重要进展。

1．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九五”期间是国企改革和调整措施出台最多的五年。大多数国家重点企业都是通过实行公司制改造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境内或境外上市。政府采取债

转股、降低利率、技术改造贴息贷款等措施，减轻了企业负担；此外，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重组，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为扩大内需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更是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了这些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国有企业活力明显增强。据统计，2000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2392 亿元，为 1997 年的 2.9 倍，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在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民营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

2. 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2002 年 4 月 28 日，曾培炎在他主编的《领导干部宏观经济管理知识读本》的首发式上，以“提高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为题发表讲话，指出“在‘九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先是采取各种综合治理措施，迅速扭转了高通胀局面，国民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以后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制定积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增加投资与调整收入分配、启动消费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结合起来，把扩大经济总量与加快结构整合结合起来，使得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们不仅积累了有效治理需求过热和通货膨胀的经验，而且逐步积累了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趋势和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经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①

“九五”时期，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只有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才能逐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价格持续下降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有所降低。从 1998 年底开始，中央政府在进行下年度计划工作安排时明确提出：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是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国内市场。1998 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 1999 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

①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5 页。

保障。

三是推进计划、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手段，较好地发挥了计划、财政、金融等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作用。1998 年，金融体制改革步幅加快。例如，在贷款规模管理方面，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在存款准备金制度建设方面，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两个账户合二为一；在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方面，为了摆脱地方、部门的干预，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人民银行撤销了省级分行，设立了 9 个跨行政区分行。这些改革对于更有效地发挥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保证。

四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政府机构改革。1998 年，我国政府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机构改革。3 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由国务院批准下达的国家计委“三定”方案，对国家计委的职能、机构、人员编制作了较大的调整。这次机构改革方案加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强调能够由市场解决问题的，尽可能交给市场，计划管理逐步由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管理为主。新的“三定”方案，将大量的工业和运输生产计划指标改为预测性指标。为了更好地利用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出口，调节进口，新方案取消了一部分进口商品的配额，转由市场配置。另外，新方案还进一步减少了由政府直接制定价格的品种和范围，将形成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改为主要由市场决定。

这次机构调整，将国家计委机关行政编制由原来的 1119 人减少为 590 人，减少了 47.3%；合并重组了一些司，内设机构由原来的 24 个职能司局和 6 个办公室（如三线办、国民经济动员办、核电办等），压缩为 19 个，减少了 20.8%；在职能上，有 7 项划了出去，4 项划了进来，还有 6 项原有职能进行了转变。机构改革后，国家计委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提出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目标和政策，搞好宏观经济的预测和预警；制定价格政策，监督价格政策的执行；安排国家拨款建设项目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确定政策性金融的使用方向；统一管理国家的粮食和战略物资储备。曾培炎主任说：“这些职能都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关系经济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①

五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显加快。“九五”期间，我国在城镇中努力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统一，即

①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96 页。

统一了职工个人账户规模，统一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统一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计发办法。养老金发放逐步走向社会化，越来越多的离退休人员不再是去原企业，而是到银行、邮局领取养老金，劳动者正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会化管理已经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到 1999 年 6 月底，全国除海南、西藏外，均实行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职工达到 7194．62 万人，建账率 78．46%。截至 2000 年 6 月，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达到 9854 万人，离退休人员 3057 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规范工作也在稳妥进行。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76%的乡镇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参保人口达到 8000 万人。

“九五”期间，失业保险更大范围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到 2000 年 6 月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 9929．2 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 73．7%。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也大幅度增长，2000 年上半年共收入 63．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 15．7 亿元。“九五”期间，提出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即“两个确保”），是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1998 年、1999 年两年，9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领到了基本生活费，98%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按时足额领到了养老金，同时补发了历史拖欠 160 多亿元。

备受老百姓关注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也在这一期间积极推进。省级规划已全部出台，90%的地市制定了实施方案，143 个统筹地区进入组织实施阶段，覆盖总人数为 1396 万人。关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配套文件也已出齐，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政策框架体系基本形成。

综上所述，我国在“九五”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来之不易，充分体现了中央驾驭宏观经济全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领导能力，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怕困难、锐意奋进的伟大精神。

二、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2000 年，我国圆满完成了第九个五年计划，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都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人均 GDP 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并存。各主要国家都在制定面向新世纪的战略，力图抢占科技、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在竞争中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分析和判断，中央提出：“制定‘十五’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

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①

（一）“十五”计划编制过程

“十五”计划（2001—2005 年）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编制“十五”计划前后经历了 3 年，共积累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参与起草计划的专家涵盖了各个主要领域。

自 1998 年 6 月起，国家计委组织委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开始进行编制“十五”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具体包括：进行基础调查、信息搜集、课题研究以及纳入计划重大项目的论证等。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配合“十五”计划前期研究工作，组织了《21 世纪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研究》的课题研究，1999 年 3 月完成了课题总报告和 20 个专题报告，涉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消费增长潜力与消费调控目标选择、交通运输发展与改革、能源发展战略及政策、投资规模及投资资金来源预测、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就业形势分析及对策等诸多重大问题。

1999 年 6 月 22 日，国家计委召开全国“十五”计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以《研究制定好新世纪第一个中长期计划》为题，提出关于制定“十五”计划工作的五项原则和三点要求。他指出，研究“十五”计划，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十五”计划编制工作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一是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面对 21 世纪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我国资源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如果仍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来追求高增长的老路是没有前途的。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做到使中长期规划依靠市场、反映市场、引导市场、调控市场。所谓依靠市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应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都要进一步放开放活，突出中长期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反映市场，就是要研究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市场为导向，合理确定发展思路，调整发展战略；引导市场，就是要通过规划，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调控市场，就是通过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三是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四是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制定全国

①刘国光等编著：《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1～663 页。

“十五”计划时，要把加快西部开发这一发展战略充分考虑进去。“十五”期间，中央将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扶植力度，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优先安排水利、电力、交通、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项目。五是继续贯彻执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并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拓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开放型经济。

为了做好“十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曾培炎还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理清思路，突出重点。他说：“编制规划前不急于算账、找项目，而是先理清思路，这是编制最近几个中长期规划的基本做法。从实践来看，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编制‘十五’计划时仍要坚持。”第二，要立足当前，考虑长远。如何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是编制“十五”计划的出发点。但是中长期规划不能局限在解决短期问题上，不能因为短期问题而忽视了对长期问题的战略性考虑，要从解决当前问题出发，分析研究其变动趋势，从中提炼出一些长期性、全局性、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中长期规划的重点。第三，要转变观念，更新方法。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变过去规划编制中重国内、轻国际、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缺乏统一考虑的思想方法；改变政府包办一切，“包打天下”的思想方法；改进确定目标、测算速度的思想方法。对于这一点，曾培炎指出，有些地区在编制规划时，先是设定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口号，如规划期内，“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经济强省”“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然后确定要有多高的速度，再确定一、二、三产业各增长多少，等等。这样推算出来的速度恐怕很难符合实际。最后，他提出，在“十五”计划编制中，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提高规划编制过程的社会参与度，增加透明度。①

时任国家计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杨伟民在他撰写的《关于“十五”规划编制方法和程序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十五”计划就其性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导性计划，这类计划主要是在那些市场机制基本可以有效发挥作用，无需政府过多干预的领域。编制这类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对发展环境、市场需求、发展态势的分析预测和展望，阐明政府意图，引导资源配置方向，供市场主体决策参考，起到间接影响企业决策的作用。实施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第二类是政府组织落实的计划。这类计划主要集中在政府若不通过编制计划进行必要的扶植或支持，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会产生“市场失败”，或市场机制难以做好，易造成盲目重复建设的领域。编制这类计划的目的是，在特定行业或领域，明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①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4～239 页。

克服政府干预的随意性，统筹重大建设项目及布局、资金来源等。其作用既是约束企业的，更是约束政府自身。公益事业、基础设施，高科技以及关系全局的关键环节和薄弱领域应编制此类计划，比如生态环境、防洪设施及水资源开发、铁路主干网、城乡电网、科技、教育、国防工业等。①

1999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确定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议题将研究“十五”计划，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起草小组，成员包括中央财经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经济、社会科学、科技等各领域的专家，共约 40 人。为了能够制定一个适应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的五年计划，中央起草小组历时近 10 个月，先后到 6 个省市、180 多个单位听取了意见，组织的专题调查内容包括：科技、环境保护、对外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

2000 年 4 月 4 日，曾培炎同志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专题汇报。提出“十五”期间，西部地区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中部地区要在农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把潜在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市场优势。东部地区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得到较大发展，把国内竞争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其中，关于西部开发的初步设想是，选择现有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欧亚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西南出海通道，促进西陇海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昆贵经济带的形成，在这些交通干线上重点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地区发展。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带动一些口岸城镇发展。选择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优势资源、特色经济、科技教育等主要方面，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领域，实施一些对西部开发全局具有关键作用的标志性工程。②

关于制定“十五”计划应该以什么作为主线，中央在听取各方面意见时，曾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各种问题的核心，因此，编制“十五”计划应该围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展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归结起来是体制瓶颈和技术瓶颈的制约，因此，“十五”计划应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线。经过讨论、研究，最终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即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十五”计划的主线。③ 2000 年 9 月，朱镕基总理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

①杨伟民：《关于“十五”规划编制方法和程序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1999 年第 12 期。

②曾培炎：《曾培炎谈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09 页。

③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7 页。

社长洪锡炫采访时说："中国的'十五'计划，主要是为实现中国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开好局。最主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最主要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先进科技的发展来实现。中国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发展以信息为中心的高科技，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走到尽头了。"①

2000 年 10 月 11 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简称《建议》）。全会指出，制定"十五"计划，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这成为制定"十五"计划纲要的重要指导方针。中央的这个建议是"十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十五大结束后不久，国家计委即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建议》进行具体细化。10 月 23 日，政府公开吁请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为"十五"计划献计献策，鼓励公众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过程，以提高计划制定的透明度。国家计委主要领导专门听取了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老同志、经济学家、两院院士、科学家、企业家对《"十五"计划思路》的意见。经国务院批准，还聘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了"十五"计划咨询审议会，对"十五"计划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审议，提出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机械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学者都参加了前期研究工作，形成了 500 万字的研究成果。此外，还在互联网上开辟网页，吸收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86 岁，最小的只有 10 岁。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说，这是中国首次在制定五年计划时交付全民讨论，群众参与的深度、广度和范围都是空前的。截止到 2001 年 1 月 31 日，国家计委和《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经济导报》等新闻单位共收到社会各届来信和电子邮件 1.7 万多封，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十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些已经体现在"十五"计划纲要中。"十五"计划纲要前后修改了 20 稿，内部稿更是数不胜数，总共收集到 1800 多条修改意见，最后共做出了 230 条修改。②

如前所述，自编制"七五"计划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地方、部门、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等有关各方面，专家开始通过参加座谈会形式参与政策咨询。"九五"以后，专家进一步通过参与前期研究来参与政策咨询；"十五"正式成立了专家审议会。这表明，我国计划决策程序的制度化、民主

①朱镕基：《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3 页。

②佚名：《"十五"计划纲要起草制定内幕》，《北京晚报》2001 年 3 月 5 日；国家计委发展规划司编：《"十五"计划公众建议选编》；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1 页。

化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这次制定“十五”计划纲要，政府还听取了国际组织的意见。1999 年初，世界银行受国家计委的委托，写出《中国的中期转轨问题：“十五”计划若干经济发展问题的框架文件》，为中国“十五”计划和 2015 年远景规划提供了政策建议。这份框架文件涵盖了 47 个专题研究，如农业生产、农业研究、清洁煤技术、经济法改革、教育战略、能源利用与环境、经济增长、金融部门改革、财政改革与财政分权、脆弱的土地资源管理、天然气开发、粮食政策、医疗保健、收入不平等、工业污染控制、知识管理、可再生能源、农村贫困、交通、城镇化、水资源管理等。

2001 年 2 月 6 日，朱镕基总理在北京主持座谈会，听取了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对“十五”纲要的意见和建议。两院院士石元春在 8 分钟的发言时间里，主要就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资源保护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建议，提出要在农村扶持龙头企业、促进农业科技产业发展、把水资源保护放在第一位、注意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等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2001 年 3 月 5 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和委员们听取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并且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反复对纲要报告进行推敲和修改，一共修改了 40 处，其中涉及内容比较重要的改动有 23 处。3 月 15 日，朱镕基向大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纲要报告修改说明，对已经采纳的意见逐条列出修改的具体内容，对未采纳的意见也说明了理由。同一天，代表大会批准了计划纲要和朱镕基总理关于计划纲要的报告。

（二）“十五”计划的主要目标

“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主要宏观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 7%左右。按 2000 年价格计算，2005 年的 GDP 将达到 12.5 万亿元左右，人均 GDP 将达到 9400 元。“十五”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 40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左右。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预期目标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增强。2005 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分别为 13%、51%和 36%，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分别为 44%、23%和 33%。科技、教育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2005 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将提高到 1.5%以上；初中毛入学率将达到 90%以上，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力争将达到 60%左右和 15%。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9‰以内，2005 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 13.3 亿人以内；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8.2%，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城乡环境质量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比2000年减少10%。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十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加到22平方米，全国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40%。城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农村医疗服务设施继续改善，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关于"十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定为7%左右，朱镕基指出："这个速度虽然比'九五'实际达到的速度低一点，但仍然是一个较高的速度。要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付出艰巨努力。同时，由于国际国内都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计划的预期目标要留有余地。"①

（三）"十五"计划的特点

"十五"计划与过去的五年计划相比，具有以下三个不同的特点：一是"十五"计划具有明显的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指导性，是粗线条的计划，强调对全社会经济活动起导向性作用。为此，"十五"计划《纲要》减少了实物指标，增加了反映结构变化的预期指标。"十五"计划的实物指标从"九五"计划的100多个减少到38个，是"九五"计划各项指标的1/3。《纲要》提出的产业发展方向是对市场主体的指导性意见，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等手段加以引导；另外，政府配置资源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努力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十五"计划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等。三是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政府为实现这一发展战略，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因此，"十五"计划突出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发展理念。

（四）"十五"计划的实施和主要成就

我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末的回落和调整之后，进入新世纪开始回升。"十五"计划的实施总体上比较顺利。"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特别是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扩大对外开放的红利逐步释放，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迅速发展，有力带动了国内经济加快发展。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GDP达到12.5万亿元，增长速度

①朱德宏：《历史的跨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2页。

达到 9.5%，超过了计划预期 7%的目标，实现了地区平均 9%以上的预期目标；粮食总产量达 9680 亿公斤，比 2000 年增产 427 亿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 2000 年提高了 2.37 倍，年均增长 27.5%；财政收入大幅增加，2005 年比 2000 年增加 18233 亿元，年均增长 18.7%；国际收支基本平衡，2005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14221 亿美元，是 2000 年的 3 倍，年均增长 24.6%，创下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的最高纪录，世界排位从 2000 年的第八位上升到第三位。“十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成绩显著，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 2741 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 4200 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 4000 万人；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5 年农村贫困人口比 2000 年减少了 844 万人；2005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为 9.6%和 5.3%，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卫生、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步伐加快。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首次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并顺利返回，成为世界上第 3 个能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我国自 2000 年底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五年努力，取得了重要进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重要突破口，“十五”期间新开工的重大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等工程达 60 项，投资总规模约 8500 亿元，其中有 23 项工程建成投产。如青藏铁路线下工程完成 95%，西气东输工程于 2004 年底全线投入商业运营，西电东送工程向广东新增 1000 万千瓦送电能力的任务也提前完成。江河上游水利枢纽、公路主干线建设全面展开。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 2.88 亿亩，退牧还草工程治理草原 1.9 亿亩。五年来，在西部大开发中，一手抓关系西部全局的重大工程，一手抓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中小项目，使各族群众不断得到实惠。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基本实现，县际公路、农村饮水、农村能源、生态移民等工程积极推进，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攻坚计划开始实施，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得到加强。[①] 2005 年 2 月 4 日，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发五周年座谈会，根据当时的初步统计，2000 年至 2004 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投资增长 20%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9.5%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4%左右。

“十五”期间，我国新建公路 35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2.4 万公里（超过 2000 年以前的高速公路长度总和），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7063 公里，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 45232 万吨。一批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发挥效

①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63～764 页。

益。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实现全线商业运营；青藏铁路全线铺通，结束了西藏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三峡工程进展顺利，电站工程已投产运行 14 台发电机组，累计发电 940 亿千瓦时；西电东送北通道、中通道、南通道共形成输送能力超过 3250 万千瓦。2005 年末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5 亿千瓦，比 2000 年末增加 1.8 亿千瓦。五年新增局用交换机容量 23254 万门，新增光缆线路长度 214 万公里。产业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十五”计划各主要目标的顺利实现，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计划期间，政府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十一五”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计划提出的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显著。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我们办了一些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办的大事、好事。”2002 年 12 月 13 日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总理对国家计委的工作做了重要批示：“近几年来，国家计划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在贯彻扩大内需方针，管好用好国债投资方面，与各部门、各地方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过，“十五”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滞后，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较多。从 2004 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趋势，尽管中央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的措施，潜伏的风险仍在积累。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指出，“十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基本上依然是粗放型的增长。具体通过以下两个指标加以说明：一是我国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率/GDP 增长率）20 世纪 80 年代为 0.44，90 年代为 0.24，2001—2004 年为 1.09，2004 年为 1.59。能源弹性系数的攀升，说明“十五”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增加物质消耗换来的。二是投资弹性系数（投资实际增长率/GDP 增长率）“八五”期间为 1.8，“九五”期间为 1.07，2001—2004 年为 2.24。这一方面说明 GDP 增长过多地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说明投资率下降。曾培炎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时说：“‘九五’计划时期，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两个根本性转变’。‘十五’计划时期，又提出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但直到目前，转变和调整的实际效果还不明显。究其根源，主要障碍就是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在粗放型增长的背后，存在着盲目追求速度的攀比机制，不计经济效益的政府行为，难以追究失误职责的投资体制，借钱可以不还的融资体系，没有反映资

源环境真实代价的运行机制，等等。”他指出，“不改体制，不动机制，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①

“十五”期间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的最突出成就，就是中国加入了 WTO。“十五”期间的 2003 年春，我国还经历过一次突发事件，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一种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 SARS）的新型传染病从广东迅速向全国蔓延，其传播速度让人始料未及。我国通过全国上下通力解决 SARS 疫情的过程，为建立有效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积累了经验教训，中央和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重要性，从此国家在各级政府建立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

“十五”计划实施期间，2003 年政府换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原国家体改委（1998 年政府换届更名为国务院体改办）的职能并入，从此，新组建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起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职能。

参考文献：

1. 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2. 吕平：《香港金融保卫战》，《南风窗》1998 年第 11 期。
3. 刘国光等编著：《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4. 杨伟民：《关于“十五”规划编制方法和程序的思考》，《宏观经济研究》1999 年第 12 期。
5. 朱镕基：《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6. 佚名：《“十五”计划纲要起草制定内幕》，《北京晚报》2001 年 3 月 5 日。
7. 朱德宏：《历史的跨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8. 陈锦华：《国家计委 1995 年工作重点》，《宏观经济管理》1995 年合订本。
9. 郑新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施新发展战略的核心》，《经济改革与发展》1995 年第 7 期。
10. 佚名：《“九五”这五年——访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中新社，2000 年 9 月 20 日。
11. 郑新立：《我在国家计委的 13 年（1987～2000 年）》，《中国经济时报》2013 年 9 月 12 日。
12. 朱镕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恰到好处》，中国网，2002 年 3 月 15 日。
13. 佚名：《我的意见写进了报告》，《人民日报》2001 年 3 月 6 日。
14. 房维中著：《房维中文集》，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9 年版。

责任编辑：谷　岳

①曾培炎：《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4 页。

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的成功经验

霍建国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中国不断深度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的历程是分不开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恢复了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和往来，世界银行的有关代表曾多次访华并同中国高层领导和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频繁沟通，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方法和路径，对推动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进程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漫长的谈判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优异表现，形成了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开放成功发展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多边合作　区域开放　一带一路　贸易强国

作者简介：霍建国，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要求，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开放发展的新阶段。总结中国参与多边国际组织的主要历程、成功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国际多双边合作中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未来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中的政策定位和路径选择，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走向高水平开放进程，推动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发挥中国的智慧和影响力。

一、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主要经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通过参与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通过构建金砖机制和上合机制以及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营造了经济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也锻炼提高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回顾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的历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与 WTO 多边贸易体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一度中断。随着改革开放及经济的发展，1980 年中国先后恢复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关系。

不同的是，即便中国争取到以“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方式重续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关系，但依然需要与缔约方谈判新的税率和其他减让。因此，中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复关/入世谈判历程。① 同时，也正是由于谈判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调整对外经贸政策，不断地深化改革开放，一步步完成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及转变，并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为中国入世后运用规则、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全面取得国民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入世后，中国全面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全部承诺，并积极参与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入世 16 年，中央政府共清理各类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数千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近 20 万件，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透明、既符合 WTO 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中国还逐步取消了 400 多项非关税措施，开放了金融、保险、法律、电信、分销、速递等上百个服务贸易部门。2010 年，中国降税承诺提前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加入时的 15.3%降至 9.8%。2011 年，WTO 对中国为期 10 年的过渡期审议结束，中国以优异的答卷向世界展示恪守承诺、坚持开放的良好形象。

入世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了制度化的国际环境，恪守承诺为中国经济走向高水平开放奠定了基础。入世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中国已从入世初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在国际上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在国家逐渐富强的同时，入世对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家电、手机、电脑、汽车、通信资费等价格的大幅下调，昔日的奢侈品已变成今日的必需品。

中国充分享受成员权利，先后多次打消发达国家要求我们扩大农产品关税配额、削减农产品国内支持、取消化工、制药等行业关税、取消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等要价，切

①中国的复关/入世历程从 1982 年 12 月对外经济贸易部同有关部门联合上报《关于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请示》起算，直到 2001 年 12 月 11 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历经 19 年。

实维护了国家利益。中国在世贸组织内就农业、工业品、服务贸易等领域单独或联合提出 200 多项提案，不断发出中国声音，主动引领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进程。更多的中国籍职员进入 WTO 秘书处，现有一名副总干事和多名不同级别中国籍职员。

入世后，中国逐渐成长为 WTO 重要谈判议题的核心决策方。2008 年，中国首次作为“核心七方”之一参加贸易部长小范围磋商。2015 年，中国作为“核心五方”之一参加内罗毕部长级会议磋商。

目前，中国已成为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入世以来，中国努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并从中受益，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朝着更加公平、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高度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对 WTO 谈判、争端解决、贸易政策监督等基本功能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深刻阐述了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的主张。中国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恢复谈判功能，为《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达成和落实、《信息技术协议》扩围谈判的达成做出重大贡献。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全面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地位，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首先是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入世当年 2001 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5100 亿美元，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4.4%，排名世界第六，其中出口为 2661 亿美元，进口为 2436 亿美元；而到 2017 年底，中国的进出口已达 4.2 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 14%，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其中出口为 2.2 万亿美元，进口为 1.9 万亿美元。这一巨变主要得益于外贸进出口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和进出口配额的取消，此外国内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也发挥了巨大的贡献，其结果是形成了国企、民营、外资企业三股势力大发展的蓬勃局面。这不仅支撑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中国双向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前，随着中国市场开放步伐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汽车、电子、医药等领域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独资和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的进入和建立大大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助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入世后，随着中国经济环境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我们又进入了对外投资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标志着中国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有了新的起步，这种变化有利于企业不断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这种积极性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三）拓展自贸区合作伙伴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世贸组织为首的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受阻，市场开放水平更高、灵活性更强的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引擎。区域合作已成为入世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式。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领导下稳定推进的。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严格来说，中国 2001 年前尚未签署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①] 2002 年至今，中国已和 24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6 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的自贸区有 11 个，正在研究的也有 11 个。中国的自由贸易伙伴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政治、宗教均有不同，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智利、秘鲁等，也有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还有最不发达国家，如东盟成员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除了主权国家，还有与单独关税区签署的 FTA，如与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特区以及中国台北。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2008 年 9 月 27 日，商务部门户网站下的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开通，正式启动运行。其宗旨是向社会各界提供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展和实施情况，推动社会各界对 FTA 谈判的认识和参与，促进中国已签 FTA 的宣传和实施，供国内外企业和消费者查询和适用 FTA 带来的各种贸易、投资优惠和便利。

（四）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我国不仅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体制活动，而且还积极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先后发起一系列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及合作机制，实现了多边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努力补齐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短板，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

---

①中国对于地缘经济关系的考虑最早可追溯至 1994 年 4 月申请加入《曼谷协定》。2001 年 5 月 23 日，中国正式成为《曼谷协定》第 6 个成员国。《曼谷协定》2005 年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属于优惠贸易安排。

排，扩大人文交流，探索“金砖＋”合作模式，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引领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架构，将一系列合作机制打造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目前金砖国家合作的影响已经超越五国范畴，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

（五）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高度责任和担当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参与多边、区域合作获得巨大红利，对全球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断加强。中国有责任、有能力、有担当地为全球经济体系改革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宏伟构想和中国方案，开辟了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2016 年 11 月 17 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决议。

党十八大以来，中国向世界提供着越来越多打着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成功主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启落实建设阶段。中国主办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制定了世界范围内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中国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功推动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中国为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为亚太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增长和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主要经验和体会

事实证明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的过程同改革开放的进程是紧密相关的，当然期间也有理念上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都坚定地选择了坚持对外开放，并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程序作出重要决定后，在全国贯彻落实。中国选择渐进式的开放进程是符合国情的，也说明了中国奉行的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开放的交替促进理念是完全正确的。主要经验体会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多边合作是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

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对世界发展大趋势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在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的前提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性伟大决定，这一决定改变了

中国的命运，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即 1978 年至 1990 年，其主要特征是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和接受；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到市场经济为辅的认识过程；实现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的成功转换。第二阶段即 1991 年至 2000 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方位开放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对内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完成了财税、金融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深化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大了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对外实行了更大幅度的开放政策，外资企业在消费品领域的投资持续上升，极大的丰富了国内各类产品的供给，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全面改善，并完成了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僵硬的计划体制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过程，形成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股势力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全面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我国保持同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是分不开的。第三个阶段即从 2001 年至 2012 年，中国经过 15 年的谈判和不断深化改革最终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所有程序，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享受到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阶段。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驱动下，在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不同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下，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坚持中国特色是中国参与的宝贵经验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上，中国拒绝了全盘西化的路径，始终坚持并保留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从发展模式看，我们经历了认识上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从接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全面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每一次调整都是艰难的，每一次调整又都是一次伟大的跨越。从发展实践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 4 个经济特区建设开始到沿海 14 个城市的对外开放，从加工贸易、三来一补业务到大规模招商引资，从发展乡镇企业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每一步都是对生产力的解放，都注入了新的增长动能。所以我们把握住了中国特色这一基本的经验，每一阶段的改革都是对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积极调整，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其秘诀就是每一次重大决策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

（三）坚持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扩大国际影响力

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不动摇是完全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在早期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有效地吸收和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政策

建议，无论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方面，还是在构建法治的营商环境方面，实践证明许多政策建议都是有效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过程，也是市场化概念发展和普及的过程，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中国从体制机制上初步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有三大经验值得总结：首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也是不断按照国际机构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恰恰反映了我国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其次，中国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强调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期间跨越了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历经 25 年时间；再次，中国对打开国门搞建设的思想理念越来越坚定，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坚持改革开放，所以今天的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态度看待整个世界。

（四）有利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是相吻合的，中国早期的开放阶段恰恰是国际上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充分利用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积极发展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出口，带动了国内出口加工能力的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外资在我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和参与度不断扩大，外资不仅在组织生产、带动就业以及在税收贡献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全面融入了国际价值链体系，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中国通过全面遵守和执行 WTO 有关规则，不仅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同时也对以规则为主的国际贸易体制起到了坚定的支持作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规则的有效保护，所以说中国既是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也是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的支持者。

（五）高水平开放是提高我国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中国经济加快进入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新阶段。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众多指标已名列世界第一或前茅。但是会发现在许多领域我们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例如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竞争力方面，在主要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掌控力方面以及在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的培育发展方面，我们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仍需要继续发奋努力，而这一努力的前提就是要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我们不仅要开放

自身市场，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平竞争促进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通过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壮大我们自己。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适应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体制，更要积极推动并引领现有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以此来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六）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已是客观需要，随着中国国际经济活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以及中国在国际多边和区域活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中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凸显，中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国际多边规则中获得有效的保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是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的过程。我们应把握好以下发展机遇，一是继续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当前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正在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个别大国不尊重国际多边体制，奉行单边主义的做法，已引起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不满。中国应主动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倡导遵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作用，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各种行为和做法。二是积极参与 G20 和各种多边和区域的机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协商和协调工作，发挥中国的作用，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三是中国应主动推动国际有关规则的修改和完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过程恰恰是通过参与一些具体事务的改革和完善从而形成影响力。我们应清楚的认识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仍需要在体制、机制、特别是软实力建设方面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以适应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的要求。

三、新时期中国将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此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以及 2018 年 3 月份召开的两会期间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具体内容及要求。我们要熟悉并深刻把握中央顶层设计的高水平开放内容和重大意义，在以下几方面锐意进取，寻求新的突破。

（一）以“一带一路”为建设重点，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发展

自习主席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在五通建设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积极富有成效的进展，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更凸显了习主席“一带一路”倡议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作用。相信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始终是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工作重点。一方面，要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更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探索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和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来持续推进。对此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其实质，积极稳妥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二）积极拓展对外贸易，促进贸易强国建设

要保持进出口平衡，在提高出口竞争力和附加值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好中央的有关要求，切实处理好贸易平衡问题，特别是要高度重视保持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而积极扩大进口一定要建立在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我们要注意到目前虽然我国的货物贸易具有 4200 多亿美元的顺差，但也要注意到我国服务贸易项下仍存在 2500 亿美元的逆差，所以在削减货物贸易顺差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减少服务贸易逆差，避免造成经常项目下账户的失衡。

（三）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这一要求还包括了要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好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中央特别强调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扩大市场开放同建立良好的市场营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双管其下才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中西部的开放力度

中央提出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十分重要，目前我国的开放格局从东中西部发展看还很不平衡，而西部经济发展较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可归咎于开放度不够，所以要进一步加大西部的开放力度。从西部发展看，应抓住两大机遇，一方面西部正面临着加快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直接参与“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总之，加快西部开放是确保我国全面完成小康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

（五）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自贸区建设取得了巨大突破，并且由上海自贸区已扩展到 11 个自贸区的范围，如加上最近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总量已达 12 个。从自贸区的改革开放进程看，尽管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总结复制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有效经验，但这些改革举措距离高水平开放仍存在着较大差距，而突破这一差距的关键是要进一步赋予现有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中央提出的探索自由贸易港的要求预示着要拓展更高水平的开放模式，而海南的开放则肩负着探索自贸港建设的艰巨任务。

（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海外投资不仅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中国企业近几年发展最快

的领域，但从目前效果看，企业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仍有待改善。所以加快探索和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巩固和加强我国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资生产服务网络的重要发展途径。这一过程关键是要解决好培育企业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四、中国自主开放应把握好的有关策略

从目前的开放进程看，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期间我们不仅要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和层次，同时还要不断拓展对开放的认识和理念，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清理和消除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藩篱和障碍。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期间提出的四大开放举措，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积极扩大进口。这四大开放举措的内容是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大优先领域，必须抓紧落实，正像习主席强调的那样，这些改革开放举措的落实要做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为此我们更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快市场开放的制度性建设

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应注意加强各类开放安排的制度性建设。例如在扩大利用外资方面，应抓紧修改完善并尽早出台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有些新的开放安排和举措最好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公布，以增强企业对扩大开放的预期和信心。继续抓紧修改放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创造条件加快修订并公布统一的更加精简的负面产品清单目录。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和下放审批权限，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准入，降低部分中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准入，允许外资在大部分领域自由登记开办企业。在融资体制方面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放开外资准入条件的同时，应进一步规范和放宽对民间金融机构资质的审批，形成内外资统一管理、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分阶段推进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和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和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升级的支持作用。

（二）把握好对外开放的顺序和节奏

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虽经济仍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也要看到新动能的积蓄和新的增长活力的启动是与日俱增的。加快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形成新的对外开放红利仍是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为确保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把握好开放的顺序和节奏至关重要。要注重处理好对内对外开放的结合，选择有利于增添经济增长活力的领域，率先实行开放，例如要进一步加大制造业开放力度，加快已明确的服

务业开放内容的落地过程。对于压力较大的行业可采取分阶段分步骤的开放措施，将开放的力度与开放后的事中和事后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统筹结合起来，要加大工业品关税的降税力度。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要全面落实中央多次提出的放开商贸流通、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开放安排，以及党的十九大后提出的开放电信。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开放举措在落地过程中，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三）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多边体制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作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动提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和新的维护世界经济公平公正的制度性安排意见，不断发挥中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的影响力，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不断提高我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参与力度和影响力。在尊重多边规则的前提下，继续拓展我同主要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发展空间，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

（四）加强国际风险防范，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摩擦中的应变能力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我们需要更多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保护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这是当前大国竞争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竞争、贸易摩擦、金融市场动荡、商品市场震荡、地缘政治矛盾、地区冲突风险日益复杂变化，因此我们要把握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和突发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提高对各类风险防范意识，加强战略态势评判研究和预警分析，努力提高驾驭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维护处理好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格局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平衡发展，不断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安全的能力和水平。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发展历程说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才能不断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与活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历程与经验说明，切实认真遵守规则，积极参与制定规则，有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高水平开放。中国今后不仅要继续坚持自主开放，更要积极主动推动全球经济的开放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也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正确的义利观，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沈家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的变化

姜长云　刘振中

摘要：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通过分析各阶段服务业增长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变化，揭示了我国推进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即：改革开放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顺应形势变化和发展阶段转变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内外联动；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良性互动至关重要；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导向，现代服务业发展还对创造需求、引导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城镇化、信息化日益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引导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城市群和产业融合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服务业发展的几个判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与第二产业差距拉大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值得重视，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日趋紧迫；要客观看待近年来服务业占比的提高，防止影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仍处于推进之中，简单否定工业或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有失偏颇；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和政策创新的力度，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监管方式创新。

关键词：服务业　工业主导　服务业主导　劳动生产率

作者简介：姜长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振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服务业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不断提高的过程。本文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阶段和基本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服务业发展需要关注的若干战略性、方向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统计口径，本文在与“第三产业”等同意义上使用“服务业”概念。

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阶段

（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均处于辅助地位，但恢复性增长格局迅速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比严重偏高的格局，产业结构呈现第二产业或工业主导特征，但就业结构仍呈现第一产业或农业主导格局（见表1、表2），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在总体上处于辅助地位。以1978年为例，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分别占27.2%、47.7%、24.6%和44.1%；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70.5%、17.3%和12.2%。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述格局有所松动，但仍未根本改变。以1984年为例，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和工业分别占42.9%和38.7%，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下同）占GDP比重（分别为31.5%和25.5%）；[①] 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64.0%、19.9%和16.1%，服务业占比分别低于第一、第二产业47.9和3.8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1984年在全国GDP和全社会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占比分别提高了0.9和3.9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占比分别提高了4.3个、下降了6.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4.8个、上升了2.6个百分点，工业占GDP比重降低了5.4个百分点（见图1、表1和表2）。

在此期间，服务业支撑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迅速显现。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时期，服务业也是三次产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推动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中略增。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1979—1984年6年间，[②] 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6%，分别快于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

①如果将GDP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统一换算为2015年不变价格，则早期年份三次产业不变价格占比之和明显超过100%，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明显大于GDP数据。因此，本文各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按当年价格计算，GDP或各产业增加值增速均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基于同样原因，在计算全社会和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时，所用GDP数据按2015年不变价格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计算，所用就业数据按年底就业人数计算。

②1979—1984年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以1984年为报告期。以此类推。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说明各阶段服务业发展的变化特征，本文在具体计算时都采用基期、报告期两个年份的数据进行计算。但实际上服务业不同阶段之间的演变往往经历一个蓄能与突破的过程，未必存在清晰的年份界限。

2.5、4.3、2.7 和 2.8 个百分点（见表 3、图 2）。同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5.2%、22.0%、42.8% 和 17.9%，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 7.6、20.8 和 24.9 个百分点（见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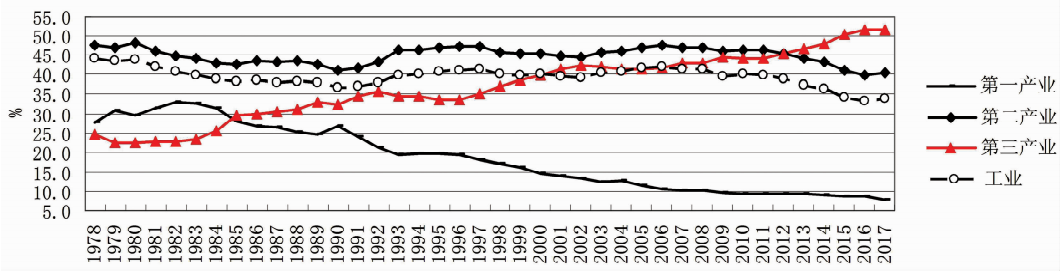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7 年我国三次产业和工业（当年价）占 GDP 比重的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表 1　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当年价）占 GDP 比重的变化　　单位：亿元、%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	附：工业
1978	3678.7	27.2	47.7	24.6	44.1
1984	7278.5	31.5	42.9	25.5	38.7
1991	22005.6	24.0	41.5	34.5	37.0
2002	121717.4	13.3	44.5	42.2	39.3
2011	489300.6	9.4	46.4	44.2	39.9
2017	827122	7.9	40.5	51.6	33.9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表 2　各年底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比重的变化　　单位：万人、%

年份	全社会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			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40152	28318	6945	4890	70.5	17.3	12.2
1984	48197	30868	9590	7739	64.0	19.9	16.1
1991	65491	39098	14015	12378	59.7	21.4	18.9
2002	73280	36640	15682	20958	50.0	21.4	28.6
2011	76420	26594	22544	27282	34.8	29.5	35.7
2017	77640	20944	21824	34872	27.0	28.1	44.9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与此同时，服务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地位有较大幅度提高，成为三次产业中吸纳新增就业最多的行业。1979—1984 年的 6 年间，全社会年底就业人数增加了 8045 万人，增加了 3.1%；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年底就业人数分别增加了 1.5%、5.5%和 8.0%，服务业年底就业人数的增速明显快于第一、第二产业；在全社会年底就业人数增量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 31.7%、32.9%和 35.4%（见图 3）。服务业吸纳新增就业人数略超过第一、第二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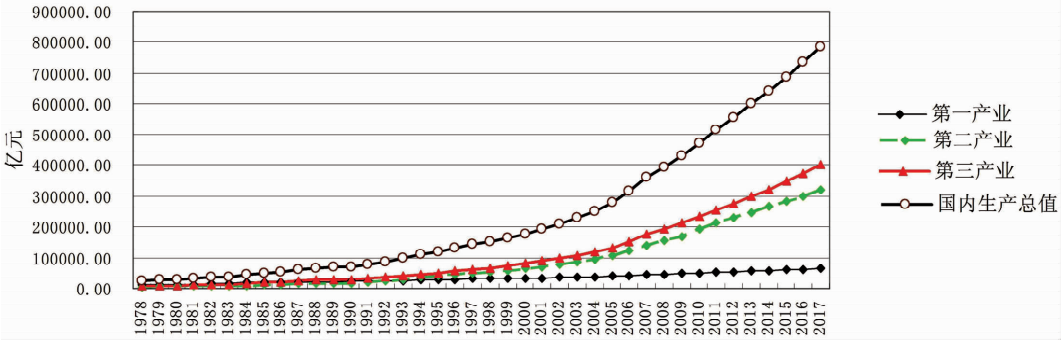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17 年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 GDP 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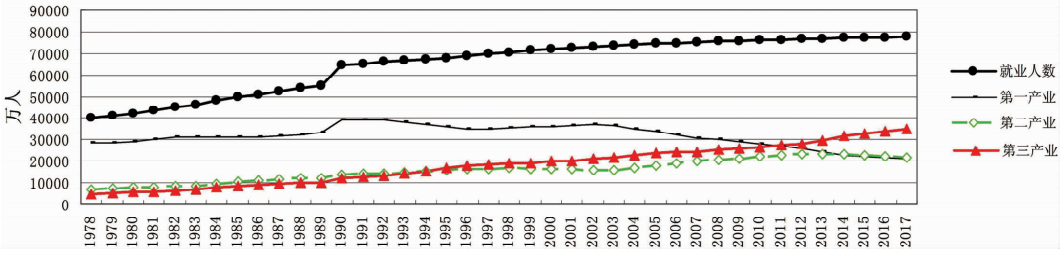


图 3　1978—2017 年我国全社会和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表 3　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2015 年不变价）年均增长率的变化　　单位:%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附：工业
1979—1984	9.09	7.29	8.91	11.60	8.80
1985—1991	8.15	3.58	10.91	10.75	11.11
1992—2002	9.47	3.68	12.66	10.36	12.97
2003—2011	10.60	4.37	11.98	11.25	11.81
2012—2017	7.23	3.91	7.02	8.01	6.89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注：2017 年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数据，是根据 2016 年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对应数据乘以 2017 年对应指标的实际增长率计算。

表 4　我国三次产业（2015 年不变价）对 GDP 增长贡献率的变化　　单位：%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	附：工业
1979—1984	35.23	21.99	42.78	17.93
1985—1991	15.9	32.6	51.5	27.4
1992—2002	8.79	42.35	48.86	36.74
2003—2011	5.39	43.82	50.79	36.80
2012—2017	4.99	39.52	55.49	32.7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注：各产业贡献率等于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 GDP 增量之比。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增量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量之和。

在此期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明显慢于第一产业，但仍略快于第二产业（见表 5、图 4），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全社会平均水平，但低于第二产业（见表 6、图 5）。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1979—1984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 5.8%、3.2%和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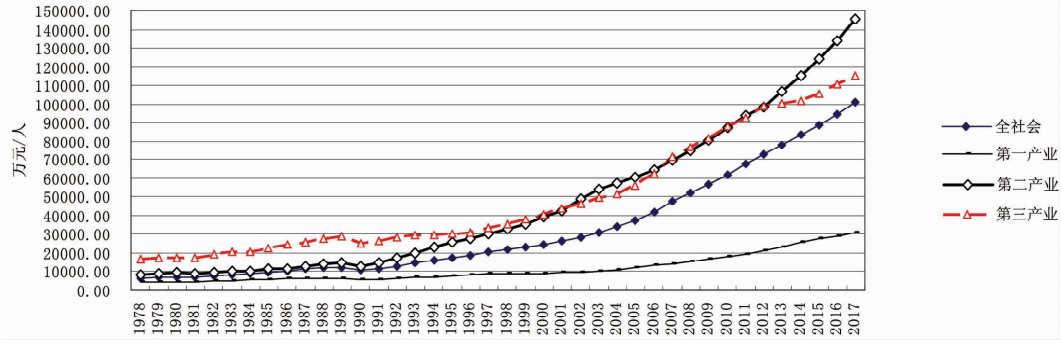


图 4　1978—2017 年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表 5　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2015 年不变价）增长率的变化　　单位：%

时间	全社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9—1984	5.82	5.76	3.21	3.38
1985—1991	3.51	0.14	5.06	3.56
1992—2002	8.36	4.29	11.52	5.20
2003—2011	10.08	8.16	7.56	8.04
2012—2017	6.94	8.11	7.61	3.69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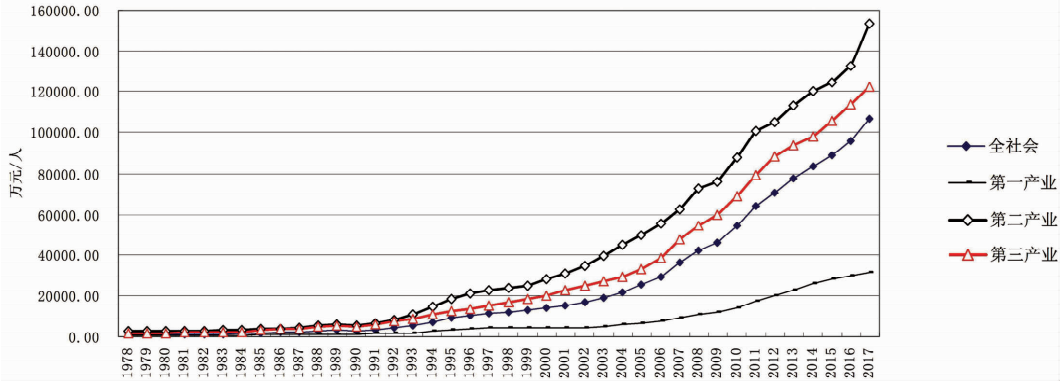


图 5　1978—2017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表 6　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当年价）的变化　　单位：万元/人、%

年份	全社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服务业）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		
					全社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1978	916.19	359.67	2527.29	1850.92	202.02	514.62	73.24
1984	1510.16	743.68	3258.39	2400.96	158.99	322.85	73.69
1991	3360.10	1352.70	6514.31	6129.42	182.42	453.12	94.09
2002	16609.91	4418.72	34501.83	24535.50	147.72	555.26	71.11
2011	64027.82	17358.46	100709.19	79209.22	123.71	456.31	78.65
2017	106532.93	31258.40	153327.80	122456.84	114.95	391.76	79.87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二）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服务业全面加快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显著提高，但对吸纳新增就业的作用尚不显著

这一时期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稳中略降，第一产业占比降幅明显。在我国就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第二产业占比在波动中有所上升，第一产业占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1985—1991 年的 7 年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占 GDP 比重分别下降了 6.5、1.4、增加了 9.0 和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 4.3、上升了 1.5 和 2.8 个百分点。到 1991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分别占 GDP 的 24.0%、41.5%、34.5% 和 37.0%，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 59.7%、21.4%和 18.9%（见表 1、表 2）。

这一时期，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略低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但却是三次产业中对

GDP增长贡献率最高的行业。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1985—1991 年的 7 年间，全国 GDP 年均增长 8.2%，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快于 GDP 和第一产业 2.6、7.2 个百分点，但分别低于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 0.1 和 0.3 个百分点；服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超过半壁江山，达到 51.5%，分别高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 35.6、18.9 和 24.1 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只是略高于第二产业，却明显低于第一产业。1985—1991 年间，全社会新增就业 17294 万人，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分别占全社会新增就业的 47.6%、25.6%和 26.8%。

在此期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较上期略有提高，但仍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1.5 个百分点。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1985—1991 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 0.1%、5.1%和 3.6%。按当年价格计算，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于第二产业，但明显高于第一产业。1991 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第二产业低 5.9%，分别较第一产业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高 353.1%和 82.4%。与上期末相比，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明显缩小。按当年价格计算，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最小的时期，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高出第一产业和全社会的幅度却有所扩大。

这一时期，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几乎呈现全面推进的态势。在服务业增加值较快增长的同时，1991 年与 1984 年相比，在服务业各行业中，仅其他服务业占 GDP 比重由 8.8%下降到 8.4%，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提高了 3.3、1.8、0.7、2.2 和 1.3 个百分点，分别达 8.3%、6.5%、2.0%、5.4%、3.5%。

（三）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本世纪初：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全面凸显，但 1997—2002 年间服务业的特殊变化值得关注

在此期间，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呈现在波动中提高的趋势，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降幅显著，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 GDP 比重呈现先升后降但总体提升的态势。1992—2002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占 GDP 比重分别降低了 10.7 个百分点和提高了 3.0、7.7、2.3 个百分点。到 2002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分别占 GDP 的 13.3%、44.5%、42.2%和 39.3%。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同期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 10.4%，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虽然分别慢于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 2.3、2.6 个百分点，但仍快于同期 GDP 增速 0.9 个百分点，快于第一产业增速 6.7 个百分点；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8.8%、42.4%、48.9%和 36.7%。服务业继续成为对 GDP 增长贡献率最多的行业，分别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 40.1、6.5 和 12.2 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也是值得重视的。与上期相比，第一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开始形成。

在此期间，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服务业（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高，第一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总体不变的过程。从 1994 年开始，服务业就业人数及其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吸纳就业人数居中的行业。与 1991 年相比，2002 年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 7789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 2458 万人，相当于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量的 31.6%；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增加 1667 万人和 8580 万人，分别占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量的 21.4%和 110.2%。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下降和上升了 9.7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保持不变；2002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 50.0%、21.4%和 28.6%。

这一时期，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再度加快。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1992—2002 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 5.2%，增速快于第一产业 0.9 个百分点，慢于第二产业 6.3 个百分点。但由于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低于第二产业，特别是此时期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导致服务业与第二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再度拉大（见表 6），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的程度也有所扩大。到 2002 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相当于全社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 147.7%、555.3%和 71.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个服务业占 GDP 比重连续 3 年以上每年增幅超过 1 个百分点的时期。1997—2002 年的 6 年间，服务业占 GDP 比重共提高 8.6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1.4 个百分点；但同期服务业占就业比重增幅不大，6 年共增加了 2.6 个百分点，服务业吸纳的新增就业仅占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 70.0%；由此导致 1997—2002 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1997—2002 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 6.9%，增速快于 1992—2002 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 1.9 个百分点；服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达到 55.6%。

（四）21 世纪初到 2011 年：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转变开始启动，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

在此期间，服务业占 GDP 比重在波动中继续趋于上升，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占 GDP 比重先升后降，并在总体上略有提高。2003—2011 年 9 年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占 GDP 比重分别下降了 3.9 个百分点、上升了 1.9、2.0 和 0.6 个百分点。2006 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占 GDP 比重分别达到 47.6%和 42.0%，分别成为自 1979 年以来第二产业占比、自 1981 年以来工业占比的最高点。此后，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均转入下降轨道。从 2007 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工业，二者分别占 42.9%和 41.3%。

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况相比，此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全面提速，成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阶段，但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已较前一阶段（1992—2002 年）有所下降。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2003—2011 年 9 年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递增 11.3%，增速分别快于 GDP 和第一产业 0.7 和 6.9 个百分点，但仍分别低于第二产业和工业 0.7 和 0.6 个百分点（见表 3）。同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5.4%、43.8%、50.8%和 36.2%，服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再次超过半壁江山，但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高，甚至略高于前一阶段。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进一步彰显。

与 2002 年相比，2011 年我国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 3140 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 10046 万人；第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分别增加 6862 万人和 6324 万人，分别占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 218.5%和 201.4%。2011 年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占 34.8%、29.5%和 35.7%，服务业已经成为三次产业中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

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2003—2011 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 8.0%，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同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0.5 个百分点，略慢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0.1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总体上差距不大。按当年价格计算，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高于第一产业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且均呈相对差距缩小、绝对差距扩大的态势。

这一时期的前半期，即 2003—2007 年，我国 GDP 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均较之前上了一个台阶，并于 2007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如 2007 年全国 GDP、第二、

第三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到 14.2%、15.1%、16.1%和 14.9%，分别较 2002 年提高 5.1、5.2、5.6 和 4.9 个百分点。但从 2006 年春季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步蔓延成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增长速度的“下拉效应”。如 2008—2011 年，全国 GDP、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为 9.6%、10.9%、9.8%和 10.6%，比 2003—2007 年间增速分别下降了 1.8、2.0、2.6 和 2.1 个百分点；2008—2011 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9.8%，比 2003—2007 年间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在服务业增加值较快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占比总体增幅不大，年均提高 0.3 个百分点。但服务业不同行业之间增长的分化特征较为显著。与 2002 年相比，到 2011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占比分别下降了 1.7 和 0.4 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占比分别上升了 0.7、1.7、1.4 和 0.2 个百分点。

（五）2012 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加快形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按当年价格计算，2012 年我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与第二产业相同，均为 45.3%。从 2013 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占 GDP 比重最大的行业。在此期间，服务业占 GDP 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2012—2016 年，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上升了 7.4 个百分点，连续 5 年每年均较上年上升 1 个百分点以上；第一、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分别下降 0.8、6.6 和 6.6 个百分点。到 2016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和工业占比分别为 8.6%、39.8%、51.6%和 33.3%。2017 年服务业占比与上年持平，第一、第二产业占比分别较上年下降和上升 0.7 个百分点，工业占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这不仅表现为服务业占 GDP 和就业比重的大幅度提升，还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一改之前长期低于第二产业和工业的局面，转为快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当然，客观地说，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也较之前有较大程度的放缓。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2012—2017 年 6 年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递增 8.0%，较上一阶段（2003—2011 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但仍分别快于同期 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 0.8、4.1、1.0 和 1.1 个百分点（见表 3）。在此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转变。GDP 增速较上一阶段下降 3.4 个百分点，第一、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分别下降 0.5、5.0 和 4.9 个百分点。同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加到 55.5%，较上一阶段提高 4.7 个

百分点，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时期；第一、第二产业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5.0%、39.5%和 32.7%，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见表 4）。

在此期间，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 1220 万人，其中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减少 5650 万人和 720 万人；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 7590 万人，相当于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 622.1%，服务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唯一吸纳就业人数增加的行业。同期，在全社会就业人数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 7.8 和 1.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 9.2 个百分点，且从 2013 年开始各年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均较上年增加 1 个百分点以上。

到 2017 年，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 27.0%、28.1%和 44.9%。2012—2017 年，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 7.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递增 8.1%、7.6%和 3.7%。

这一时期，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深化。按当年价格计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占 GDP 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占比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与 2011 年相比，2016 年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占比分别增加 0.7、2.0、0.7 和 4.0 个百分点。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房地产业占比保持不变，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占比分别下降 0.2 和 0.4 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占比增加 1.1 个百分点。

二、推进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改革开放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顺应形势变化和发展阶段转变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内外联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期，我国服务业恢复性增长格局迅速形成，与改革开放的启动及其后续影响有密切关系。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之后逐步放松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形成服务业恢复性增长格局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建议国务院作出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在此前后，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称“家庭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从“星星之火”转变为“燎原之势”的曲折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广，加上国家多次大幅度提高农

副产品收购价格，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为发展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日益显性化，对在第二、第三产业拓展就业渠道提出了强烈要求。农村改革的迅速展开，促进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也为发展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需求。在此阶段，部分专门领域的改革相继启动，也推动了服务业恢复性增长格局的迅速形成。如推进国有经济实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改革、重塑农村金融体制，特别是构建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国家专业银行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柳红星，2009），为金融服务业的更快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撑。从 1978 年到 1984 年，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由 2.1%提高到 3.1%。前述金融相关改革的带动作用，是个重要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服务业全面较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全面展开也是重要原因，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制度逐步优化。1984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将加快和深化改革作为大会的中心任务，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是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着重解决好的 3 个重要问题之一，“当前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1985—1991 年我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平均每年提高 1.29 个百分点，一个重要原因是 1985 年服务业增速明显加快，增速高达 19.4%，分别较同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增速快 6.5、5 和 4.6 个百分点，由此拉动服务业占 GDP 比重较上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乡服务业发展及其对改善城乡生产生活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重视。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 1985 年中央一号文件“里程碑式”提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等，也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全面凸显，在扩大改革开放方面若干重大标志性事件的影响值得重视。这就是，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带动了改革开放新局面快速形成，促进了服务业内在运行机制和外在体制环境的优化，带动了 GDP、工业和服务业的较快增长。这一时期，我国第二产业、工业乃至 GDP 增速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到这一时期最快的。工业、第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较快发展，也为加快发展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条件和市场环境、

动力支撑。在此期间，在服务业较快发展、占 GDP 比重较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房地产业占 GDP 的比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1992—2002 年，房地产业占 GDP 比重从 3.5% 提高到 4.4%，提高 0.9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占比的提升主要发生在 1997—2002 年间（提高 0.8 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旨在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等举措，为房地产业的较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从 21 世纪初到 2011 年，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开始启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服务业发展，两大标志性事件的影响不可轻视。一是 2001 年 12 月我国加入 WTO，意味着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和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可以更加广泛深入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也意味着推进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甚至国际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著增加，要求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双双有所提速。二是 2007 年和 2008 年分别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11 号）。这两个文件明确要求发展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着力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加快推进国有服务企业改革、积极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并对此提出了具体要求。各地围绕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或实施意见，也对带动服务业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2 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加快形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进一步彰显。这种格局的形成，固然有发展阶段转变、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多种原因，但与时俱进地纵深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甚至协调推进服务业与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开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此阶段，对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第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新服务业体制机制提供了“加速器”和“压舱石”。第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就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提出了一系列高强度要求。第三，启动并推进服务业“营改增”等重大改革，实施了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些改革“组合拳”，对服务业发展乃至经济转型的影响将是持续而深远的。

从上文分析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其阶段性跃升，往往都与强化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密切相关。从横向的地区比较来看，情况也是如此。2017 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位居全国前列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宁波、广州、苏州等市，基本上都属于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服务业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

（二）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良性互动至关重要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增速最快的时期，有服务业发展基数低的因素，也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服务业发展因政策环境日益宽松而出现“补偿性反弹式增长”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1979 年 4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求“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之后我国陆续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进一步调整和继续调整，并转向重视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品生产（汪海波等，2010），带动了城乡市场的繁荣，也拉动了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服务业发展。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党的十二大要求“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此期间，中央明确鼓励和支持恢复、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城乡集贸市场（汪海波等，2010），鼓励农村多种经营和农工商综合经营，促进区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发展，调整农产品购销政策，鼓励搞活商品流通，明确对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给予必要扶持”，要求“加强社会服务”“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商品生产服务体系”[①] 等举措，都从政策上为促进服务业恢复性增长准备了良好的需求条件和环境支撑。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服务业全面较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下列政策因素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198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重要论断，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要求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应包括“资金、劳

①参见 1983、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

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从 1984 年到 1988 年，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总体上逐步宽松，对技术交流和人才流动、城乡经济交往等支持政策趋于明朗，也为服务业的较快发展提供了积极支撑。这一时期，在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中，服务业的作用只是略高于第二产业，明显低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仅年均递增 0.1%。这种现象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仍然面临户籍制度等多重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反面说明，完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协调联动至关重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全面凸显，一个重要原因是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再上新台阶”，并且带动了服务业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在此方面，较有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第一，1992 年 6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发布，明确要求“争取用十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要高于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数占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比重，力争达到或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该文件还就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出了若干主要政策措施。第二，1991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布，该文件不仅明确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和原则，还就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若干明确要求和支持措施。第三，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提出“要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解决增长的主要措施”。

21 世纪初到 2011 年，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启动，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阶段。这一阶段政策创新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在此期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11 号）明确提出“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并就加强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大力培育服务领域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政策支持措施。应该说，国发〔2007〕7 号、国

办发〔2008〕11 号是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政策创新中的两个里程碑式文件，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期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2 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加快形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这有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要推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因素；但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四章明确要求“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2012 年 12 月发布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并就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扩大服务业开放、改革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和强化规划实施保障等提出了具体规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新政出台最为密集的时期，既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5 号）等服务业发展的综合性文件，还包括更多类似《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3 号）等涉及服务业特定领域发展的文件。这为促进服务业地位作用的迅速凸显，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政策环境。

从上述分析可见，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对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日趋凸显。与此相结合，促进服务业改革政策和发展政策协调互动，也日益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服务业在各地产业结构演变、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各地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服务业发展中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同质竞争的问题却日趋突出，重复投资、盲目建设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规划研究，以及促进服务业改革开放政策和发展政策的协调，更应引起重视。

（三）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导向，现代服务业发展还对创造需求、引导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服务业实现较快的恢复性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乡商品经济恢复性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

高，要求加快发展便民利民的服务业，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求，特别是解决温饱问题的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日益显性化，大批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也要求通过加快发展就业门槛低、吸纳就业能力强、对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业，开拓非农就业机会。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其他服务业占 GDP 比重迅速提升，成为支撑服务业占比较快提升的主要力量。这与同期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带动教育、卫生等非营利性服务业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文化娱乐等营利性服务需求的迅速扩张有很大关系。如从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及其结构变化来看，在人均消费支出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食品、衣着等温饱支出增幅放缓，且占比降幅较大；但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支出增加显著，且占比提高明显（见图 6）。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导致对信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需求迅速扩张和升级，也是此时期其他服务业更快发展和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增长较快，也为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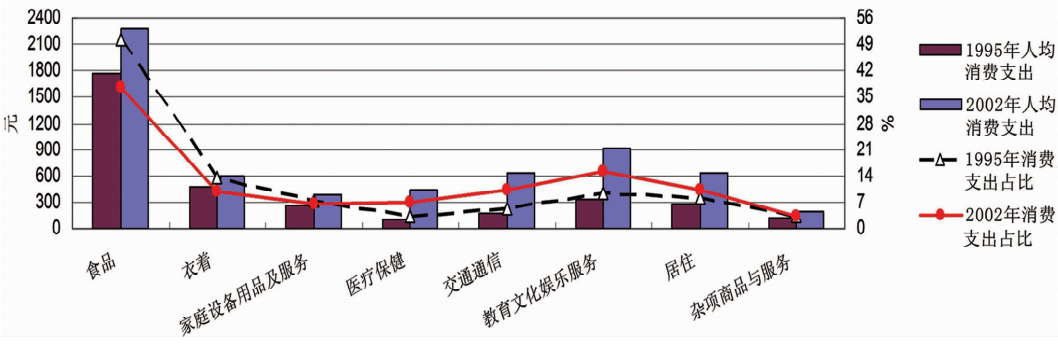


图 6　1995—2002 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当年价）及其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从 21 世纪初到 2011 年前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较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都有所加快。这得益于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后对外开放迅速扩大带来的体制机制改革的激发效应，但同外部需求的迅速扩张，以及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带来对生产性、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拉升效应，也有很大关系。2005、2006、2007 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唯一一个连续 3 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增长贡献率超过 10%、拉动经济增长 1 个百分点以上的时期。2008 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全面放缓，弱化了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效应，成为对应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许多企业发展难度陡增，甚至维持运转的

难度也空前加大。这些企业首先压缩或抑制增长的往往是服务需求。与进入21世纪初期情况相比，2008年以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扩张及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与2003—2007年这一时段相比，在2008—2011年这一时段，第二产业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降反升，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2.6%上升到45.0%，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36.1%上升到37.5%，分别上升了2.4和1.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同2008年以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在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搞活流通扩大国内消费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稳定外需等方面连续多次出台更加有力的措施密切相关。

2012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速虽然高于第二产业和工业，但增速明显放缓。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抑制了产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更快扩张。在城镇化率2011年已达51.3%、2017年已达58.5%的背景下，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之前明显放缓，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城镇居民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扩张。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业发展、服务业需求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也是值得重视的原因。200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跃升到10%以上，此后持续增加到2007年的16.1%，从2008年开始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在波动中趋于放缓，2012年以来一直在8%上下徘徊，服务业增速降档特征比较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行业结构演变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其他服务业占比呈现持续大幅度提高的趋势。1978年，其他服务业占GDP的7.2%，2017年增加到21.1%，尤其是自2009—2017年9年间其他服务业占比提高了4.5个百分点。其他服务业包括营利性服务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近年来，政府加强教育、卫生、水利等基本公共服务，鼓励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是支撑其他服务业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以信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为代表的营利性服务业较快发展，是其他服务业较快发展及其占比较快提高更为重要的原因。如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较上年实际增长2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较上年实际增长10.9%，增速分别快于服务业总体18.0和2.9个百分点。但是，这些新兴服务业相对于传统服务业发展，不仅需要适应需求、面向需求，更需要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甚至通过新型服务消费的引导和示范，激发潜在的服务需求。

（四）城镇化、信息化日益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引导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城市群和产业融合的作用

一般而言，城市往往是服务业企业的主要集聚地，也是服务业需求较为集中的地方。

城镇化带动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为深化服务业分工协作、促进服务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和生活方式转变，也为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也对推进城镇化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出了强烈需求。现代服务业高集群性、高创新性特点，有利于知识、科技、信息、人才较为密集的城市成为发展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姜长云，2011）。城市较高的要素成本，也容易形成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筛选机制，将部分发展层次较低的服务业拦截在城市载体之外。当然，不同类型服务业由于功能作用和需求特征不同，其分布特点也有较大差别。比如，满足基本民生需求的服务业往往需要随着人口和社区分布格局的调整，形成相对均衡分布。但就总体而言，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集群集约发展，也为推动城市的集约型、紧凑式发展，为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为提升城市品质提供了强劲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充分证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往往具有较强的良性互动关系（见图 7）。党的十九大要求“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2018 年元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要结合引导服务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做好促进服务业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大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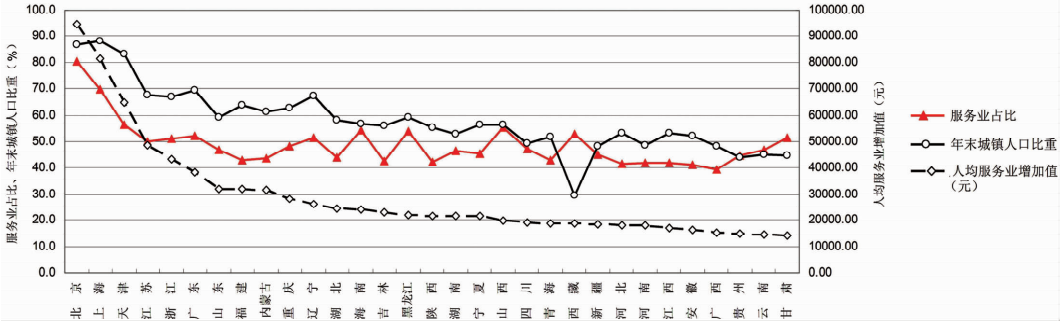


图 7　2016 年我国各省份服务业占比、城镇人口比重、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关系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服务业发展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产业融合的重要性日趋凸显。产业融合以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以技术融合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通过实现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形成新

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实现产业跨界融合、要素跨界流动和资源集约配置，激发新的市场需求及其整合集成，带动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提质增效升级。产业融合往往是服务业拓展市场空间、培育新动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的重要方式。近年来，许多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很快，与服务业同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也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途径。如物流业与金融业的融合、信息服务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融合。产业融合增加了服务业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信息化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产业融合的进程，也为拓展升级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路径。近年来，各种“互联网＋”“＋互联网”、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迅速发展，运用大数据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故事频繁涌现，就是对信息化、产业融合重要性的很好说明。许多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成长，往往与信息化、产业融合高度相关。通过推进产业融合，带动城乡融合发展，也日益成为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姜长云，2018）。

三、关于未来服务业发展的几个判断

（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值得重视，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日趋紧迫

从图 4 和图 8 可见，无论是按当年价格计算，还是按不变价格计算，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的问题都日趋突出，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也有拉大趋势。甚至按当年价计算我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绝对差距拉大的现象，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进入 21 世纪以来进一步扩大。按当年价计算，2017 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均 122456.84 元，相当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 79.9%，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距由 2011 年的 21499.97 元扩大到 2017 年的 30870.96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2012 年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较前一阶段明显放缓，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慢的时期。

之前的研究显示，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重要性的凸显，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的现象，将会制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甚至妨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及创新能力的成长，加剧服务业国际竞争的劣势。当然，这种现象的形成有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属性差异的因素。但在服务业增加值已经超过 GDP 半壁江山的背景下，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重视。为此，要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步伐，积极引导服务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努力激发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姜长云，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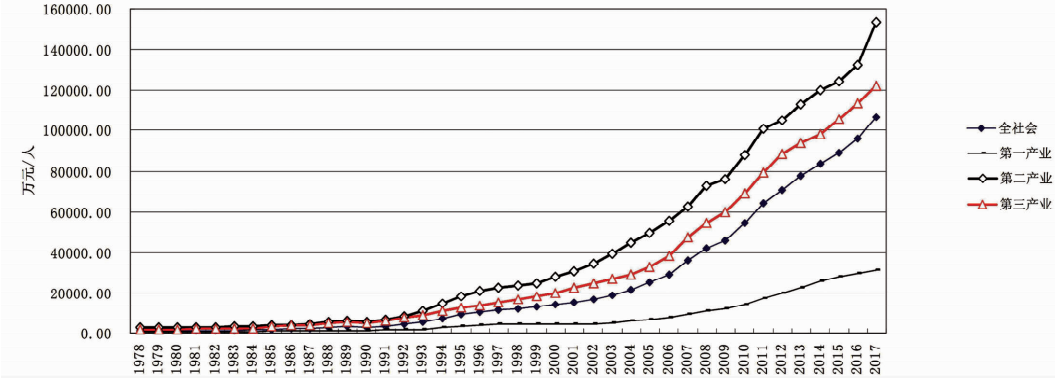


图 8　1978—2017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二）客观看待近年来服务业占比的提高，防止影响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占比连续 3 年以上连年大幅度提高的时期只有两个，分别是 1997—2002 年（年均提高 1.43 个百分点）和 2012—2016 年（年均提高 1.48 个百分点）。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在于，GDP、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均较前期有明显放缓，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在总体上快于第二产业和工业。而且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同服务业价格水平的较快上涨也有很大关系。尤其是 2012—2016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增加了 7.4 个百分点，但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仅增加 1.7 个百分点（见表 7）。可见，按当年价格计算服务业占比的上升，主要是价格因素作用的结果。当然，此处导致服务业占比提升幅度较大的价格因素，既包括服务业价格涨幅较大，如房租、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导致的结果；也包括工业品价格降幅较大的作用。如以上年同月为 100，则自 2012 年 3 月起到 2016 年 8 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 54 个月低于 100。可见，近年来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较快提高，既有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背景下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速放缓），也与服务业价格较快上涨、工业价格整体下降的状况密切相关。付保宗（2014）的研究发现，工业比重的下降，容易导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工业比重过早出现拐点，容易成为经济过早进入低速增长区间的原因。在工业进而 GDP 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果价格因素的作用能够支撑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出现较快增长，那么服务业占 GDP 比重出现较大幅度提高很可能

就是“水到渠成”的。

可见，如果不加区分，将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提高简单归结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果，容易形成片面、误导性结论。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提高，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在于，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因为服务业发展形势太好，而是工业发展形势不好。进一步说，工业增速放缓，与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背景有关。但如据此简单否认与服务业占比较快上升相关的经济运行风险因素，也不是明智之举。

表 7　部分时期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和占比的变化　　单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工业
增加值实际增速	1997—2002 年	2.88	9.24	9.76	9.56
	2012—2016 年	3.91	7.21	8.01	6.99
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占 GDP 比重的增加	1997—2002 年	-6.95	2.07	3.88	2.30
	2012—2016 年	-1.49	-0.17	1.66	-0.50
按当年价格计算占 GDP 比重的增加	1997—2002 年	-6.0	-2.6	8.6	-1.8
	2012—2016 年	-1.5	-5.9	7.4	-6.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等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上述两个时期，我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都有连年大幅度的提高，但其明显不同之处值得重视。1997—2002 年间，在服务业占 GDP 比重大幅提高的同时，服务业占就业比重增幅不大，由 26.0%提高到 28.6%；同期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相当于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 70.0%。这一时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时期。但 2012—2016 年我国服务业占 GDP 和就业比重分别增加了 7.4 和 7.8 个百分点，服务业吸纳就业比重的增幅大于占 GDP 比重的增幅，且服务业成为三次产业中唯一吸纳就业增加的行业。同期服务业吸纳新增就业人数相当于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 547.3%。由此导致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2012—2016 年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递增 3.5%，成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慢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时期服务业发展出现了低端化、泡沫化问题，凸显了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有些地方把服务业占 GDP 比重，甚至服务业占就业比重的变化作为考核服务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虽然我们不能全盘否认其合理性，但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在判断服务业发展状况时，过分强调这两个因素也会带来严重问题。片面追求服务业占

GDP比重的提高，如果届时能够实现目标，很可能会以工业进而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妨碍经济中高速增长为代价，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片面追求服务业占就业比重的提高，还可能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为代价，带来服务业低端化、泡沫化问题，影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三）我国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仍处于推进之中，简单否定工业或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有失偏颇

从上述分析可见，从 21 世纪初，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即已启动，但由于近年来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占比增幅，明显小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占比增幅，简单地说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还有些过早。我国产业结构仍处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之中。如果考虑到近年来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连年大幅上升，经历了前一阶段服务业占比缓慢提高的“蓄能”准备阶段，就更容易理解近年来服务业占比的连年大幅上升难以长期持续。2003—2011 年 9 年间，我国服务业占比由 42.2%提高到 44.2%，年均递增 0.22 个百分点。况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口径，2017 年我国服务贸易收入 2065 亿美元，支出 4719 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 2654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4%，其中运输项目逆差 561 亿美元，旅行项目逆差 2251 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 20%和 9%。① 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服务贸易逆差说明，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还难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唯一的主引擎（姜长云，2016），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发挥工业与服务业“双引擎”作用。

近年来，有些研究提出，工业已经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我国正处于“去工业化”的过程之中；有些地区甚至提出基于其资源优势和区位条件，应该绕过工业化阶段，直接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② 我们不否认这在少数地区有其合理性，但就多数地区而言，片面否认发展工业或制造业的重要性，过度强调工业与服务业对立的一面，忽视其建立融合互补关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能是比较危险的。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制造研究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材料与制造委员会主席王绪

①参见《2017 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2018 年 3 月 29 日。

②如果把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出现稳定的趋势性下降粗略地当作进入“去工业化”阶段，那么当前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仅西藏、宁夏自治区第二产业占比仍处于上升阶段，未进入“去工业化”阶段；其他省份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均处于下降阶段，有的降幅较大；真正服务业占比下降的也仅西藏自治区，其他 30 个省、市、自治区服务业占比均处于上升轨道。2017 年服务业占比超过 50%的省份已达 13 个。

斌（2018）提出，制造业在衡量一国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力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家投资的回报率是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制造业在拉动就业和孵化创新方面往往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制造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从美国制造业的历史和现状可见，制造业衰退必将导致国家层面的危机，最终将使经济社会生活蒙上浓浓的阴霾。夏杰长、倪红福（2016）的研究提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经济发展更需要工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应避免从过去片面强调工业主导地位转向单纯强调服务业主导地位。李钢（2013）的研究证明，“二战”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升，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价格上涨速度快所致，而第三产业实际产出增长更快并不是重要原因；美日两国在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阶段时，第二产业占比仍处于上升阶段。

自 2007 年开始，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占比均转入下降轨道，有人据此认为从当时起，我国的去工业化就已启动。但是，倘若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所调整，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地区增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国内第二产业或工业需求扩张的空间仍会很大，当前许多地方的“过剩产能”很可能就会转换成“有效供给”。因此，如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有更大力度，工业化仍可成为许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促进工业化转型，实行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再工业化，仍有很大空间。魏后凯（2018）提出，要高度重视区域的再工业化问题，并把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作为实现再工业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重视的。香港作为服务业占 GDP 比重达到 90%以上、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已成为全球闻名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其近年来在“构建全方位‘再工业化’政策体系”等问题都已引起特区政府和社会的重视。[①] 当然，这种“再工业化”一定是建立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在当前发展阶段下，我国应该如何科学处理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据此应该得到某些启示。

（四）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大服务业改革开放和政策创新力度，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监管方式创新

总体而言，服务业改革开放仍是我国改革开放最薄弱的环节，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容易因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等“借口”而遭遇障碍，甚至被迫“半途而废”。随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推进产业融合、信息化与服务业融合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

①张庆波：《“再工业化”，为香港未来发展储能》，《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7 日，第 20 版。

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这往往进一步增大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的难度，甚至要求将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同深化整个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将深化服务业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当前，一方面，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仍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往往明显快于对内开放的脚步，甚至存在“对外开放积极、对内开放消极”的问题。近期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说明中提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这实际上要求在不同地区的内资企业之间按一致原则管理。2018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在扩大开放方面，我国将采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重大举措，并尽快使之落地。2018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19 号）发布。要以此为契机，做好服务业“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这篇大文章，激发开放对改革、改革对发展的带动效应。

近年来，在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成为发展服务业中的亮点所在，也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创新新兴服务业监管方式日益重要而紧迫。为此，加强对以下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

——如何科学辨识新兴服务业的真发展和伪发展？如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共享雨伞，到底是商家的营销方式还是服务业新业态。原本 25 元一把的雨伞，顾客交 30 元钱押金，用完后归还，商家（或平台，下同）收取少量费用。但许多使用者用完后并未归还，也不要求商家退还押金，这种情况恐怕也是商家乐见的。

——如何把握新兴服务业的产业属性。只有以此为依据科学制定监管措施，才能统筹协调争取创新收益与抑制创新风险的矛盾。如网约车或共享单车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运输服务业问题，其中涉及到金融创新与信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融合发展问题。将其简单归结为交通运输服务业问题，恐怕会引发许多难以解决的后续矛盾。

——在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如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网约车对推进交通运输方式变革、对激发出租车改革的影响值得肯定。网约车加盟城市交通竞争后，淘汰的部分出租车司机属于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其收入水平和就业竞争能力往往较差。在鼓励服务业创新提高城市交通效率的同时，怎样解决这些人共享发展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实际上，近年来许多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都存在机会和收益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怎么解决好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与共享的矛盾？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共享发展，可能只是空谈。

——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带来的垄断问题。许多与网络经济相关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存在“先下手为强”的问题，“网络会鼓励成功者取得更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先行者往往以创新为其显著特征，但待其形成垄断后，有可能形成对进一步创新的障碍。从历史经验看，垄断者往往缺乏动力去进一步改善面向其服务对象的服务。尤其是许多与网络经济相关的新兴服务业，许多取得垄断地位的先行者往往倾向于收编新加入的竞争者，这更容易形成对竞争和创新的抑制效应。如何在顺应网络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把握新兴服务业与传统产业中垄断特点及其影响的差异，形成适应新兴服务业特点和发展要求，又能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措施，是未来创新新兴服务业监管方式必须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付保宗：《总论：中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13～2014》，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 年版。

2．姜长云：《中国服务业：发展与转型》，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

3．姜长云：《应该重视提高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发展观察》2018 年第 11 期。

4．姜长云：《中国产业发展：从“十二五”到“十三五”》，《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16——面向“十三五”的产业经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5．姜长云：《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和规划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年版。

6．柳红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

7．李钢：《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产业吗》，《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4 期。

8．汪海波等：《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

9．王绪斌：《为什么制造业必须成为国家战略》，搜狐财经，2018 年 5 月 9 日。

10．魏后凯：《要高度重视区域的再工业化》，个人图书馆 360doc. com，2018 年 4 月 30 日。

责任编辑：谷　岳

·国际经济·

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与新时代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杨丹辉

摘要：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一方面，跨国并购规模收缩，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增速放缓，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面临深度调整；另一方面，各国普遍应用产业政策工具促进投资，外资政策导向总体上更为积极，世界范围内引资竞争加剧。进入新时代，中国利用外资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国家连续出台外资“新政”的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资回稳增长、结构优化，但各地区之间吸收外资分化加剧，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复杂形势，应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加紧落实新一轮开放重大举措，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领域，推动高质量利用外资。把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机会的同时，着力保持利用外资的活跃度，不断提升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东道国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　全球价值链　利用外资　全面开放新格局

作者简介：杨丹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区位条件和市场竞争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为落实新一轮对外开放重大举措，2018 年 6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发布了 2018 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2018 年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在中美贸易战的复杂形势下，应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高质量

利用外资，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跨国投资波动加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2018 年 6 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2018》，2017 年国际直接投资（FDI）为 1.43 万亿美元，同比降幅 23%。其中，跨国并购降幅高达 27.8%。在国际资本流动低迷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以及世界范围内外资政策环境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动向、新趋势。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速呈现下降态势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近年来国际分工深化的方向和范式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随着国内配套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1999 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达 56.9%，2017 年这一比值仅为 33.5%，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以及出口企业（包括在华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的变化。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高端机器人等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带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不仅催生了新产业群，而且使得纺织服装、机械加工、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部分环节被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增大。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虽然回流（reshoring）尚未取代外包（offshoring）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范式，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新增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世界投资报告 2018》的数据则显示，过去 10 年间，持续了 30 年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出现停滞。2017 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值（FDA）幅度为 30%，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这也是自 1990 年以来的首降。同时，尽管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参与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却大幅下降。2000—2010 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 11%，2010—2017 年急剧滑落为 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由 13%降至 3%（见图 1）。

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和重构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演进的结果。随着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的变化，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有所弱化。从这一角度看，近年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不应被简单解读为一连串的偶发政治事件或者仅仅是民粹主义者的鼓噪，在这些纷繁表象的背后

实则是世界实体经济正在酝酿重大变革，同时也折射出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次原因，意味着单边主义增强、全球化放缓的倾向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向更多领域渗透，这将直接影响未来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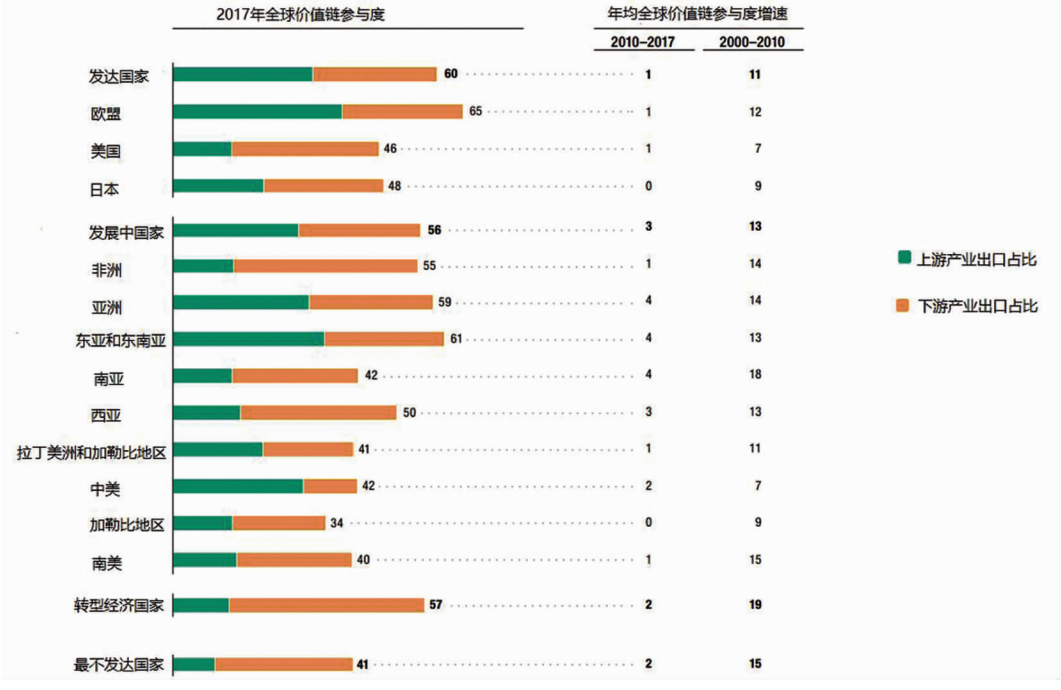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7 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增速的变化（%）

资料来源：UNCATD. Word Investment Report，2018，p24。

（二）吸引外资成为“新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学术界对产业政策及其效果的争议从未停止，近期美国也在不同场合罔顾事实地指责中国产业政策的合规性。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却进入了密集投放的时期，出现了所谓“新产业政策”（New Industrial Policy）（UNCTAD，2018）实践的热潮。不论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应对工业 4.0，还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世界各国普遍、广泛地运用产业政策工具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的政府重新认识产业政策的作用和角色，纷纷通过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在微观层面刺激企业的创新活动，发现并识别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而在产业层面，发达国家将产业政策的作用领域聚焦在创新活动以及产业链的创新环节，强化固有优势，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从而占据新工业革命下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再从应用方向和实施工具看，投资促进成为“新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根据 UNCATD、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统计，2008—2017 年，占世界生产总值（GDP）90%以上的 101 个经济体制定实施了产业政策，其中 90%的产业政策

包含促进投资的目标。另外，2010 年以来，全球 80%的外资政策集中应用到产业层面，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投资便利化、投资项目筛选、设立吸引外资的经济特区等（见图 2），反映出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以及外资政策日益融合、相互支撑的趋势，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各国的引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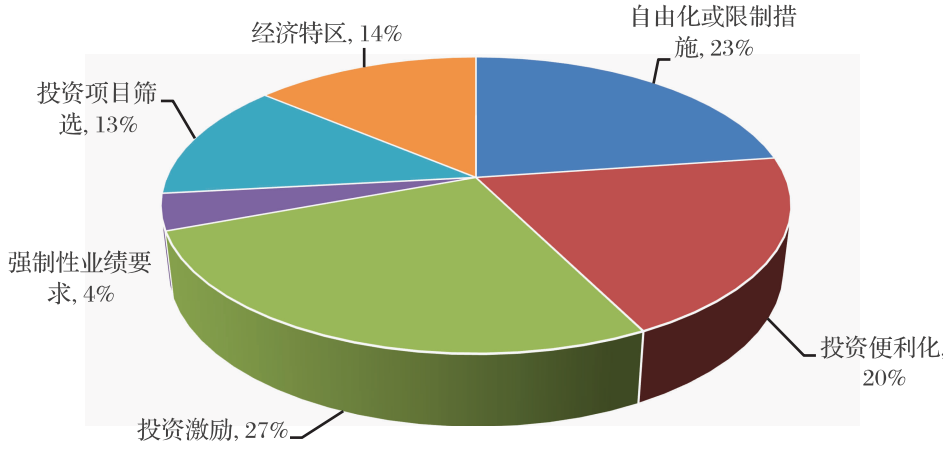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17 年全球基于产业政策目标的各类投资措施

资料来源：UNCATD. Word Investment Report，2018，p24。

注：各类投资措施之间存在交叉。

（三）中国利用外资面临“双重竞争”

总体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减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 FDI 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同时，近年来美国各级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税收减免、土地供应等传统引资工具的运用力度甚至超过发展中国家，加之近期美元持续走强，国际资本短期内加快由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而面对贸易战下不断升级的中美大国竞争以及美、欧、日之间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新型自由贸易协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调整投资策略，更倾向于采取分散投资风险的多元化布局。一方面，在美国、德国等工业强国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下，发达国家必然会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等领域，中国很难再通过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获得先进技术转让。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中一批新的生力军开始活跃起来，不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提速。其中，人口超过 1000 万人、GDP 规模超过 100 亿美元的国家有柬埔寨、刚果（金）、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印度、马里、缅甸、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喀麦隆、莫桑比克、塞内加尔、越南等，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均超过 6%。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8866 美元，而上述国家（除多米尼

加）的人均 GDP 水平都低于 3000 美元，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均 GDP 甚至不到 1000 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定义为“高增长低成本国家”。随着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受教育水平提高，未来 5～10 年，这些“高增长低成本国家”在吸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投资方面将形成不断凸显的区位优势，成为全球低端制造尤其是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能的主要转入地，中低技术产品的制造环节将加快从中国等国家转移到这批新的“成本洼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将遭遇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更激烈的“双向”竞争。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恢复性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国内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虽然 FDI 流入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二位，连续 25 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利用外资规模增速下降。针对新常态下利用外资出现的问题和障碍，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重要措施。目前，这些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2018 年 1—6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9591 家，同比大幅上升 96.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83.2 亿美元，增速为 4.1%，基本扭转了外商投资连续下滑的局面。吸收外资回稳的同时，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7 年，电子通信、医疗器械、环保设备等高技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61.7%，占比达 28.6%，较 2016 年提高 9.5 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产业结构已经发生逆转，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态势基本保持一致。1993—2012 年的 20 年间，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在吸收外资中占据首要位置。2013 年，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反超第二产业。2016 年，制造业吸收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进一步降至 29.9%，仅约为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的 50%，制造业扩大利用外资面临项目储备减少、吸引力下降的压力。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上升是必然趋势，但制造业高质量外资及其蕴含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机会不容忽视。中美贸易战集中暴露了中国制造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原材料等方面的短板。今后，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仍是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重点领域。再从外商投资来源看，2018 年 1—6 月，外资来源地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香港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达到 72.3%，而排名 5～10 位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荷兰、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均未超过 20 亿美元，这种国别结构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二）“两缺口”矛盾明显缓解，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下降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体制转轨的艰巨任务和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入外商投资不仅可以缓解“两缺口”的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经济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本身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带动了中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随着国内积累能力不断增强，国内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两缺口”条件下吸引外资相比，现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动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逐步下降，表现为 FDI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高点之后（1995 年这一比值高达 15.65%），进入 21 世纪后持续快速回落，2010 年 FDI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 2.84%，2017 年这一比值则仅为 1.34%（见图 3）。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形成以及出口中的作用下降在所难免。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外资作用的认识以及民众对外企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明显变化，所谓“外资偏好”随之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资的追逐动力减弱。一方面，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在当地外资存量已经较大、地方政府外资政策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断细化外商投资的进入条件，设立了更为严格、全面的“招商选资”标准，不断提高外资项目的门槛，设立了更高的技术、用地和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战以及国内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外商投资企业同样会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竞争态势和政策环境，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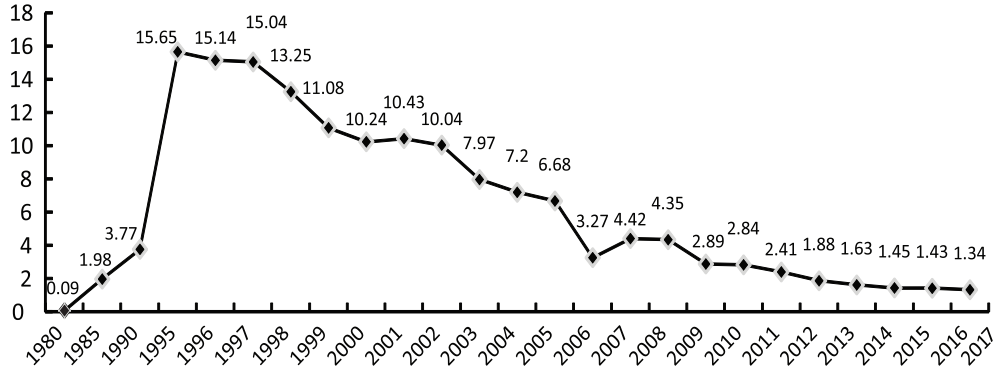


图 3　1980—2017 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2017 年的数据来自《2017 年统计公报》，其他年份数据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注：实际使用外资额 2015 年和 2016 年的数据按人民币计，其他年份以美元计，按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三）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技术、市场、人才等各个环节展开激烈竞争

随着竞争力提升，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了全方位竞争，争项目、争土地、争人才的情况加剧。目前，这种竞争已不局限于传统产业，在互联网经济、移动支付、云计算、共享经济等领域，以华为、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其产品开发、技术水平、运营能力不仅与中国市场上的跨国公司不相上下，而且在全球市场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企业对新经济的商业逻辑有着不逊于跨国公司的理解力。而从就业情况来看，新兴领域的国内企业内部组织架构更开放，决策机制更灵活，入职国内新经济的领军企业，薪资水平不低于外企，个人发展机会更胜一筹。反观一些大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和策略明显滞后，仍然将在华分支机构定位于地区性运营中心或成本中心，创新不够活跃，研发活动碎片化，技术导向偏于应用，岗位设置僵化，其发展空间、薪资水平以及薪资制度，对国内高端人才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在人才竞争中渐显劣势。竞争力此消彼长使得一些在华跨国公司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主动转让技术的“不设防”状态，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市场秩序、产业政策以及技术转让安排的变化日益敏感，在其母国发起的贸易战中以及多边贸易平台上质疑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而与这种情况形成反差的是，随着中国创新活动日益活跃，北京、深圳、杭州等一批具有区域甚至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浮出水面，凭借要素供给多样化及性价比高，支撑创新成果转化的制造体系和产业链条更加完整，成果转化效率不断提高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创新创业团队特别是中小创新团队来华投资创业，带动了中国科技研发领域利用外资。

（四）吸收外资地区分化加剧，中西部各省市区之间拉开差距

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占比提高，但沿海地区外资向中西部转移仍面临诸多障碍。除了受运输半径、出海口距离等因素的制约，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如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供应链主要由三井、丸红等传统大型综合商社掌控，这些综合商社已经形成了主要依靠海运的供应链网络，短时间内很难串联陆路和内河运输，并将其物流体系延伸至中西部地区，加之日籍管理人员对中国沿海城市的气候、生活条件有较强的偏好，这些因素制约了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向内地转移。在外资梯度转移过程中，各地区引资的区位条件进一步分化。此外，由于人才大量流失，东北地区的要素支撑力不断下降，地方政府服务意识淡薄，导致该地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有意结束在东北的运营，新项目将不会考虑布局到东北。而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

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省市，承接中等技术、兼具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度的外商投资，已经形成一定优势，外资项目落地相对顺畅。对西部地区的投资，跨国公司则比较看好重庆、贵州等地。

（五）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虽然近期出台的促进利用外资政策密度高、力度大、亮点多，显著提高了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但国内对大幅度放宽外资准入仍有不同声音，特别是 2018 年负面清单发布后，种子、稀土冶炼、金融等领域的开放引发争议。应该看到，经过 40 年数轮侧重点不同的对外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逐步开放到位，渐进的增量开放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障碍。一些领域利益下沉，“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现象普遍存在，“内外有别”“对外开放，对内设限”的状况导致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与贸易政策导向出现错配，部分地方政府扩大吸收外资的动力不足，投资软环境不佳。在外资项目由审批改为备案的过程中，行政级别较低的部门对政策把握不准，对大型外资项目以及外商投资新业态、新模式的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较差，致使一些高质量外资项目拖办、延办，严重影响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效果。

三、对策建议

（一）总体思路和原则

总体而言，中国以成本优势为核心的传统区位优势加快弱化，而新的引资优势尚未全面形成并发挥作用，不少地区出现了区位优势断档、优质外资项目“青黄不接”的现象。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目前国内企业开始由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的“跟跑者”“模仿者”转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跨国公司必然将中国企业视为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传统合资合作方式的空间逐步缩小。同时，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创新步伐加快、新兴产业群体性推进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对于中国实体经济潜存的空心化风险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重视。历史地看，发达国家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同样曾经历过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的特定阶段，但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其产业向高端化升级的路径相对可控，而对于中国这样走过赶超式、压缩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则必须全面提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制度在内各类要素的整体素质。吸收高质量外资有助于强化竞争效应，挤出低水平产能，推进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多样化、良性互动，从而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面对新形势，做好利用外资工作要把握好两点：一要加强改革与开放协同推进，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同时，需下大力气疏通国内各种条块障碍，确保新一轮政策红利释放到位；二要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着力点转向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先进制度平台和软硬件环境，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共享开放成果，避免引发新的超国民待遇。

为此，一要坚持质量导向。将引资重点放在：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方向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技、新材料等；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中国制造短板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如集成电路、高端机器人、专用设备、嵌入式软件、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等；现阶段国内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有利于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带动消费转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健康养老、节能环保、共享经济、智慧城市等。二要强化政策效果，形成示范带动作用。重点吸收 2018 年负面清单规定外商投资股权限制有重大调整、有助于改善外国投资者政策预期的外资项目，如汽车、飞机设计制造、金融等。三要促进新一轮开放政策产生“促改革、促发展”效应。进一步挖掘外商投资的制度引领性，吸引能够倒逼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改善营商环境的外资项目，包括金融、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领域。

（二）政策建议

第一，抓好重点行业引资工作，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围绕 2018 年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股权限制有重大突破的行业以及具有显著开放示范效应的领域作为近期吸引外资工作的着力点，推动一批影响力大、质量高的外资项目顺利落地，改善外国投资者的政策预期。在制造业领域，选择汽车行业为突破口，抓住跨国巨头应对中美贸易战、调整投资布局的机遇，吸引跨国公司在华新设汽车投资项目，对合资车企股权变动做好“一对一”政策服务，带动为其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投资，拓展跨国公司在华供应链体系。在服务业领域，则要把金融业作为引资重点，抓大促小，完善监管体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和行业管理水平，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溢出效应。

第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研发活动，推动“双创活动”对外资开放。鼓励外资企业新建或升级在华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承担各类科技项目，落实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税收政策，对同等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等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开展产业共性技术、核心技术、尖端技术和基础科研项目的研究；鼓励外资投向科技中介、创新孵化器和生产力中心等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加快

推进对国外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和天使基金开放，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华创业发展，吸引掌握专利技术和技术诀窍的专业团队落户中国，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给予中国籍公民同等待遇，为其提供签证和居住便利，并为其在华技术转让、产品测试制造、研发融资提供配套服务。

第三，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对外开放，引导外资企业参与数字经济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以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作为高质量利用外资的主攻方向，鼓励外资企业投资智能制造关键装备和核心软件的研发与产业化，引导国内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领军企业与国外创新团队开展联合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大力引进半导体材料设备、高端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器与控制装备等先进技术，允许外资企业参与中国智能制造标准制定、嵌入式软件特别是智能制造操作系统的开发以及推广应用，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建设数字化智慧工厂，开发智能制造和信息化解决方案。需要强调的是，先进制造是工业强国的核心优势，上述领域吸引外资、引进技术面临种种障碍。因此，要强调质量导向，注重长期效果。一要允许这些领域外资设立独资项目，合资企业的股权安排和收益向外方倾斜；二要切实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外方投资顾虑；三要引资与引智相结合，扩大外资项目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四要积极对接行业隐形冠军，吸引欧洲、日本等制造强国的优秀中小企业来华投资，带动国内先进制造、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的发育完善。另外，目前中国电商等消费端已经积累了海量数据，消费端数据开发不断取得突破，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开发成功经验正加快向工业领域扩展应用。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相类似，现阶段中国初步形成了数据收集整理的成本低、数据规模效应显著、市场应用潜力广阔等新型比较优势。为此，要加紧研究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对外资开放的影响，探索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完善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法规，引导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安全利用、开发国内消费端及公共服务端的巨量数据，培育利用外资新增长点。探讨互联网领域的开放模式和时间表，为外资进入电子商务、新零售等行业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通过引入外资竞争，优化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格局。

第四，顺应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新潮流，不断拓宽利用外资领域。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创新空间集聚的方向和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的发展路径加快转型，人才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方面，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要素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甚至不是交通通信等传统区位条件，而转变为获得高技能劳动力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主导新经济的专业人士的综合能力，“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宜居水平”“城市魅力”作为吸引人才关键因素的作用凸显；另一方面，由于新经济普遍具有轻

资产、平台型的特征，以往布局远离金融、文化、生活设施的高科技园区，已经难以适应新一代科技人群的工作生活需求，新经济的创新创业活动开始回归核心城区。近 10 年来，发达国家掀起了城市规划及创新空间的理念和技术革命，助推新经济发展与城市功能升级、地产开发与要素集聚的良性互动。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和创新街区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在规划理念、投资运营模式、软硬件条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差距。顺应世界范围内城市升级的潮流，规范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引入国外资本和高水平的专业团队，参与智慧城市、创新街区、展览展示、公共事业、古建保护、锈带治理、主题公园等领域的活动策划、项目开发、建设运营；配合共享办公区域的设计开发运营，重点在沿海城市以及西安、成都等具有文化粘性的中西部城市，引进外资规划咨询公司、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师和艺术家工作室，推动文创旅游、工业设计、游戏动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内容开发和场景应用等都市产业和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吸引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在华长期工作生活，从而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国际化运作理念，在为外资企业、国际机构和外籍人员提供更多深度融入中国经济社会机遇的同时，提升国内城市品质和社区面貌，扩大中国城市的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先进的空间载体和高端要素支撑。

第五，投资促进与保护并举，努力营造公平、宽松、有序的营商环境。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成立由主管部门、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来自科学、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小组，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行业列出具体时间表，加大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成本和惩治力度；二要尽快启动一轮全面的产业政策合规性审查，审慎清理有悖国际规则的产业补贴，深化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标准制定、公共服务等领域改革，取消各种隐性的强制性技术转让规定，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三要鼓励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招商引资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开展各类专项培训，增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放管服”的意识和服务外资项目落地的综合能力；四要培育引进市场化的投资服务中介，逐步取代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导地位，为外商提供投资区位选择、合作伙伴对接以及政策法律、备案流程、人才招聘、上市融资、产业转移、市场退出等一揽子专业化服务；五要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依规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在新三板挂牌，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运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为外资企业融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

第六，加强陆海联动，优化外商投资区域结构。深入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区域开放战略的紧密结合。坚持科学甄选，高标准建设，吸引高质量外资项目投向海南自由贸易

港；完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加快配套服务产业发展和商务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对外开放，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吸引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等低碳绿色领域；升级改善中西部口岸、跨境运输等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联通东中西部的交通和信息网，打破商品、服务及要素流动的区域性壁垒和市场分割，形成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充分认识西部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和地域特点的差异，提高风险意识，对涉及民族、宗教、文化等敏感问题的外资项目、人员往来开展系统性动态评估，确保开放中的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1．臧新、赵炯：《外资区域转移背景下 FDI 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 年第 3 期。

2．田毕飞、陈紫若：《FDI、制度环境与创业活动：挤入效应与补偿机制》，《统计研究》2017 年第 8 期。

3．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10 日。

4．田素华、王璇：《全球 FDI 集聚化：客观趋势、治理及中国政策效应》，《上海经济研究》2018 年第 3 期。

5．钟山：《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共赢——写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发表之际》，《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2 日。

6．Yang Danhui. China’s 4 Decades Opening－up：Patterns and Experiences，*China Economist*，2018（6）.

责任编辑：李　蕊

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助推服务业开放新格局

朱福林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深度合作，从而为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本文在分析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发展现状、特点基础上，对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展开论述，分析“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促进效应，给出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发展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服务外包　经贸合作区

作者简介：朱福林，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后。

“十三五”期间，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升级压力，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竞争激烈，开拓难度不断加大，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发展机遇。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市场受国内保护主义影响出现一些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外包领域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市场，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途径。通过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将有利地促进我国服务业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并为我国企业在服务外包国际化经营策略方面积累经验。

一、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现状、特点和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与响应，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政治经济合作逐渐大规模展开，“一带一路”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通常来讲，企业国际化过程必然会产生大量生产性服务需求，鉴于文化、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客观原因，跨国公司通常会采用来自母国公司提供的信息与服务，以达到降低交流沟通成本、控制信任危机等目的。实际上，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对这些国家政策商机的发布、企业资源要素配置等内容的认知还较为薄弱，从而需要我国专业服务商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设计、法律、金融等方面的生产性业务。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规模的加大，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身也面临着发展经济、解决人口就业等社会问题，而且全球范围内信息化技术革命与产业融合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也不例外，需不断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产生了大量内生的服务外包需求。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我国服务外包合作的重要区域，并日益成为我国离岸服务外包的新增长点。

（一）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增长迅速

首先，从规模与增速上来看，近年来，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均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服务外包国际市场多元化发展。2014—2017 年期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合同和执行额分别增长 2.5 和 1.6 倍，高于同期我国服务外包总额增幅。

如图 1 所示，2014 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 125 亿美元和 98.4 亿美元，同比增速达 25.2%和 36.3%。2015 年的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 178.3 亿美元和 121.5 亿美元，同比增速为 42.6%和 23.4%。受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2016 年随着我国整体上服务外包承接业务有所放缓，“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额和增速均出现下降。经过 2016 年短暂调整，2017 年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业务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合同额增长大大高于执行额，分别达 312.5 亿美元和 152.7 亿美元。说明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双方互信程度的加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服务外包领域合作意愿得到加强，服务外包订单数量增加，服务外包潜在市场不断被挖掘。

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或新兴经济体，许多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仍以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和基本工业体系建设为主要任务，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程度还不充分，从而导致我国与它们之间的服务贸易总体规模增长幅度不大。此外，由于“一带一路”各项措施还处于积极推进中，相关的软硬件支持体系还在不断建设与完善中，而且沿线国家服务外包需求也容易受到国际、周边和本国

经济政治环境变化可能出现不稳定，加上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拓展与布局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作为新开创的国际市场，“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表现出较大的年际波动。

其次，从占比来看，近几年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规模增速显著，逐渐成为我国服务外包的重要承接来源地区。如图 2 所示，“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占我国总体离岸服务外包比重稳步提升，表明其在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逐渐提高。2014—2017 年期间，“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合同额占比分别达 17.41%、20.43%、16.95%和 28.1%；执行额占比达 17.6%、18.79%、17.22%和 19.17%。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及互联互通进一步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正成为新时代我国服务外包重要的承接来源地和服务外包提质增效的新动力源泉。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具有一定的滞后特征，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不断加大，未来服务外包需求将进一步释放，“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在全部外包的份额还有可能再获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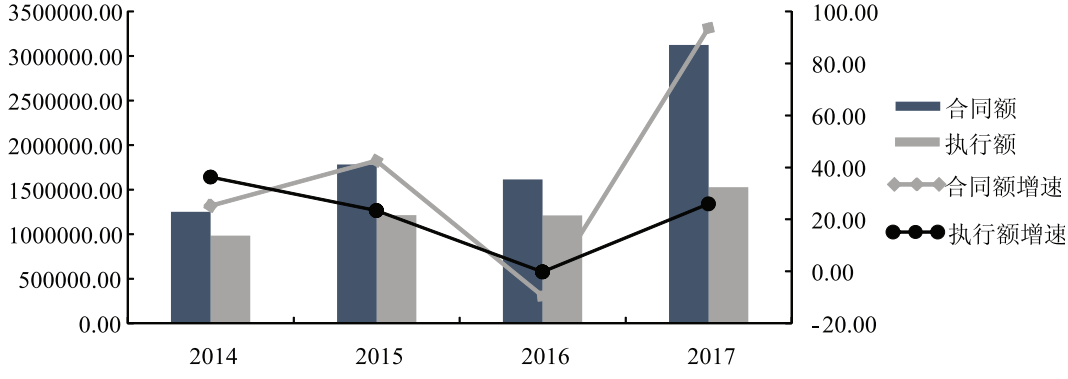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7 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规模（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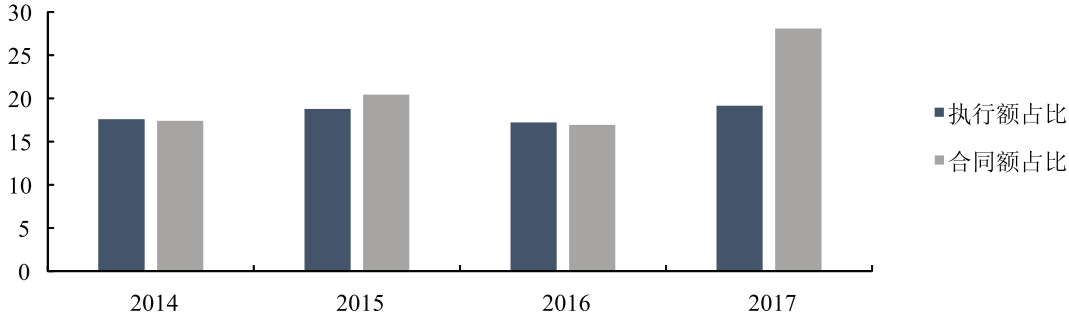


图 2　2014—2017 年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占比分布（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二）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国别分析①

首先，从片区来看，我国承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离岸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如图 3 所示）。2014—2017 年，我国承接东盟 11 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分别为 53.8 亿美元、63.2 亿美元、65.7 亿美元和 78.8 亿美元，占沿线比重分别为 54.7%、52%、54.2%和 51.6%。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7 年上半年，承接东南亚 11 国外包执行金额 232.4 亿元，约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60%，占比与前几年相比有所提高，说明东南亚服务外包在“一带一路”推动下得到较大释放。相对其他区域来讲，东盟地区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较为稳定，服务外包市场相对比较成熟，市场发展程度较高，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东盟地区仍将是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的主要来源地区。从图 3 中看出，除东盟之外，西亚、南亚也是我国服务外包重要的合作伙伴。2017 年，我国与西亚北非、南亚服务外包合同与执行金额分别为 34 亿美元和 22 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的 22.3%和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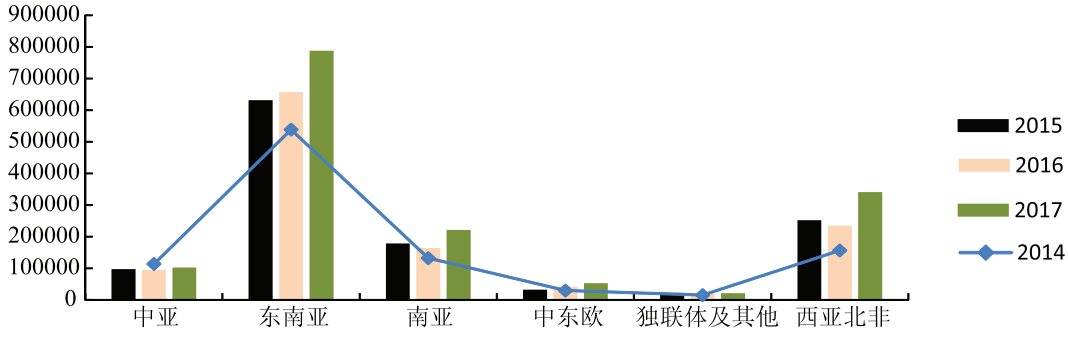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来源区域分布（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其次，从单个经济体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当中有些就是我国传统的服务外包来源地，如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印度等。每个片区中都有几个重点市场，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该区域的主要发包国；而沙特和伊

①东南亚 11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缅甸、老挝、文莱、东帝汶。西亚北非 16 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以色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林、巴勒斯坦、也门共和国。南亚 8 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阿富汗。俄罗斯蒙古和中亚 5 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东欧 16 国：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塞尔维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爱沙尼亚、波黑、黑山。独联体其他 5 国及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

拉克是西亚北非区域的主要发包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的主要发包国；俄罗斯是中亚地区主要发包国。就合作规模来看，我国与新加坡、印度、俄罗斯的服务外包合作更为密切，这些国家的服务外包产业均具有一定规模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下，一些新的服务外包市场增长加快。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 年来自拉脱维亚、乌兹别克斯坦、捷克、爱沙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增长迅速，增长均超过 80%。

（三）“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成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为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本优势，缓解国内高成本压力，实现快速交付和本地化提供等战略目的，以及发挥离岸、近岸和在岸多种模式结合带来的综合优势，我国许多服务外包企业加大了在海外建立交付中心、研发中心和分支机构的步伐。美日欧是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业务来源地，自然也成为企业建立国外业务机构的首选目的地。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设立海外中心的重要目的地。博彦科技不仅在其主要离岸市场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分支机构，也在印度和新加坡服务外包高端目的地设立交付中心。文思海辉与印度尼西亚 Jatis 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目的就是提升亚太市场开拓和全球交付能力。2015 年华为宣布在班加罗尔成立新的研发中心，希望将该中心打造成面向全球客户的重点开发和交付中心。

（四）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下，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成果超出预期，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风险不可忽视。

首先，从风险状况来看，“一带一路”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很多处于国际能源供应带和地缘政治敏感带，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区域，不可避免地与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相碰撞。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最近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都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也与沿线国家自身政治战略主张形成对撞，2014 年莫迪政府提出“季风计划”，试图抗衡中国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度还对中巴经济走廊、我国与斯里兰卡的合作大为不满。“一带一路”还存在战争风险，其中，战争的起源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域外大国为霸权利益以各种理由强行介入带来的战争；二是一些国家内部因民族、宗教等矛盾激化引发的内战；三是上述两种势力搅和在一起导致的战争。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处于恐怖主义人员活动频繁的“高风险”区域。一些欠发达国家，政治上不太稳定，国家没有明确的长期发展规划，有的国家执政党一旦更替，新的执政党上台后不认前任的帐，从而产生政权更迭风险。例如，

2018 年，马来西亚总理一上台就宣布重新评审与中国的投资合作项目。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担心资源、能源或重要物资被中国利用，或对中国介入当地政治存在顾虑，对中国投资或多或少产生焦虑和担心。由此看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范围局部地缘政治相对不稳定，将给我国“一带一路”国家的服务外包项目带来财务、法律、合同等方面的风险。

其次，从市场合作成熟度来看，与成熟的美日欧发包方不同，“一带一路”沿线是我国新兴的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产业、企业与市场等不同连接层面的稳定性还不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基础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经济合作程度深浅不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比较松散，未能形成明确的经贸合作共识。“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国际贸易发展缓慢，经济全球化步伐滞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服务外包国际业务风险提高。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经历了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总体实力得到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行业成熟度、操作经验上仍有欠缺，尤其是在国际开拓方面的新市场、新问题、新环境上娴熟处理的能力还不是很高，导致在开发国际新市场方面经验不足。

第三，从国别差异来看，“一带一路”沿线跨越多个大洲，相关国家和地区数量众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政治文化环境存在很大差别，服务业发展基础参差不齐。除少数国家和地区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信息技术水平整体上还不高。因此，除与传统服务外包市场具有深度合作基础之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服务外包领域层次和水平还很有限。另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多种社会体制，无形中增加了我国服务外包企业与“一带一路”发包方在分工协作、沟通交流上的困难，从而更给服务外包合作项目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第四，从营商环境来看，相比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地缘政治相对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可能给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服务外包项目带来财务、法律、合同等方面的风险，对业务拓展形成挑战，并产生不利影响。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金融体制、信用经济还不是很健全，我国企业还容易造成资金损失。另外，“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体量较小，国际贸易发展缓慢，知识产权和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意识薄弱，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业务风险无形中提高，不利于开展服务外包合作。

二、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

（一）“一带一路”合作基础不断夯实[①]

从政治上来看，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获得国际关注，也多次被联合国写入其决议。尤其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不断深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元首首脑访问 43 次，与 11 个国家签署 15 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文件。2017 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共有 1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元首首脑访华，期间我国与相关国家签署 270 多项经贸等多领域合作文件。截至 2017 年 5 月，我国已与沿线 36 个国家及欧盟、东盟分别签订了双边海运（河运）协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政治互信程度较高。鉴于多种原因，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领域更倾向于和我国开展合作，并且有上合组织、“一带一路”论坛等多种国际协调机制，从而让“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经贸合作中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都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从联通上来看，中欧班列开行近 7000 列，运行线路 57 条，国内开行城市 35 个，到达欧洲 12 个国家 34 个城市。截至 2017 年 5 月，我国民航已与 43 个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国外航空公司新开 18 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线。截至 2017 年 11 月，我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与全球 31 个港口的物流信息互联共享。我国已与沿线 12 个国家建有 34 条跨境路缆和多条国际海缆。2017 年 12 月 3 日，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我国与老挝、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相关部门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截至 2017 年 7 月，我国已与 24 个沿线国家实现公民免签或落地签，并逐步向西亚北非、中东欧等地区扩大。

从金融上来看，亚投行成员总数增至 48 个，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 42 个，共批准 20 多个投资项目，总额超过 37 亿美元。丝路基金已签约 17 个项目，承诺投资 70 亿美元，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达 800 亿美元。6 家中资银行在沿线 19 个国家设立 80 多家分行、支行、代表处等。中国银联卡覆盖沿线 50 多个国家，超过 400 万商户和 40 万台 ATM。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沿线近 20 个国家合作项目提供各种类型保险服务，并与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签订合作协议。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机制进一步完

---

①数据来源：《一带一路数据观》，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43662. htm，2018 年 1 月 12 日。

善、合作基础得到巩固、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空间巨大

首先，从经济基本面来看。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为 23 万亿美元，人口共计约 45 亿人。若加上欧盟诸国，“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比重的 50%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70%以上。2017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 7.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 3.6 个百分点。

其次，从发展阶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且大多数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大体呈现“倒梯型”的结构特征。① 一些国家工业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与我国还有一些差距。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中必然产生大量服务外包需求。

第三，从我国对外投资角度来看。在“一带一路”战略深度合作推动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以每年约 20%的速度增长。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 10 年我国对外投资将达到 1.25 亿美元。随着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增长，“跟随型”服务外包市场将持续扩大。而且投资项目将由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等少数行业逐渐向全产业不断拓展，从而产生巨大服务外包产业需求。据统计，2014 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已超过 500 亿美元，与相关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项目近 2000 个。②

第四，从双边合作推动机制来看。在重大项目推进上，东非铁路网起始段肯尼亚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典范。自贸区建设方面，我国与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签署自贸协定，与摩尔多瓦、毛里求斯自贸协定正在积极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对外援助方面，启动“共筑援助之桥、畅通‘一带一路’”行动，落实重大援助举措，积极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稳步推动改善民生的援助项目，开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专题培训班，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2016 年。

②国家发改委：《中国对外投资报告 2017》，2017 年 11 月。

（三）“一带一路”拓展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国际市场多元化格局

“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有利于拓宽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外包产业方面的合作空间和市场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些本来就是全球服务外包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中包含着不少全球服务外包重要角色。以印度为核心包括中国、菲律宾等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是全球第一大离岸业务承接区；以波兰、保加利亚、捷克为中心的中东欧地区是承接欧洲服务外包的重要聚焦地；俄罗斯凭借其高科技人才优势从而在高端研究服务外包方面占有一定独特优势；处于丝绸之路另一端的爱尔兰是全球著名服务外包发源地，是全球中高端服务外包重要聚焦区（姜荣春，2015）。

从产品、技术及整体解决方案上来看，我国服务外包的提供方式可能更接近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服务提供高技术、标准、能力成熟度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与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能力更加匹配。2017 年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增长近一倍，说明服务外包的谈判项目与日俱增。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我国服务外包传统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和我国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业务加速释放，在岸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有望形成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国内市场“三位一体”的产业新格局。

（四）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领域呈现非均衡性、特色性分布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和信息产业水平差异很大，导致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具体业务结构由于出口区域不同而呈现巨大差异。对于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来讲，相关基础设施投资、能源等方面的服务外包具有很大市场空间。硬件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配套服务的跟进，在其国内相关服务业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区需要通过服务进口来弥补，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市场。以高铁出口来说，轨道交通设备及高速车辆出口还带动了运营、管理、养护、维修、安全监控等后期运维服务及相关人才技能培训服务的出口。对于需要发展高铁、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说，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服务外包就能获得发展。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产业基础较为完备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是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来讲，除信息技术外包之外，业务流程外包及知识流程外包均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此外，在沿线国家和地区有些制造业基础比较良好的国家，制造业外包具有很大需求。总之，“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由于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基础、产业条件等因素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范围也具有较大差异。

（五）新兴服务外包领域具有很大发展空间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其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态也逐渐壮大，势必产生大量新兴服务外包需求，为我国新兴服务外包的出口提供了潜在市场。此外，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合作的加深，企业“走出去”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业种类、标准逐渐提高，将会产生更多的工业技术服务、信息化解决方案、专业服务需求，BPO 和 KPO 等企业中高端服务外包逐渐增加。据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研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应深化七大领域合作，分别是：信息技术运营维护和工程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云计算与数据处理分析和电子商务平台服务、软件研发和技术服务、工业设计和 IC 设计服务、医疗和医药研发服务。这些领域未来有可能成为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的主要领域。

（六）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与对外投资协同发展

根据《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深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推动“装备 + 服务”“工程 + 服务”和中国服务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开展工业、能源、软件和信息技术、文化创意、金融、交通物流等领域的跟随服务，“一带一路”将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国际经验表明，企业对外投资需要服务先行，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也不例外。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投资项目的落地，为对外投资提供了必需的配套服务支持。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经济条件和商业环境等差异很大，投资往往具有很大的风险，投资过程极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对投资咨询、法律顾问、风险管理、应收账款等外部高水平专业性服务产生巨大需求，需要大量先进生产性服务的支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广度与深度的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能源资源、金融、旅游、文化以及生态环保等方面不断加强对接与合作，涉及服务外包产业合作领域将不断扩大，从而带动我国与沿线国家服务外包产业合作，“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规模扩张将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带来新一轮国际化浪潮。反过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的扩大。服务外包在对外投资前期、中期和后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因此服务外包与对外投资合作有望形成相互辅助、互相促进、相互提升的局面，形成良性互动循环局面。

三、“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对我国服务业开放的促进效应

（一）“一带一路”服务外包有利于促进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

母国相关市场效应对于一国和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这是波特国家竞争模型强调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相关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将进一步带动母国相关产业的开放发展。就我国来看，通过“一带一路”获得的服务外包边际增量可通过产业关联和波动效应促使我国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另外，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突破，基于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服务外包产业不断与其他产业融合，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能源业、金融业、医疗卫生健康业、生活性服务等垂直行业与信息产业协同发展趋势加强，因此，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信息产业的增长，而且对其他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强大支持作用。再者，基于低成本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新阶段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着严峻的向高起点迈进的挑战。国际市场开拓难度有所增加，通过“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的发展，可以搜寻到新型发展机会，以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陷阱，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二）“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增长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 2012 年的 17979.9 亿美元到 2016 年的 19373.9 亿美元，平均增速为 1.9%[①]2016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我国贸易总额比例由 25.4%上升至 25.7%。[②] 服务外包是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方式，而且是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主要贡献力量。因此“一带一路”服务外包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与其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我国对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行业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部分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我国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从而有助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形成。在传统服务出口市场、包括美国、日本、欧盟、中国香港等得到巩固的同时，新兴“一带一路”市场份额继续扩大，增强了我国服务贸易抵御国际市场变动风险的免疫力。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诸多新兴和转型经济体，它们的服务贸易还刚起步，对技术、金融、管理和人力等高级生产要素需求比较迫切，正好为我国服务外包相关优势领域进入这些市场提供机遇，从而提升高附加值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

①。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7）》。

②数据来源：中国一带一路官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33799.htm。

（三）“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为“中国服务”标准走向国际化提供契机

国际贸易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在于标准、规则和话语权的博弈。我国虽然是贸易大国，但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方面还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可以推广中国标准，尤其是在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先进领域。相对于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我国服务外包技术与质量水平具有显著优势。因而，在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时，我国逐渐形成统一、透明的服务标准，有利于培育优质中国服务外包品牌，增加我国服务外包在标准设定上的话语权，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竞争优势并为我国高端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巨大市场。在一些市场空白的地区和领域，通过抢占先机率先构建与推广我国的行业、技术、服务标准，在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有利于我国的中高端外包标准和规则制定主导权。

（四）“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带动服务贸易人才结构提升

服务外包的价值创造在于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协作，价值链活动分解将创造出大量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产生大量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服务外包产业对人才知识、技术及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使服务外包产业成为知识型、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培育摇篮。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可以促使服务外包人才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综合能力。2018 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 820 万人，大学生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而服务外包雇员构成中有近 70%为大学毕业生，服务外包产业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产业部门。随着“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潜力不断被挖掘，促进我国外包总体承接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扩大对高学历人才有效需求。而且服务外包业务内涵已逐渐升级，开始由非核心业务向更高层次的系统解决方案和价值创造转变，从而对服务外包人力资本要求更高，对高学历服务外包人才的需求更大。通过“一带一路”扩大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规模，从而对服务外包人才规模的扩大产生积极作用。而服务外包人才的壮大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基础，从而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相关产业发展。

（五）“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中西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西部服务外包发展提供了机遇。我国中西部地区处于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中间地带，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扩大了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俄罗斯、中东欧甚至西北欧等国际服务外包发达地区的经贸联系，从而使得我国西部地区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有利于缓解我国东西部地区间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关研究指出，西北经济区域信息技术发展程度变量指标对“一带一路”国际服务外包承接竞争力

具有显著正相关（戴军、韩振，2016）。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将大幅提升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及产业条件，带动更多国内外服务外包企业瞄准中西部进行产业布局或转移，使中西部地区低成本要素优势得以有效发挥。“一带一路”为更多中西部企业参与国际化项目、培养国际化人才提供了绝好机遇与平台，为中西部服务外包企业国际化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图 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西部地区区位图

四、政策与建议

“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产业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但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市场主要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发达市场经济体，这些地区制度健全，商业文化发达，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较高，市场可预期程度较高。而“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还是处于经济转轨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营商环境、法律法规等较不健全，与我国在语言、文化、宗教方面差异也较大，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偏低，虽然潜在市场需求很大，但我国企业对开展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经验还不足，因此风险不可低估。为更好地促进我国“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构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企合作模式发挥各自优势

政府主要在国家顶层的沟通和协调、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政策法规、商机等信息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平台搭建、专项基金扶持、财政与金融政策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与作用。着重发挥资源与信息对接功能，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政策、资源与信息国际平台建设，为国内参与“一带一路”各市场主体和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涉及营利性质的经营性平台应该由企业来具体建设与运营，如郎坤为中国化工、中国建材搭建的平台运行就较为成功。在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应做好支持工作，充分了解“走出去”企业的真实需求，不断提高国际治理能力。

另外，有关国际市场开拓的成功案例可仿照中国香港的做法。在香港企业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半官方机构和各大商会“三位一体”的组合，是协助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机制。而且各个机构各司其职，政府引导经济和企业发展大方向；半官方机构如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等扮演“探射灯”角色，集中力量国际贸易协商和市场开拓；中华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总会等各大商会则弥补政府部门和半官方机构的不足，通过分析研讨会、实地调研考察等方式，为企业会员提供新兴市场详尽的投资指南，以及金融、基建、商贸等各方面具体需求的服务（梁海明，2016）。①

（二）与国外先进服务提供商合作共同承接“一带一路”外包业务

一些跨国公司在华机构大都具有高水平国际化能力与经验，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可与这些跨国公司开展战略与业务合作，共同开发“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通过与在华跨国公司合作，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合作增加主动近距离接触先进技术的机会，学习其技术运营管理等经验，获得服务外包技术实力提升，反过来，也有利于我国企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在项目分析、风险管理、国际化运营等方面优势，保障服务外包项目的成功实施。相对来讲，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还不是很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国际化经营的整套经验还比较缺乏，与跨国公司在华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开发“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不仅增强彼此之间的关系，为承接跨国公司欧美母国服务外包创造了机会，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经营风险。

（三）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自贸区等平台促进“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产业

目前，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抓手，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和名片。合作区不仅使中国优势产业在海外形成集聚效应，也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与成本。境外产业园区不仅为驻在国创造了就业、税收和技术进步，还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树立了良好的中国企业形象。在实际运行中，我国企业集体入驻境外园区，共同应对当地政策市场变化，争取更多市场话语权，有效缓解了企业运营压力，降低了我

①梁海明：《“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防范应借鉴香港经验》，光明网（理论频道），2016 年。

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有企业负责人还建议，在境外产业园区形成全产业链，要想形成综合竞争优势，必须由政府牵头，大家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另外，融资难是困扰园区发展升级的一大阻力。企业在海外建设产业园区，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需要加强融资方面的政策支持。政策补贴不宜取消，考核标准应该更加充实完善。另外，自贸区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据媒体报道，[①] 截至 2017 年 5 月，我国已与 2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自贸协定，其中涉及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 11 个。与沿线国家的自贸区研究和谈判工作还在积极进行中，将与 20 个沿线国家推进自贸区建设。这些自贸区协定大都对服务业双边扩大开放做出了很多优惠，从而为双边服务贸易便利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一带一路”服务外包要坚持稳步推进并注意防范风险

从总的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建设，通过支持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并同时增加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形成新的长期增长动力。政府及市场主体在开拓“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市场过程中要注重风险防范，实施稳步推进的策略。在政府方面，我国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使馆应及时发布所在国政治动态信息，在保障我国企业、人员、财务等安全方面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经济商务参赞处对所在国投资政策、产业规划、法律法规等进行详细说明，多组织国际投资洽谈会、说明会等活动，加强与当地专业性商会、协会的密切联系，了解并发布所在国服务外包项目需求。在企业方面，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出去”过程中，应仔细核准评估项目风险，充分做好前期相关可行性调研及风险预判。必要时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投资目的国进行风险评估，甚至通过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对象国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 姜荣春：《一带一路”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创新转型的路径》，《人民论坛》2017 年第 21 期。

2. 姜荣春：《一带一路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大发展》，《服务外包》2015 年第 3 期。

3. 李庭辉：《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与趋势》，《全球化》2017 年第 8 期。

4.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构建面向“一带一路”服务外包合作新体系（上、下）》，《国际商报》2016 年 6 月 24 日。

责任编辑：沈家文

①商务部：《将与 2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自贸区建设》，中国证券网，2017 年 5 月 10 日。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分析*

于　倩　侯玉山

摘要：本文在研究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6年数据针对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时间序列协整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稳定关系，能有效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　产业升级

作者简介：于　倩，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侯玉山，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构筑了新的宏观框架。与此同时，中亚五国经济增长强劲，正在成为国际投资的重心。在过往10年，国外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每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19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丝绸之路投资指南》指出，俄罗斯、美国、中国、荷兰和土耳其等国是中亚五国的主要投资国。目前，中国已与中亚五国在产能和投资领域展开合作，同时中亚五国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本国经济建设，也纷纷出台了新的引进外资和产业发展政策。面对明确的政策导向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加快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优

* 本文为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2016年度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YYY201613）。

化中国在中亚地区的产业布局，对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经济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相关的文献研究表明，对母国而言，产业结构升级与其对外直接投资联系密切。Vernon（1966）通过探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对外转移，发现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西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反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Kojima（1977）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失去或者即将失去竞争的产业逐渐展开，从而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空间。Lewis（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承接西方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推动西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Cantwell 和 Tolentino（1990）创立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先对周边国家进行投资，在此基础上进而转向发达国家。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Hiley（1999）和 Blomstrom（2000）对日本、Advincula（2000）对韩国的实证研究都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优化投资国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指出的是，Davis 和 Huston（1992）提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它出现空心化现象将会导致就业人数和工资的下降，并做了实证研究；Blomstrom（1997）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美国失业率上升；Ramstetter（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最大的就是国内的出口，而出口的变化又会引起就业和产出的变化。

虽然国内学者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定性分析转向大量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亚五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多位学者，如毕燕茹（2010）、康振（2011）、李东阳和杨殿中（2012）、王川（2013）、张文中（2014）、王国婷和任荣明（2015）、朱瑞雪和刘秀玲（2015）、朱智洺（2015）已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研究，他们从投资环境、现状、问题以及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等角度运用定性分析法探讨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情况。其中，李东阳（2011）、杨殿中（2012）是较早研究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杨殿中（2012）详细探究了中国企业在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点，并参照中亚五国产业发展方向，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直接投资建议。李东阳、刘亚娟、杨殿中（2013）利用时间序列协整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认为发展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能促进国内产业间结构的演进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但二者的研究数据来自

2011 年以前，未能对“一带一路”建设以后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选用 2004—2016 年的数据更具有说服力。

二、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投资规模

1．直接投资流量

（1）中国对中亚各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哈萨克斯坦。如图 1 所示，2004—2016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剧烈波动，2012 年到达峰值，为 29.96 亿美元，占中国对中亚国家总投资流量的 88.7%。2012 年以后，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流量迅速下滑，到 2015 年为－25.1 亿美元，2016 年有所回升。而 2004—2016 年期间中国对中亚其他四个国家直接投资流量较少，且振幅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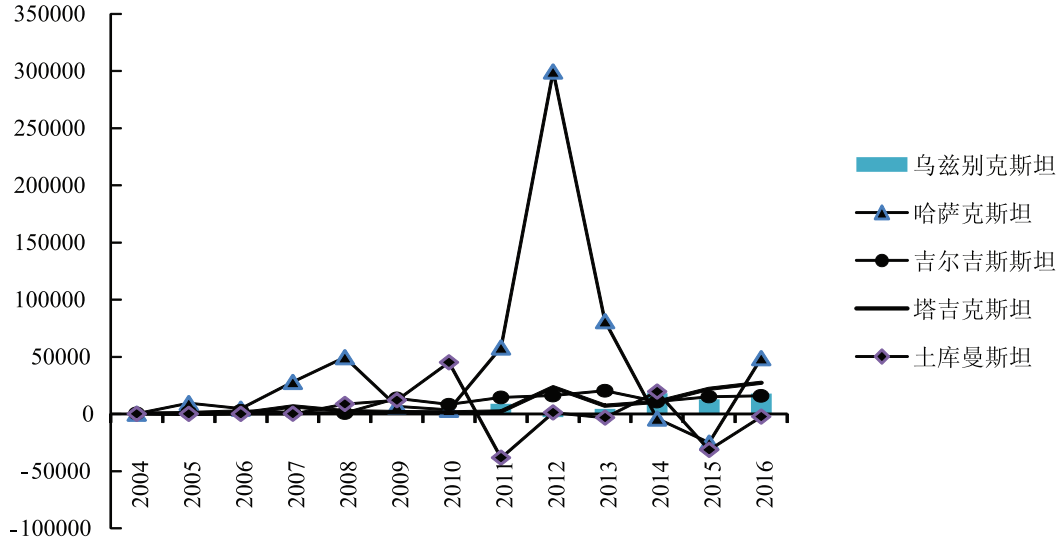


图 1　2004—2016 年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流量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总体流量。近年来，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剧烈变动。如图 2 所示，2004—2016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变动与图 1 中中国对哈沙克斯坦投资流量变动呈现一致，这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占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的 70%左右。

2．直接投资存量

（1）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如图 3 所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比仍为最大，2004—2014 年稳步增长，到 2014 年达到峰值，为 74.5 亿美元，是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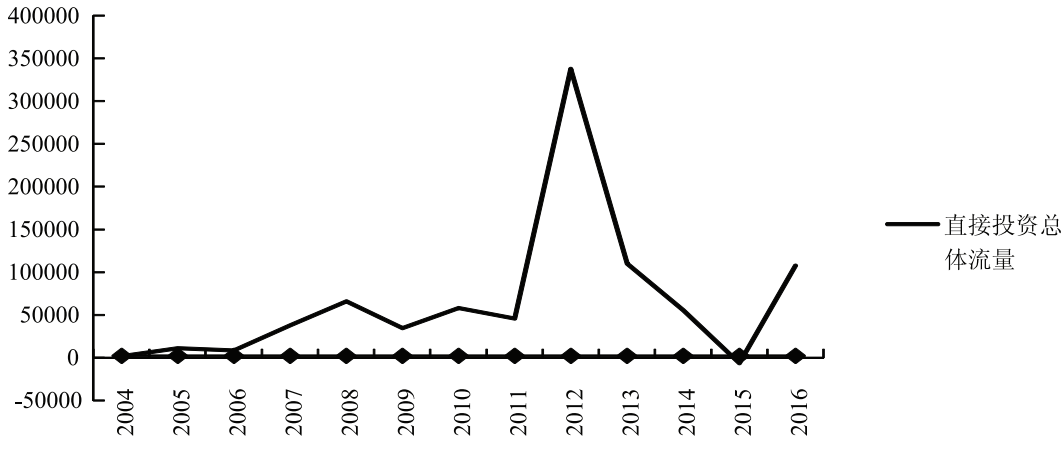


图 2　2004—2016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总体流量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年的 300.68 倍，增长迅速，之后出现一定下滑。对其他四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出现缓慢上升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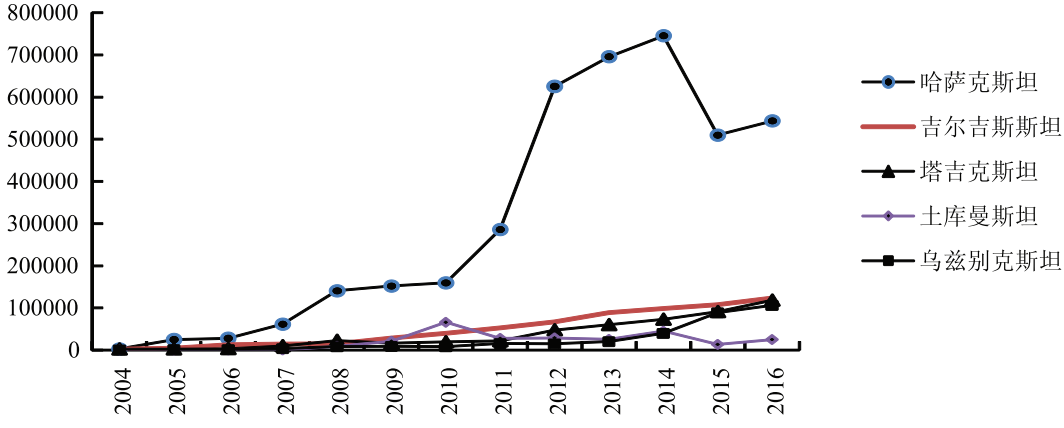


图 3　2004—2016 年中国对中亚各国直接投资存量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总体存量。如图 4 所示，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总体存量，在 2004—2016 年期间整体呈增长态势，2014 年达到峰值，为 100 亿美元，是 2004 年的 142.89 倍，之后有所回落，主要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吸引了中国对中亚的大量投资。

（二）投资主体

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初期主要以建立合资企业为主，但公司规模较小，投资主体为中国地方性中小企业。直到 1997 年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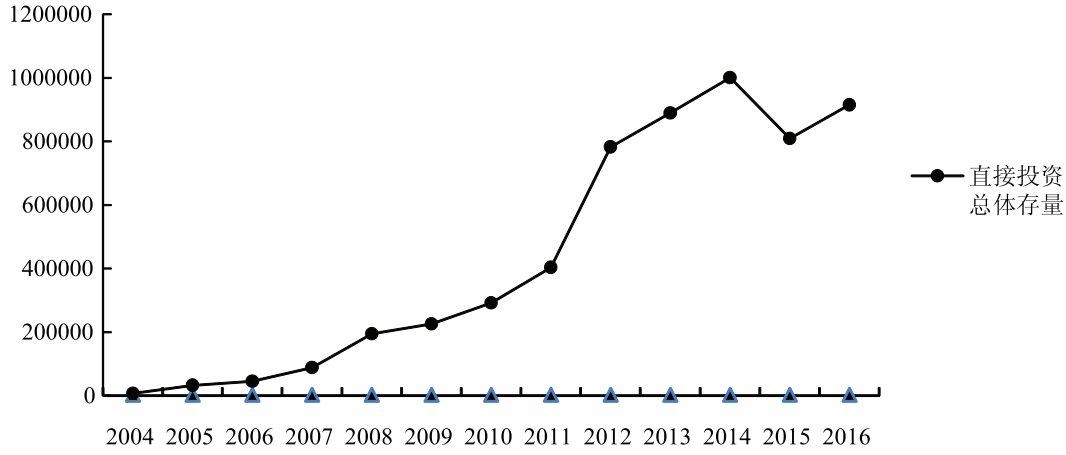


图 4　2004—2016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总体存量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天然气公司收购，从此国有大型企业才开始陆续对中亚五国投资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的主体。目前，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如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山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等已在中亚多国以合资公司、独资公司、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工程承包等多种投资方式开展业务。除此之外，在中亚国家投资的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如新疆特变电工、新康番茄加工厂、新疆野马经贸公司、凤凰实业等，其中大部分企业来自中国新疆。

（三）投资方式

受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体制差异的影响，中国对中亚各国在投资方式上有很大不同。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截至 2016 年末，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存量为 54.32 亿美元，在外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存量榜上排第 6 位。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投资主要是政府贷款和直接投资，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直接投资和贷款共 52 亿美元，合作实施项目 70 个，这与乌兹别克斯坦吸引外资的结构是一致的。据《2017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指南》显示，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主要是通过承包工程项目和贷款，2016 年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新承包工程合同 43 份，新签合同 4.6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5.57 亿美元，同时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向吉国贷款 12.96 亿美元，是吉国最大的债权方。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投资主要通过产能合作的方式，自 2009 年 12 月中土天然气一期开通至今，土库曼斯坦累计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超过 1300 亿立方米。随着中国在中亚国家投资领域的扩展，未来中资企业可以在交通、基础设施、通信等领域进行投资。

（四）投资产业分布

1．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6 年末，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存量为 54.32 亿美元，注册的各类中资企业 2637 家，主要集中在油气、石化、通讯、电力、汽车、工程机械、建筑、电子、金融、建材和商贸等行业。目前中国在哈国投资的项目有：中哈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扩建项目、中哈谢米兹拜伊油矿开发项目、阿特劳炼油厂深加工项目等。总体来看，中国对哈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开发等产业，涉及其他产业较少。

表 1　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产业分布

公司名称	投资产业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大庆油田公司	采矿业
新康番茄制品厂	制造业
新疆野马经贸有限公司、阿拉木图中国机电产品展示中心	批发和零售业
中国银行哈萨克斯坦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股份公司	金融业
中建总公司、中水电国际工程公司	建筑业
中兴通讯、华为	通讯业
南方航空公司驻哈萨克斯坦代表处	交通运输业
华油集团阳光酒店	酒店和餐饮业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南》（2017 版）。

2．对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目前，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注册企业约 260 家，合作范围涉及贸易、通讯服务、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农作物种植、动物养殖、食品和农业产品加工、金属冶炼、建材生产、轻工业、运输、房地产开发、建筑、餐饮、旅游、娱乐等多个领域和产业。① 近年来，双方在非资源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特变电工公司承建比什凯克热电站项目，项目价值 3.86 亿美元；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北—南公路”修复一期和二期工程项目，总金额分别为 4 亿美元和 3 亿美元。② 可以看出，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总量不大，但涉及领域广泛。

①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合作指南》

②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合作指南》

表 2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产业分布

公司名称	投资产业
中能国际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矿业
荣成威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新疆天山纺织有限公司	制造业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港越集团韶山食品有限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华阳生物有限公司、新疆恒久欧亚贸易有限公司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
中国水电国际工程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业
中兴通讯、华为	通讯业
南方航空公司驻比什凯克办事处	交通运输业
新疆天鹰实业有限公司	酒店和餐饮业
淄博炎煌经贸有限公司	矿泉水生产业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南》（2017 版）。

3．对塔吉克斯坦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中国在塔吉克斯坦主要投资企业有中元国际工程、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隆博实业有限公司等，主要涉及农业、电信、矿业等领域。据统计，2016 年中国对塔国直接投资流量为 2.72 亿美元，新签大型工程项目包括：新疆炼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中塔石油丹加拉炼油厂一期项目、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牙旺铁路项目、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塔吉克斯坦胡占德（Huzhand）燃煤电站项目等。[①]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中国对塔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

表 3　中国企业在塔吉克斯坦的产业分布

公司名称	投资产业
紫金矿业集团西北有限公司	采矿业
新疆协力纺织有限公司、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业
新疆美丽格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新疆天业有限公司	农业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新疆特变电工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业

①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合作指南》

续表 3

公司名称	投资产业
中兴通讯、华为	通讯业
龙城酒店、东方美食城、长城饭店	酒店和餐饮业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南》（2017 版）。

4．对土库曼斯坦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当前在土库曼斯坦注册的活跃中资企业有 21 家，合作领域包括能源、交通、纺织、食品加工、机械设备等。中资企业在当地合作的主要项目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承建的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中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执行的当地油井修复和钻井项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向土库曼斯坦出口通讯设备及网络设施改造项目。[①] 总体来看，范围较窄。

表 4　中国企业在土库曼斯坦的产业分布

公司名称	投资产业
华为、中兴通讯	制造业
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新疆三宝实业有限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中石油、中石化	采矿业
中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凤凰实业公司容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国家开发银行土库曼斯坦分行	金融业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驻土库曼斯坦代表处	交通运输业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南》（2017 版）。

5．对乌兹别克斯坦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截至 2016 年 12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的中资企业约 704 家，代表处 74 家，主要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管道建设和运营、铀矿勘探开发、煤矿、土地改良、制革、陶瓷、智能手机、农产品种植、畜牧养殖等业务。[②] 目前，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从事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企业有中信建设公司、中国水电、中铁隧道、中国重汽等。中国对乌国的投资范围较广，但主要涉及基建和能源方面。

①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合作指南》

②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合作指南》

表 5　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产业分布

公司名称	投资产业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采矿业
华为、中兴通讯、亿阳集团	制造业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新疆特变电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筑公司	建筑业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驻塔什干办事处	交通运输业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南》(2017 版)。

（五）投资区位分布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从图 5、图 6 中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在直接投资流量和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年均占比分别达到 60.55%和 66.86%。中国在其他中亚四国的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小，按平均直接投资流量/存量排序依次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中，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都在 10%以上，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都不足 10%，乌兹别克斯坦占比不足 5%。从各国的投资区位分布看，中亚五国的中资企业主要集中于首都、经济中心或能源丰富的区域。如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其经济中心阿拉木图和首都阿斯塔纳，部分采矿业企业集中在资源丰富的阿克纠宾、阿克套和克兹洛尔达州等地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于首都塔什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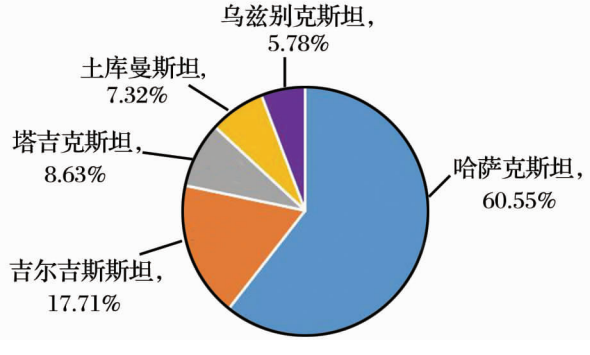


图 5　2004 —2016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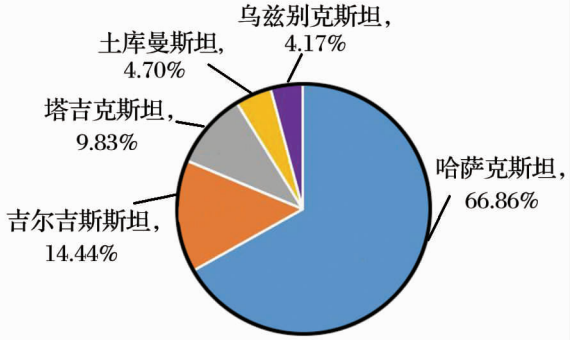


图 6　2004 —2016 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占比

数据来源：2005—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的及已有文献综述，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W = C + \beta_0 EX + \beta_1 DI + \beta_2 ODFI + \beta_3 TEC + \beta_4 INCOME + \varepsilon$$

W 为中国产业结构层次系数，EX 为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额，DI 为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ODFI$ 为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TEC 为研发资本存量，$INCOME$ 为居民收入，C 为常数，β_0、β_1、β_2、β_3、β_4 为系数。下文将对各变量进行解释。

1．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文章选用徐德云（2008）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法测定产业结构水平，该方法能准确考察产业结构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变化趋势。将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指标设定为 $W = Y_1 + 2Y_2 + 3Y_3$，其中 Y_1、Y_2、Y_3 分别为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用 W 表示，其变化范围在 1～3，若该值越小，则表明某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越低，若该值越大，则表明某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越高。

2．出口贸易

国际贸易是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其通过多种途径对一国产业结构产生作用。按照要素禀赋理论，随着该地区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提高该地区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复杂度，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同时，国际贸易的持续大规模开展会对一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产生影响，进而改变一地区产业结构。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因素作为国际市场对于本国产品的需求，也会通过需求结构因素对一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3．国内固定资产投资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是某一产业在一国或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一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生产方式的转变，先进的技术设备将吸收更多的资本投入，进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4．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会给母国带来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新兴产业促成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示范效应。房裕（2015）通过计量模型探究了国内产业结构变化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将积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

5．技术进步因素

历次工业革命对各国产业结构的重塑很好地诠释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此外，国内学

者大量的实证检验也说明产业结构的改变与技术进步之间关系密切（宋辉、李强，2003；黄茂兴、李军军，2007；傅元海等，2014），运用先进技术及深化资本利用，能够促进一地区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提升该地区劳动生产率。

6．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消费能力及消费结构受其收入水平的影响，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提升，消费结构和消费需要不断优化，进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本文尽量选择更长的时间跨度，但由于个别年份统计的缺失，本文最终以 2007—2016 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并经作者计算所得，固定资产投资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来自相关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研发经费（R&D）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并经作者计算所得，居民收入来自国家统计局。

（二）实证检验

计量方法上，鉴于数据可能会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性问题，本文运用 Eviews6.0 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数据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P 值大于 0.05，原序列不是平稳序列。

表 7　平稳性检验

Method	Statistic	Prob.**	Cross－sections	Obs
Null：Unit root（assumes common unit root process）				
Levin，Lin & Chu t*	2.84407	0.9978	6	54
Null：Unit root（assumes individual unit root process）				
Im，Pesaran and Shin W－stat	3.99030	1.0000	6	54
ADF－Fisher Chi－square	1.30200	0.9999	6	54
PP－Fisher Chi－square	0.96487	1.0000	6	54

2．一阶差分

由于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没有通过，因而对原数据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如表 8 所示，由结果可以看出一阶差分之后 P 值小于 0.05，则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

3．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 EG 两步法对模型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表 9 是对模型进行

回归的结果，通过对提取残差得到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的结果。由检验结果可知，各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原方程不存在虚假回归。

表 8　一阶差分结果

Method	Statistic	Prob. **	Cross－sections	Obs
Null：Unit root（assumes common unit root process）				
Levin，Lin & Chu t*	－9.03865	0.0000	6	40
Null：Unit root（assumes individual unit root process）				
Im，Pesaran and Shin W－stat	－3.61398	0.0002	6	40
ADF－Fisher Chi－square	39.3980	0.0001	6	40
PP－Fisher Chi－square	49.7993	0.0000	6	42

表 9　协整检验—回归结果

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EX	－4.40E－06	2.38E－06	－1.843628	0.1390
DI	－5.05E－05	3.02E－05	－1.670684	0.1701
ODFI	3.47E－07	1.15E－07	3.015324	0.0393
TEC	－0.167779	0.947980	－0.176985	0.8681
INCOME	－4.66E－07	2.90E－06	－0.160886	0.8800
C	2.291354	0.029766	76.97800	0.0000
R－squared	0.990185	Mean dependent var		2.353615
Adjusted R－squared	0.977916	S. D. dependent var		0.031151
S. E. of regression	0.004629	Akaike info criterion		－7.629163
Sum squared resid	8.57E－05	Schwarz criterion		－7.447612
Log likelihood	44.14581	Hannan－Quinn criter.		－7.828324
F－statistic	80.70753	Durbin－Watson stat		2.361481
Prob（F－statistic）	0.000417			

表 10　协整检验—残差项平稳性检验

Prob. *			t－Statistic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3.544307	0.0335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4.420595
	5% level		－3.259808
	10% level		－2.771129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得出，回归方程：$W = 2.29 + 3.47E - 07ODFI$。

（三）基本结论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度为 0.9779，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很好，F 检验和估计参数的 t 值都能通过 5%显著水平的检验。说明解释变量 $ODFI$ 对被解释变量 W 有显著影响，则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正效应，但效应较小。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是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较小，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 0.86%，因而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小。二是中亚国家作为中国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产业升级效应还没有显现。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产业升级的效应为正，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可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同时，无论从投资产业分布还是投资规模，西方国家在中亚五国投资与合作水平上远高于中国。但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投资前景良好，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对能源和矿产的巨大需求，刺激国内企业对中亚五国进行直接投资，而且中亚地区生产力成本偏低，土地使用价格也比较低廉，企业可以通过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方式节约成本，在转移国内边缘产业的同时也带动国内机械设备及其他产品的出口。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不仅有利于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而且能间接对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产生正向影响。

（二）优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依据前文的分析，多元化投资是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资发展的趋势，不仅专注于对能源和矿产类行业的投资，也在非能源行业小有成效，但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国内企业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传统行业。因此，应加快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第一，应持续扩大对其传统行业的直接投资。自然资源是中亚五国的优势：哈萨克斯坦的铬、钨等金属矿产资源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则是世界上重要的金、银等金属及矿产资源开采基地。因此，为满足国内需求，应持续增加对中亚能源、资源行业的投资。

第二，把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中亚五国只有哈萨克斯坦经济较为发达，其余四国比较落后。因此，中亚五国对大型机械设备有巨大需求。中亚五国劳

动力成本低廉，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拥有很大优势，同时，中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企业已经掌握了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制造工艺。根据上述分析，在对中亚五国制造业直接投资中，国内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不仅可以转移国内边缘产业，积极拓展外部市场，还能够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第三，增加服务业在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当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比重较小，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然而，作为未来产业的主要支撑，服务业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应把对中亚五国服务业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当前，金融和电信行业吸引了国内企业对中亚五国服务行业的主要直接投资，日后应当持续扩大对信息咨询和旅游业的投入。

（三）增强企业竞争力

第一，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海外投资的好坏与企业竞争力有很大联系。生产效率、品牌效应等方面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是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也保证了企业对外投资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当前，中亚五国成为世界强国博弈的主要地区，国家间的竞争尤为激烈，虽然中国部分企业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与国外企业相比竞争力仍有一定差距，缺少海外投资的竞争力。因而，国内企业应积极学习外企的先进经验，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

第二，提高企业海外经营能力。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商业活动，不仅需要前期周密的筹划、合理的经营，还需要售后服务等许多行为。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甚至当地文化都会严重影响企业海外投资。中亚五国腐败现象严重，法制还不完善，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这些恶劣的外部环境考验着国内企业海外的运营能力。因而，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营运能力，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前期考察要仔细，合理评价中亚五国投资环境，掌握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设置的壁垒及政策；二是不能盲目开展投资，要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之上选择最优的项目，同时项目合同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逐渐扩大投资规模；三是了解当地文化习俗，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四）发挥政府保障作用

第一，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资金缺乏一直是国内中小企业面临海外投资的关键问题。一是在进行海外投资时，贷款方面的各种障碍将抑制企业投资意愿。二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实力有限，处置风险的能力较差，银行不愿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导致中小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哈萨克斯坦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外企业在其国内融资相对比较容易。同时，中国个别银行在哈萨克斯坦设有分行，大大降低了国

内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融资门槛。但由于中亚其他四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管制很严，获得贷款的障碍较多，企业很难进行融资，严重抑制国内企业在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因此，政府应给予海外企业更多的信贷支持，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第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中国企业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会受当地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近年来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额增长迅猛，但很多企业对中亚内部市场和环境并不了解，尤其对于国内中小企业而言，收集信息的成本过高，同时其也很难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来制定合理的海外投资计划，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选择放弃海外投资，严重抑制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为在中亚直接投资的国内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为企业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当前，商务部每年都出版的《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合作指南》，为国内企业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支持。

参考文献：

1．段秀芳：《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及问题剖析》，《新疆财经》2009 年第 6 期。

2．李逢春：《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 年第 6 期。

3．杨殿中：《中国企业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及产业选择建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9 期。

4．李东阳、刘亚娟、杨殿中：《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以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为例》，《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

5．杨建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的区域比较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6．许云霞、王颂尧：《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新疆财经》2016 年第 4 期。

7．张志刚：《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8．Akamatsu K. The Synthetic Principle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 Journal of Economy*，1932（6）.

9．K. Kojima.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apanese Model of Multin－ ationalBusiness Operations*. London：Croom Helm，1977.

10．J. H. Dunning.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81，117（1）.

责任编辑：李　蕊

·宏观经济·

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的评估、原因与对策

张焕波　孙晓涛　郭迎锋

摘要：首次建立了经济脱实向虚评估指标体系。根据 2010—2017 年数据合成了指数，发现 2016 年之前经济脱实向虚程度呈逐年增长，其中“金融体系自我循环”指标上涨幅度最大，表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最大问题主要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和空转。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根源是“实”的部门相对沉闷，“虚”的部门相对活跃，建议增强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对实体经济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力度，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同时，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管理体系，增强银行经营灵活性，提高县域金融服务能力。

关键词：经济脱实向虚　指标体系　实体经济　金融支持

作者简介：张焕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孙晓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郭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脱实向虚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如何界定脱实向虚仍存在争论，同时也还没有定量评价脱实向虚的相关研究。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也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一、经济脱实向虚概念界定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应当充分发挥两种形态的作用，并保持合理的关系与比重。一般而言，实体经济是一切为满足人民各种物质、文化需求而进行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流通活动，既包括现实经济世界中的第一、第二产业，也包括第三产业中的运输业、批发与零售等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价值增值活动。虚拟经济既包括实体经济运行中产生的适度虚拟价值，也包括资本从货币到商品再到增值的货币的生息运动。以某种资产标的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依托金融系统、通过资本融通进行循环运动。虚拟经济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

经济脱实向虚整体上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整体失衡状态及其过程。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信用溢价所产生的泡沫化、虚拟化、投机化和债务化。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需要客观理解与把握。当前所批判的脱实向虚中的虚，不是指合理存在的虚拟经济，而是过度投机所产生的泡沫化虚拟经济。例如，房地产满足其居住需求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作为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属于合理的虚拟经济范畴；用于短期套利的过度投机行为属于不合理的虚拟经济范畴。但这种界定标准在实际过程中难以把握。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运转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各有其积极作用和合理成分，也有各自的消极作用和落后成分，不能简单地说实体经济比虚拟经济更好。实体经济中的高能耗、高污染、低劣质的落后产能和产品需要淘汰；虚拟经济中的有某些积极作用的活动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例如，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外币及利率的掉期交易等经济活动有其积极作用。因此，既要对何为实体经济、何为虚拟经济进行科学界定，更重要地是对脱实向虚的“度”进行科学深入的分析。总体上看，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根本原因在于把本该属于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到了虚拟经济。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本研究报告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界定主要是看资金是否合理流入制造业。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经济脱实向虚进行界定，并进行研究、评估、分析和提出对策建议。脱实向虚的五个表现分别是：一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封闭循环；二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弱化；三是制造业发展脱离主业，过度投资泡沫经济；四是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业泡沫化；五是资金过度流向地方政府相关平台。

二、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总体评估

为更好地了解我国当前经济脱实向虚的现状，有必要建立经济脱实向虚评估指标体

系，进行数据验证分析。结合脱实向虚各方面影响因素，我们选择金融体系自我循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弱化、制造业本身向虚、房地产泡沫化、政府平台过度发展五大板块，进行脱实向虚指标体系的构建。表 1 给出了指标体系选取情况。我们对初始指标数据进行查找筛选，最终整理了 2010—2017 年 8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对 3 个指标（即目前难以获得数据，但期望未来加入的指标，在表 1 中加 * 予以表示）进行了剔除，五大类指标共有 20 个初始指标。

表 1　经济脱实向虚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经济脱实向虚评估指数	1、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封闭循环	1.1 金融业增加值/GDP
		1.2 银行理财产品余额/银行总资产
		1.3 委托贷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
		1.4 金融业资本利润率
	2、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弱化	2.1 制造业贷款/各项贷款余额 #
		2.2 小微企业贷款/各项贷款余额 #
		2.3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2.4 融资租赁合同余额/GDP #
	3、制造业本身向虚	3.1 工业增加值/GDP #
		3.2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贷款额/金融业贷款总额 *
		3.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
		3.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 #
		3.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4、房地产泡沫化	4.1 房地产销售收入/GDP
		4.2 房地产企业集中度 *
		4.3 房地产业上市公司销售利润率
		4.4 房地产业资产负债率
		4.5 房地产百城价格指数
	5、政府平台过度发展	5.1 政府融资平台相关行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
		5.2 政府融资平台相关行业贷款余额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合计/各项贷款余额

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既包括绝对量指标，又包括比率指标，需要对指标做标准化处理，才能具有比较意义。为此，我们采用以 2010 年指标为基准 100 的标准化方法，即所有指标 2010 年的指标值统一标准化为 100，对正向指标（指标越大脱实向虚情况越严重）的标准化值，采用公式 B = （Xi/X2010）×100 计算；对于负向指标（指标越小脱实向虚情况越严重，这部分指标在表 1 中加♯予以表示）的标准化值，采用 B = 1/（Xi/X2010）×100 计算。其中，Xi 表示 i 年初始指标的实际值，X2010 表示 2010 年初始指标的实际值。在计算一级指标综合值时，为减少人为判断的影响，采用等权重的计算办法直接由二级指标等权重合成一级指标值，再由一级指标等权重合成综合指标。

（一）脱实向虚指数持续攀升

从总指标来看（需要指出，这里的指标的数值越高，代表脱实向虚情况愈加严重，设定各指标 2010 年值均为 100），2010—2016 年呈现逐年持续增长态势，2010 年总指标数值为 100，到 2016 年已经达到 123.78；但 2017 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回落至 117.97。从一级指标来看，“金融体系自我循环”指标 2010—2016 年上涨幅度最大，表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最大问题在于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和空转。但是，2017 年该指标下降幅度在所有一级指标中也最大，说明近期开展的相关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弱化”指标 2015 年之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银行对中小企业支持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2016—2017 年连续两年有所回升。“制造业本身向虚”指标 2011—2016 年总体平稳，略有下降，2017 年下降幅度扩大，表明制造业自身仍关注实体经济发展。“房地产泡沫化”指标在 2016 年前基本平稳，但 2016—2017 年开始突然拉升，主要是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引起了连带效应。“政府平台过度发展”指标呈现明显的先升后降趋势，在 2014 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逐年下降，说明政府平台规范发展取得积极效果，但对地方债务问题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封闭循环问题突出

2010—2015 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封闭循环状”一级指标走势几乎呈一条直线，历年增长速度大致相等。但是，2016 年增速开始放缓，2017 年出现加大幅度下滑。从二级指标来看，除“金融业资本利润率”指标呈现下滑趋势外，其余指标在 2010—2016 年间均呈上升趋势。“金融业资本利润率”指标的下滑表明在经济面临整体下行的压力下，金融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其他三个上升的二级指标中，“银行理财产品余额/银行总资产”和“委托贷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两个指标，在 2010—2016 年间存在十分突出的上涨趋势。2016 年“银行理财产品余额/银行总资产”指标是 2010 年的 4.2 倍。随

着监管趋严，2017 年这两个二级指标均出现回落，但总体上仍处于高位，仍然蕴藏较大风险，需要引起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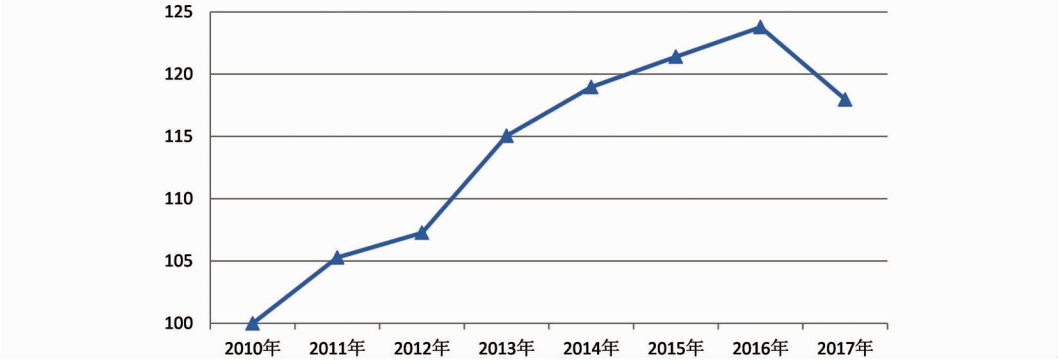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经济脱实向虚总指标走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司尔亚司（CEIC）数据库等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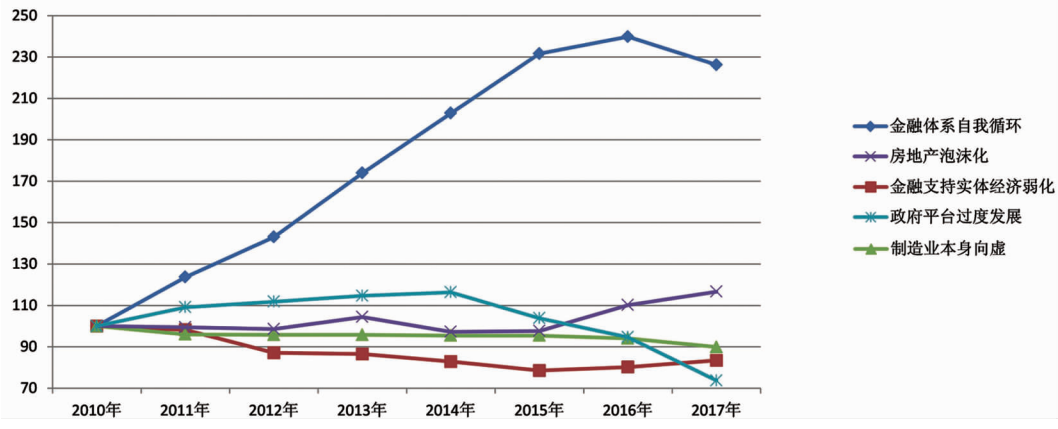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经济脱实向虚一级指标走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司尔亚司（CEIC）数据库等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三）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弱化问题有所反复

2011—2015 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弱化”一级指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在逐年增强，但 2016—2017 年该指标有所上升。从二级指标来看，“制造业贷款/各项贷款余额”指标 2014 年以来逐年上涨，表明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尚待提高。“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说明融资租赁业逆市上扬，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小微企业贷款/各项贷款余额”指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表明在政策调控下，小微企业的发展得到贷款支持的力度日益增加。“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指标亦波动下降，表明在近几年宽松货币政策的指引下，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有助于实体企业的发展，但该指标 2017 年出现一定的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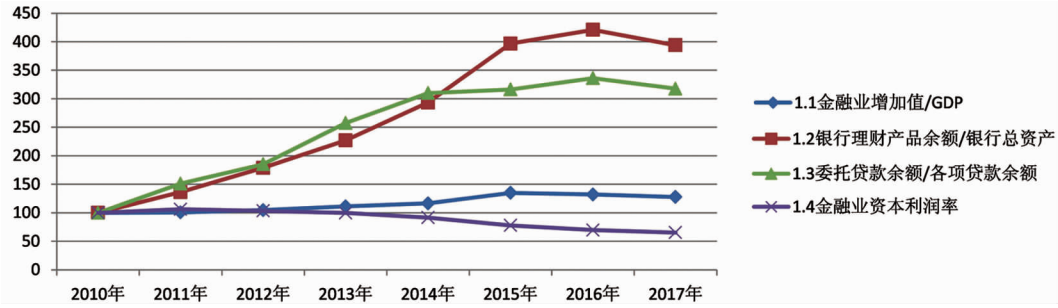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17 年“金融体系自我循环”项二级指标走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司尔亚司（CEIC）数据库等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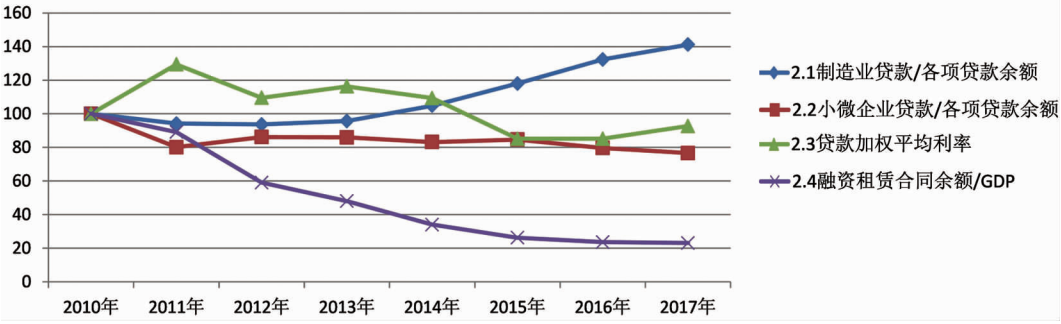


图 4　2010—2017 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弱化”项二级指标走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司尔亚司（CEIC）数据库等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四）制造业仍关注主业发展

2011—2016 年，“制造业本身向虚”一级指标总体平稳，略有下降，2017 年下降幅度扩大，表明近年来制造业总体上仍关注主业发展，2017 年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从二级指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① 指标持续下降，从 2010 年的 100 降低到 2017 年的 61.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指标 2015 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2016—2017 年出现好转。“工业增加值/GDP”指标 2016 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2017 年出现好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指标近年来持续下降，但下降幅度总体不大。

（五）房地产市场泡沫化风险值得警惕

2016 年之前，“房地产泡沫化”一级指标基本平稳，其中 2013 年略有波动，但 2016 年和 2017 年开始突然拉升，从 2015 年的 97.64 上升至 2017 年的 116.65，表明近两年房

①2017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数据无法得到。此处，笔者假定 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速与全部研发经费支出增速相等，据此，利用 2016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数据，推算出 2017 年数据。

地产市场泡沫化风险加剧。从二级指标来看，“房地产百城价格指数”和“房地产销售收入/GDP”两个指标 2015 年之前虽然存在一定波动，但总体上比较平稳，2016—2017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上升。并带动了“房地产业上市公司销售利润率”在 2016 年出现触底反弹，2017 年大幅上升，2015 年之前该指标在持续大幅下滑。“房地产业资产负债率”指标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上升，但总体幅度并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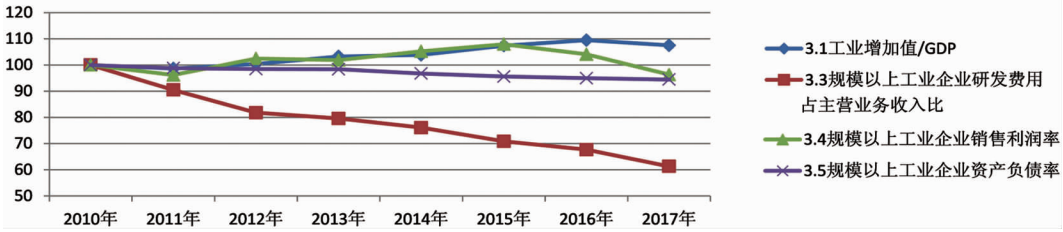


图 5　2010—2017 年“制造业本身向虚”项二级指标走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司尔亚司（CEIC）数据库等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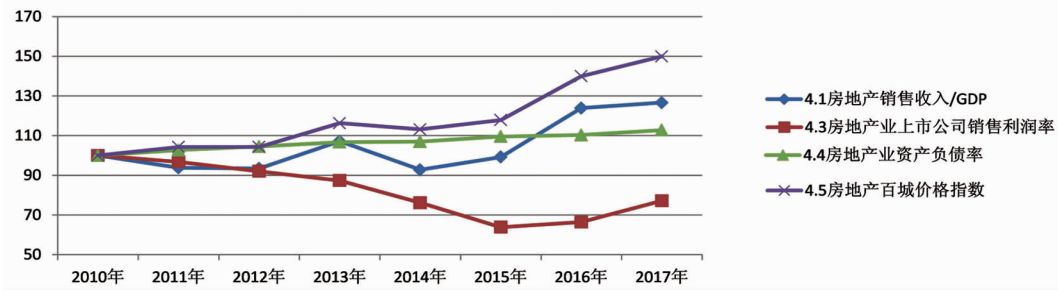


图 6　2010—2017 年“房地产泡沫化”项二级指标走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司尔亚司（CEIC）数据库等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六）政府融资平台过度发展得到遏制①

“政府平台过度发展”一级指标呈现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在 2014 年达到最大的 116.35，之后开始逐年下降，至 2017 年已经降至 73.7。该一级指标下仅含“政府融资平台相关行业贷款余额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合计/各项贷款余额”一个二级指标，该指标的变化与 2015 年国家开始对政府平台的债务实行管控有很大关系，说明政府平台过度发展的状况正在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经济脱实向虚原因分析

近年来，世界经济迟迟无法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

①近几年迅速增长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值得关注，但因缺乏标准认定和统计数据而难以估算。文内数据均为根据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计算而得。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往靠经济高速发展掩盖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资金在经济部门间分配不平衡的问题逐渐突显。具体来看，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着增长乏力的传统部门、缺少资源的弱势部门、垄断资源的强势部门、容易被炒作的活跃部门、承担资金中介的金融部门。对于趋利避害的资金来讲，总体上“实”的部门相对沉闷，“虚”的部门相对活跃，这成为当前脱实向虚问题的根源。

（一）金融体系自我循环的原因分析

当前，利差收窄和不良贷款高企严重挤压了银行的利润空间。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银行开始逃避各类提高经营成本的金融监管，追逐更复杂更有利可图的通道业务。为了配合银行表外业务的开展，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广泛参与到业务链条的各个环节，金融机构间的业务随之迅速增长。

具体来看，一是银行表内信贷投向受到严格监管。我国银行机构的贷款业务面临较为严格的投向监管，为了使资金能够流入监管限制类领域和项目，只能寻求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通道，由此便带来了资金在金融机构间的流动。二是银行高成本满足存贷业务监管要求。银行为满足各类监管要求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包括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等。三是银行具有转移不良资产的需求。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高企，目前不良资产打包转让价格远低于银行的评估，银行也期望随着经济好转不良资产价值得以回升，所以金融体系内部隐蔽不良资产的交易活跃，涉及资金规模庞大。四是非银资管业务发展突飞猛进。银行通道业务的发展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通道功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资管业务运作实力的增强，开始主动选择项目和寻找资金，在业务链条中发挥更多的主动作用，资管业务更为复杂化，规模扩张速度也更快。五是资管行业监管规则不统一。虽然各类机构资管业务的性质是相同的，但监管规则却存在较大差异，不同领域资管业务的政策垄断，为各类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六是银行存在做大规模的冲动。在资金来源方面，更多地依靠同业业务，在资金运用方面，更多地投资于债券市场或委托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由此大幅提高了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规模。

（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弱化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货币政策积极引导利率水平下行，银行贷款利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但与银行利率相比企业利润率的下降更为明显，使得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同时，信用风险高是金融机构不愿为实体企业特别是小型实体企业提供资金的根本原因。2012 年以来，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为主的实体企业的信用风险大幅提升，金融机构投入资金的意愿

更是不足。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实体企业特别是小型实体企业的信用风险需要通过政策支持进行部分缓释，我国这方面的体系还不健全。

具体来看，一是实体企业信用风险问题突出。目前，应对资产质量的持续恶化成为银行的重中之重，而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实体企业恰恰是不良贷款的高发区。二是缓释小型实体企业信用风险的政策体系不健全。我国还没有缓释小型实体企业信用风险的顶层设计，还没有专门支持小型实体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和转贷资金等模式还处于各地方政府实践阶段，覆盖面较低，成效不显著。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到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较晚，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也还不到位，现有体系还无法有效支持实体企业的信息披露需求。四是专门支持小企业的银行机构不足。县域银行实力不足，县域银行体系更多充当了抽水机功能，同时我国还缺少专门为小企业提供服务的政策性银行。五是银行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虽然我国银行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获得了较大提高，但整个银行体制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无法满足市场化经济的需求。六是新型金融机构发展不充分。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发展不充分，股权融资占比偏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行业发展也不充分。

（三）制造业发展脱离主业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大量实施了转型升级战略，企业科研投入快速增长，产品不断走向高端，新产品和新业态曾出不穷。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工业部门整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增长乏力、利润偏低、杠杆率高，使得这些传统实体经济部门成为资金大量流出的主要领域。

具体来看，一是传统实体企业利润率偏低。近年来，我国传统实体企业经营环境较差，利润率与部分虚拟经济相比偏低，大量实体企业出现亏损。这是实体企业脱离实业，从事虚拟经济的根本原因。对沪深股市上市公司 2016 年年报汇总分析显示，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4.2%和 12.8%，而制造业净资产收益率仅为 8.8%。二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传统的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环境和资源的弱约束、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原有竞争优势在持续弱化。三是新增长模式还没有完全形成。劳动生产率水平整体较低、产品附加值低，新增长模式还难以支撑实体经济走出困境。四是实体企业存在做大规模的冲动。我国大量实体企业具有强烈地做大规模的冲动，无论选择何种领域进行突破，实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便或多或少地向虚拟经济发展是普遍存在的。五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的高信用等级能够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客观上促使国有企

业从事以钱生钱的活动。六是虚拟经济在税收方面存在优势。例如我国仅对利率、股息、红利等征税，而没有对资本利得征税，这大幅降低了资产交易类企业的税负。

（四）房地产泡沫化的原因分析

房地产行业在脱实向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房地产行业吸引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流入，对其他实体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二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吸引实体企业参与其中；三是商品房本身成为优良资产，商品房交易吸引了大量资金参与。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归根到底还是商品房价格长期单边上扬的走势。

具体来看，一是借银行资金杠杆炒房成为房价的主要推动力量。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规模毕竟有限，推动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动力是企业和个人撬动了银行资金参与其炒房行为。二是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2013—2016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之比分别为 59.8%、56.2%、39.2%和 43%。究其根源是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地方财政承担了过多的刚性支出责任，地方财政收入却显不足。三是城市商品房存在刚性需求。城镇化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加，新增人口更多是处于工作年龄，有强烈在城市落户生活的人群，对于大城市尤其如此。四是多层次住房市场发育不健全。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被忽视，住房租赁体系发展也很差，住房更多作为投资品，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购买商品房的事实，足以对房价进行强有力的支撑。五是社会财富差距较大。2016 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65，社会财富的基尼系数会高很多，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少部分人将具有更强大的购买力，可以对住房给出更高的价格。六是居民投资领域有限。我国财富管理行业、股票市场、信托、保险等成熟度不高，同时居民自身的金融知识也不足。

（五）地方政府平台过度发展的原因分析

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成为资金或明或暗的主要流向领域，银行信贷、各类资管业务、各类私募基金等大量以地方政府项目作为标的资产，由此对其他实体经济造成了挤出效应。

具体来看，一是地方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强烈。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城市的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居住适宜、生活便利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地方财政无法满足建设资金的需求。地方财政刚性支出责任较大，在现有财力基础上再进行城市建设的投资，仅靠地方财政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机制仍然不健全，地方政府为地方建设举债方式层出不穷。四是地方政府积极发展金控平台。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设立地方性的金融控股集团，并已经发展成为金融行业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获

取资金的主要抓手。

四、政策建议

我国当前处于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的阶段，农业人口占比仍高达42.7%，人均 GDP 仅为 8200 美元，为美国的 14%、日本的 24%、德国的 20%、韩国的30%，制造业正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迈进，大量品牌和技术仍然来自国外，核心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也还要依赖国外进口。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强国建设仍需依靠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因此，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避免脱实向虚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一）建设适合国情的金融管理体系

立足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正确认识发展经济仍然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处理好金融监管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避免金融监管阻碍和超前经济发展。明确金融监管的界限，适当弥补金融创新业务监管不足问题的同时，要增强传统金融业务的市场化水平，减少对传统金融业务的行政干预。金融监管部门要更加重视金融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体系，修改不适应当前金融业务开展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使金融机构更好地满足市场化的企业的金融需求。从实际情况出发，避免照抄照搬国际标准，尤其是发达国家制定的适合其自身的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案和标准。四是支持创新融资工具和业务的发展。

（二）摆脱县域银行体系抽水机模式

以抑制县域资金外流和提高县域存贷款转换率为主要方向，加强和改善县域银行服务供给，具体包括如下建议：开展国有银行县域支行法人化试点。坚持法人导向，发展“一县两行”，支持农商行、村镇银行做优做强，充分发挥“两行”在县域银行业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县域资金供给。金融机构要重视县域金融的发展，深耕县域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

（三）建立与中小微企业相适应的金融供给体系

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情况，结合金融体系实际，建议设立中国小企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小企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统一实施国家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小企业发展银行由财政部全额出资，以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和接受央行补充抵押贷款（PSL）等货币政策资金作为主要资金来源渠道。主要职能为，直接或通过其他金融机构转贷方式

提供限额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为金融机构限额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或再担保，与转贷资金配合使用，激励金融机构共同承担可能的贷款损失。为小微企业提供票据贴现和再贴现，对重点领域大型企业为小微企业开具的承兑汇票提供承兑补贴和优惠信贷。承接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研究国家小企业发展政策，为小企业提供咨询培训服务和市场信息。

（四）发挥公共资源在缓解薄弱环节融资的作用

在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等薄弱环节，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承担更多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进入相关领域的积极性。设立政府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发展引导基金，广泛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共同成立发展基金。完善金融机构贷款损失补偿机制，组建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风险补偿基金，增加财政支持做大基金规模，对提供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融资服务的银行、担保、保险等机构给予贷款风险补偿，放宽政府支持行业的金融产品的准入条件。进一步完善政府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融资担保体系和转贷资金基金等制度，进行国家顶层设计，提高扶持力度。发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发挥信用保证保险的融资担保和增信功能。

（五）完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加快调整税制结构的步伐，积极清理各种税费，继续改革完善增值税。以广税基、低税率为目标改革我国现有税收体制。由省财政部门牵头督促地市级及以下政府尽快出台降低“五险一金”的执行细则，把降低企业成本落到实处。国产设备抵扣增值税，要解决经济下行期利润降低无法抵扣的问题。着力降低企业税费、物流、用工、用能、制度性交易等各方面成本，重点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不合理收费。尽快明确金融企业利息支出抵扣增值税的相关标准。

（六）从实际出发提高银行经营的灵活性

在监管部门增加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的同时，金融机构也要提高自身运营的灵活度，满足我国高度市场化的企业的融资需求。银行机构要减少对抵质押担保的依赖，更多依靠第一还款来源，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评价贷款的信用风险水平，增加信用放款在贷款中的比例，适应我国经济领域轻资产、创新型、研发类企业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也为了更好地提高对缺少资产为特征的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银行机构要开展期限更为灵活的信贷业务，缩减放款审核时间，开发更多个性化产品，更好满足企业多种信贷需求，提高企业信贷体验。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机构要勇于接受经营中的风险，

提高对信用风险的容忍度，对信贷相关人员做到尽职免责。对于暂时出现经营和资金困难的企业的贷款，银行和企业需要“相向而行”，多从对方角度出发加强沟通、促进合作。银行要尽力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节省企业不必要的开支；企业要尽力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满足银行的监管要求，最终寻找到银行和企业的合理平衡点。银行在提高经营灵活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信贷人员的内控管理，使信贷人员建立合规开展业务的理念，建立大局观，将自身经济利益与银行利益紧密结合，避免追求个人短期利益影响银行利益。

（七）提升实体企业自身竞争力

大型企业和部分具有实力的中型制造企业应通过提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水平。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支持力度，通过补贴、专项基金、引导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和产业基金等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努力做到“研发一代、储存一代、使用一代”，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要弘扬“工匠精神”，提高制造业人员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制造业岗位的吸引力。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现有财政资源的作用，重点推动应用技术型高等学校建设、多领域综合技术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与工程型人才的衔接。

（八）理顺企业市场出清相关机制

要正确对待经济下行阶段经营不善企业的市场出清现象，避免过度投入政策性资源和金融资源人为限制企业出清。要完善企业破产程序，理顺企业破产流程，提高企业破产效率，建立完整的破产企业重组制度框架。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社会诚信观念，提高企业和企业主的违约成本，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九）多层次化解企业间债务及相互欠款问题

建立国家级大数据清债平台。与债转股一样，建立清债平台是解决债务问题的重要手段。运用“互联网＋”思维，建立大数据债务清理平台，通过大数据算法主动提取债务链，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加强对政府部门和央企的管理，相关采购信息要及时、有效、真实公示，应付款项要及时给付。政府部门和央企要积极配合供应商的融资，如开局相关证明、保函、对商业汇票进行承兑等，促成金融机构对供应商融资业务的开展。对承接政府和特定行业央企项目的企业进行约束，减少应付款项。

（十）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脱离价值过度膨胀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总定位，在一、二线重点城市征收个人

非营业性用房的房产税。鼓励租房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房地产市场供给。政府要在租房市场中发挥引导作用，将租房市场作为部分现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改制后的主营业务方向。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以政策价出租给政府公益性租房机构的个人房产免收房产税，财政从土地出让金中划拨确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补贴租房市场中的低收入人群。加强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管理，打击变相的囤地和捂盘行为。

（十一）有效控制国有企业杠杆率水平

建立以杠杆率为基础的国有企业约束机制。分门别类确定企业的杠杆率标准，对企业经营层形成约束的同时，更要对作为企业出资人的政府形成约束。政府部门要有效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责任，适当增加自身债务降低国有企业债务水平，以时间换空间，缓解当前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十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债务

厘清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的契约关系，提高双方结算关系的清晰化程度，建立地方政府及时支付投融资平台款项的约束机制，提高投融资平台资产的流动性，保障金融机构的债权利益。推进投融资平台信用体系建设。投融资平台要从组织架构、制度流程、信用信息管理等方面出发，逐步建立信用管理体系，提升自身信用管理能力。建设透明、健康的地方政府财政体系。建立涵盖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在内的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体系，建立地方政府中长期预算机制。

参考文献：

1．陈文玲：《互联网与新实体经济》，《中国流通经济》2016 年第 4 期。

2．陈文玲：《论实物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从崭新的视角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管理世界》1998 年第 6 期。

3．李若谷：《对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分析与思考》，《金融监管研究》2014 年第 11 期。

4．李若谷：《金融改革应处理好几个关系》，《中国金融家》2014 年第 6 期。

5．李若谷：《金融机构改革应坚持市场化方向》，《金融时报》2015 年 11 月 16 日。

6．李若谷：《警惕误导，坚持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经济导刊》2016 年第 9 期。

7．李若谷：《西方思维与体制解决不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国与世界观察》2011 年第 3、4 合期。

8．王晓红：《振兴实体经济要做好民营企业这篇大文章》，《经济日报》2017 年 3 月 24 日。

责任编辑：谷　岳

·权 威 观 点·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8 年 8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和专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IMF：各国需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 2018 年《对外部门报告》中，公布了对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等全球 29 个主要经济体和欧元区整体经常账户收支状况的最新评估结果。IMF 认为，全球各经济体外部失衡持续可能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导致金融环境收紧加快，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IMF 呼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挑战。

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有所收窄，并在过去五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约为全球生产总值（GDP）的 3.25%。但分析表明，这些全球收支中约有 40%至 50%属于过度收支，并且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全球失衡持续存在助长了保护主义情绪，保护主义政策升级直接损害各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报告建议各经济体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为这不仅会伤害本国和全球经济增长，而且对纠正全球失衡并无帮助。各经济体应当通过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来推动贸易自由化，解决贸易争端。

（二）WTO：全球贸易扩张势头进一步放缓

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最新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报告称，2018 年三季度世界贸易扩张势头将进一步放缓，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为 100.3，低于此前的 101.8，表明未来几个月全球贸易增长将放缓，总体上符合全球贸易中长期趋势。

最新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显示，全球贸易扩张动力有所减弱，具体体现在出口订单下降和汽车产销走势疲弱，这一症候可能是对近期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反应。该指数与世贸组织2018年4月12日发布的全球贸易预测大体相符，即商品贸易额增速将从2017年的4.7%放缓至2018年的4.4%。预测显示，不断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将继续给未来贸易带来风险，WTO将继续密切关注贸易紧张局势的演变。

报告说，全球出口订单指数（97.2）在过去一年逐步下降，汽车产销指数（98.1）虽然最近略有上升，但仍低于趋势水平（100）。受上述因素影响，最新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总体下降。其中，航空货运指数（100.9）和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指数（102.2）虽然仍高于趋势水平（100），但二者增长已过峰值；电子元器件指数（102.2）继续保持高于趋势水平（100）状态，农业原材料指数（100.1）略高于趋势水平（100）。

WTO介绍，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旨在提供与趋势相关的世界贸易轨迹“实时”信息，并按季度更新，其主要作用是分析和确定全球贸易增长的转折点和动力。如果全球景气指数的指标值是100（基准值），则意味着贸易增长与近期趋势保持一致，指数大（小）于100则意味着贸易增长高（低）于趋势水平。

（三）瑞士预测研究所：保护主义不可能长久影响世界

瑞士预测研究所近期进行了全球趋势预测研究。全球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推行的那种保护主义长期影响全球经济，那么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显著降低。到2020年，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将比以前下降0.4个百分点，到2025年将下降0.6个百分点。此外，这项对未来几十年进行预测的报告还显示，欧洲将失去重要性。

预测研究所并不认为保护主义可能会长久影响世界。该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虽然个别事件——例如反全球化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或英国公投支持脱欧——表明反对加强贸易自由化的人赢得了影响力，但我们仍然预计保护主义不会大幅扩大，美国迄今宣布征收的关税也不会导致持续的贸易冲突”。

总体而言，到2045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75亿增加到95亿，而欧洲人口将减少。届时亚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50%。印度将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全球经济增长率每年不足4%。到2045年，全球经济增长有1/3来自中国。但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四）FAO：7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大跌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日前发布的最新食品价格指数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

数 2018 年 7 月出现大幅下跌，所有主要贸易品种均呈现明显下滑，其中领跌的品种为乳制品和糖类。报告显示，7 月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较 6 月份降低 3.7%，这是自 2017 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最大月度跌幅。该指数在 2018 年 6 月份前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

报告指出，乳制品价格指数跌幅为 6.6%，黄油和奶酪报价较全脂和脱脂奶粉报价跌幅更大。糖价指数下跌 6%，达到近 3 年来的低点，主要原因是印度和泰国这两个重要产糖国生产预期改善。虽然世界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巴西的产量下降预期限制了国际糖价下跌，但这样的下跌幅度仍然引人关注。2018 年 7 月份粮农组织谷物价格指数比 6 月份下降了 3.6%，低于一年前的水平。同时，小麦、玉米和大米的出口报价均出现下跌。

粮农组织指出，植物油价格指数目前处于 2016 年 1 月份以来最低水平，下跌 2.9%，是连续第 6 个月下跌。报告认为，大豆市场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影响下出现疲软，这也是 7 月份植物油价格指数出现下滑的原因之一。不过，在生物柴油生产商需求上升和欧盟作物产量负面预期的推动下，全球菜籽油价格逆势上扬。

（五）IIF：新兴市场继续面临资金流出压力

国际金融协会（IIF）近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18 年初以来，受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遭受一定冲击。近期土耳其危机再度拉升恐慌指数。3 月底以来全球股市跌多涨少，新兴市场几乎全军覆没。近日土耳其金融市场震荡带动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货币连环下跌，再度波及了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股市行情。

随着全球流动性开始紧缩，2018 年 5 月和 6 月，资金大量流出新兴经济体。美联储宣布加息后，资金流出尤其明显。资金流向监测机构 EPFR 的数据显示，仅在截至 6 月 20 日的一周里，全球股票基金的周资金流出量创下 81 亿美元的纪录，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资金流出量也创下 60 亿美元的纪录。

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近日由于土耳其事件的搅动，新兴市场资金再度出现外流。8 月 9 日以来流出金额达到 14 亿美元，其中 13 亿美元资金从股票市场流出。而南非和中国受到的冲击较大，分别有 6 亿美元和 5 亿美元资金流出。其他新兴亚洲经济体包括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国资金流出较为平缓。仅巴西、泰国和卡塔尔少数国家出现资金净流入。

总体而言，与 2018 年年初以来的新兴经济体资金流出相比，土耳其事件引发的新兴经济体整体资金流出较为有限。

（六）世界旅游组织：全球旅游人数再创新高

世界旅游组织近日发布的《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亮点 2018 年版》报告显示，2017 年国际游客数量比上年增长了 7%，为 2010 年以来最大增幅。与此同时，2017 年旅游业出口达到 1.6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部门。

报告指出，2017 年国际游客总数达到 13.23 亿人次，创下自 2010 年以来新高，比上年增加了约 8400 万人次，这已是连续 8 年保持数量增长。统计显示，2017 年世界旅游总支出为 1.3 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约 940 亿美元。中国继续引领全球出境旅游，中国游客 2017 年在国际旅游上花费了 2580 亿美元，几乎占全球旅游总支出的 1/5。2017 年国际旅游收入增长了 5%。除了旅游目的地赚取的 1.3 万亿美元收入外，国际客运还创造了 2400 亿美元，这使旅游出口总额增加到 1.6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创造 40 亿美元。

受全球各地旅游需求上升驱动，2017 年旅游业增长强劲，近年来遭受安全挑战的国家也出现了强劲复苏。新兴经济体巴西和俄罗斯旅游市场表现突出。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美智库：中国城市化进程已处于全球增长前沿

近期，被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大城市监测报告》，报告采用牛津经济研究院数据，以人均 GDP 和就业增长率为指标，评估了过去几年全球 300 个大城市的总体表现。从数据来看，中国大城市的表现在所有国家乃至地区中最为抢眼，发展势头十分强劲。成都的表现尤为亮眼，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在中国所有上榜城市中排名第一位。

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城市已处于全球增长的前沿，但许多城市仍然鲜为人知。为了分析这些城市的变化，布鲁金斯学会根据城市规模、产业构成和增长模式，将 103 个中国城市分成了五个类型。两个巨头城市（北京、上海）、14 个主要城市（包括成都等 9 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以及 5 个沿海港口型城市）、6 个老牌资源型城市，剩下的 81 个城市则按照服务和工业占比划分，24 个城市被划分为服务型城市，57 个则被划分为工业型城市。

分析认为，自 2000 年以来，这五种类型的城市显示出了独特的就业和人均 GDP 增长模式。虽然北京和上海从规模上来讲仍然具有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但它们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成都在内的 14 个主要城市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主要城市通常是区域交通枢纽，拥有发达的国际机场、高速铁路或海港，在产业发展和布局上也更加清晰。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范围看，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这也确保了其城市将共同塑造和定义与之匹配的基础设施、技术和经济增长模式。而且由于这些中国城市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的重要地位，它们的持续演变也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键因素。

（二）麦肯锡：中国银行业应积极布局生态圈战略

麦肯锡 2018 年 8 月 14 日发布报告《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中国银行业布局生态圈正当时》。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应积极布局生态圈战略以实现转型，报告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提出了具有行动性和实操性的策略方法。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放缓、利率市场化、金融和技术脱媒、金融去杠杆等严峻挑战，中国银行业 ROE 持续下滑，长久以来的业务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拥有大量生态圈场景的互联网企业将金融产品嵌入生态，掠夺传统银行业客户，从多方面对银行造成冲击，中国银行业全面转型刻不容缓。在围绕零售银行、公司与投资银行、中小企业、金融市场与大资管、人力、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等七大核心领域的转型策略中，生态圈战略是近年来热门的转型主题之一。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表示："生态圈是行业价值链各环节参与者聚合成的广泛、动态的联盟。对于银行而言，生态圈的精髓是通过金融 + 场景的方式服务客户端到端的金融相关需求。生态圈战略能够帮助银行提升经营客户和经营风险这两大核心能力，改善银行经营的基本面；此外，由于互联网企业在资本市场估值普遍较高、银行业估值普遍较低，银行向生态圈战略进军也能提振资本市场对其的估值。"

麦肯锡认为，银行业生态圈战略选择与推动实施须秉持三大核心原则：积极发挥银行对公业务的优势，连通 B（企业、商户）端、G（政府及公共事业）端、C（消费者）端生态圈各相关方；以解决生态圈参与方的痛点为导向，而不仅是销售金融服务；重视生态圈参与方的客户体验。

结合中国市场的特色，银行业生态圈战略的未来充满想象空间。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钟惠馨表示："当前 C 端优质场景资源稀缺，银行需尽快抢占优质场景资源，同时勇于开拓 B 与 G 端生态圈蓝海。在线上场景盛行的当下，银行也须重视区域特色的线下生态圈机会。银行系资本活跃参与投资场景公司，但须从思维和组织上进一步调整，确保抓住良机。"

（三）2023 年中国人脸市场份额将达到世界的 44.59%

国际权威市场洞察报告 gen market insights 近期发布了《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研究报告》，分析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状况并进行预测。人脸识别设备源于硬件设备和人工智能软件的组合，通过从图像提取的面部特征与先前存储在人脸数据库中的面部特征进行比较以完成识别过程。随着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奠定了人脸识别的最大消费区位置。

《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研究报告》称，中国 2017 年人脸识别产值占全世界 29.29%市场份额，2023 年将达到 44.59%。报告还提到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云从科技在 2017 年占有 12.88%市场份额（占世界比例），其后的二三名分别是 4.18%的 Aurora 以及 3.31%的浙大网新集团。Aurora 是海外计算机视觉供应商，而浙大网新集团是中国信息技术全案服务商，上市公司，深挖智慧产业和绿色产业。云从科技是中国人工智能国家队，在中国计算机视觉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在金融、安防、交通、新零售、教育、医疗、通信等领域全面发力。《全球人脸识别设备市场研究报告》罗列了人脸识别的应用范围，主要包括安防、金融、交通等领域。随着安全意识的提高，在各个领域人脸识别应用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

该市场报告的研究团队表示，未来该行业有很乐观的增长趋势。全球的人脸识别市场将从 2017 的 10.7 亿美元上升到 2025 年的 71.1 亿美元，并在此期间以每年 26.8%的增量不断提升。

（四）世界黄金协会：中国金饰需求延续复苏态势

世界黄金协会 2018 年 8 月 2 日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第二季度黄金需求依然呈疲软态势，总量滑落至 964 吨，比 2017 年同期下降了 4%。中国第二季度黄金消费需求增长 7%。二季度黄金 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流入平淡，致使上半年黄金需求落至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金饰需求延续复苏态势，第二季度增长了 5%，达到 144.9 吨。截至第二季度末，黄金需求量达到 332.9 吨，创下 3 年新高。

亚洲地区黄金 ETF 持仓量进一步增长，第二季度流入 16.7 吨，将黄金 ETF 总流入量提升至 10.8 吨。投资者将其资金从博时黄金 I 类和 D 类场外份额转入博时开放式基金，从而推动了中国博时黄金 ETF 的持续增长。截至目前，2018 年亚洲地区黄金 ETF 持仓量总体增长了 13%，达到 95.6 吨，中国地区增长量占比最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条和金币市场，第二季度中国金条与金币需求增加 11%至 69.5 吨。中美经贸摩擦引发的不确定性，让中国消费者将金条与金币投资作为财产保值的优选。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二季度有所贬值，上证综指上半年下跌 14%，共同推动了二季度金条与金币需求的同比增长。

“中美经贸摩擦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仍会使中国消费者将金条与金币投资作为财产保值的优选。下半年，中国对金条和金币仍将保持较高需求。”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表示，如果中国央行继续加强对互联网投资产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可能会影响未来中国金条和金币的需求。

（五）IDC：中国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来临

全球知名信息技术咨询公司 IDC 近日发布了《2018 中国企业数字化发展报告》，印证了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来临的大趋势。近几年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逐年增加，至 2017 年已经达到 32.9%，规模达 27.2 万亿元。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美、德、英）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超过 50%，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市场增速将近 20%，已经超过上述发达国家。IDC 预测，2021 年全球至少 50%的 GDP 将以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数字技术将全面渗透各个行业，并实现跨界融合和创新。

IDC 报告通过对六大重点行业的 100 家大型企业调研显示，依赖资源和行政推动力的行业，如政府机构和制造业，数字化程度仍然较低，超过 50%的中国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尚处于单点试验和局部推广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巨大。数据显示，2017 年制造业产值占中国 GDP 的 29.3%。IDC 认为，在全球制造业迈向新一轮发展的趋势下，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智能制造，成为当前中国制造行业的数字化重点。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估计值	2018 年预测值	2019 年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7 月)				
世　界	3.2	3.7	3.9	3.9
发达国家	1.7	2.4	2.4	2.2
美　国	1.5	2.3	2.9	2.7
欧元区	1.8	2.4	2.2	1.9
日　本	1.0	1.7	1.0	0.9
发展中国家	4.4	4.7	4.9	5.1
印　度	7.1	6.7	7.3	7.5
俄罗斯	-0.2	1.5	1.7	1.5
巴　西	-3.5	1.0	1.8	2.5
世界银行(WB,2018 年 6 月)				
世　界	2.4	3.0	3.1	3.0
发达国家	1.7	2.3	2.2	2.0
发展中国家	3.7	4.3	4.5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8 年 8 月)				
世　界	2.5	3.2	3.3	3.1
美　国	1.6	2.2	2.9	2.6
欧元区	1.9	2.5	2.1	1.8
日　本	1.0	1.7	1.1	1.2
印　度	7.1	6.7	7.4	7.5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估计值	2018 年预测值	2019 年预测值
世　界	2.2	5.1	4.8	4.5
发达国家	2.2	4.2	4.3	4.0
发展中国家	2.2	6.7	5.7	5.4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 年 7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6 年	2017 年估计值	2018 年预测值	2019 年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7 月)				
世界	2.8	3.1	3.5	3.4
发达国家	0.8	1.7	2.2	2.2
发展中国家	4.3	4.0	4.4	4.4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8 年 9 月)				
世　界	2.5	2.5	2.9	2.7
美　国	1.3	2.1	2.5	2.3
欧元区	0.2	1.5	1.7	1.6
日　本	-0.1	0.5	0.9	1.1
印　度	4.5	3.6	4.9	4.8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7 年	2.2	1.6	3.4
8 月	2.3	1.4	3.3
9 月	2.3	1.5	3.4
10 月	2.3	1.5	3.5
11 月	2.4	1.6	3.3
12 月	2.3	1.6	3.3
2018 年			
1 月	2.4	1.6	3.4
2 月	2.3	1.4	3.3
3 月	2.4	1.4	2.9
4 月	2.2	1.6	2.8
5 月	2.1	1.9	3.0
6 月	2.4	2.1	3.2
7 月	2.4	2.2	3.1
8 月	2.5	2.1	3.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球 PMI	产出指数	新订单指数
2017 年	3.7	3.1	5.2			
8 月	3.8	3.1	5.6	53.1	53.7	54.2
9 月	3.6	2.0	5.7	53.2	53.9	53.7
10 月	4.9	3.8	5.2	53.4	53.7	54.1
11 月	4.8	3.9	5.4	54.0	54.9	55.1
12 月	3.7	2.1	5.0	54.5	55.5	55.8
2018 年						
1 月	5.5	4.2	7.0	54.4	55.6	55.4
2 月	4.3	2.8	6.4	54.1	54.8	55.0
3 月	2.8	0.8	4.9	53.3	53.4	53.7
4 月	5.5	5.1	6.7	53.5	53.9	53.8
5 月	4.2	2.1	5.4	53.1	53.4	53.4
6 月	3.4	2.4	5.0	53.0	53.2	52.9
7 月	4.8	4.1	5.8	52.7	53.0	52.5
8 月				52.5	53.1	52.4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6	2.7	1.4
3 季度	1.9	2.7	1.0
4 季度	1.8	2.6	0.2
2017 年	2.2	2.5	-0.1
1 季度	1.8	1.8	-0.8
2 季度	3.0	2.9	0.0
3 季度	2.8	2.2	-1.0
4 季度	2.3	3.9	2.4
2018 年			
1 季度	2.2	0.5	1.5
2 季度	4.2	3.8	2.5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7	-0.1	1.9
3 季度	3.2	6.1	4.9
4 季度	1.7	-3.6	6.2
2017 年	4.8	3.0	4.6
1 季度	9.9	5.0	4.8
2 季度	4.3	3.6	2.5
3 季度	2.6	3.5	2.8
4 季度	6.2	6.6	11.8
2018 年			
1 季度	8.0	3.6	3.0
2 季度	6.4	9.3	-0.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6	2.7	1.4
3 季度	1.5	2.7	1.1
4 季度	1.9	2.8	0.9
2017 年	2.2	2.5	-0.1
1 季度	1.9	2.6	-0.1
2 季度	2.1	2.5	0.1
3 季度	2.3	2.4	-0.4
4 季度	2.5	2.7	0.1
2018 年			
1 季度	2.6	2.4	0.7
2 季度	2.9	2.6	1.3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7	-0.1	1.9
	3 季度	1.5	1.2	1.4
	4 季度	2.4	0.8	3.1
2017 年		4.8	3.0	4.6
	1 季度	4.3	2.6	4.1
	2 季度	4.7	2.7	4.6
	3 季度	4.6	2.1	4.1
	4 季度	5.7	4.7	5.4
2018 年				
	1 季度	5.2	4.3	5.0
	2 季度	5.7	5.7	4.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7 年			1.2	4.4	218.8
	8 月			4.4	22.1
	9 月	2.3	1.4	4.2	1.4
	10 月			4.1	27.1
	11 月			4.1	21.6
	12 月	-0.3	1.0	4.1	17.5
2018 年					
	1 月			4.1	17.6
	2 月			4.1	32.4
	3 月	0.3	1.0	4.1	15.5
	4 月			3.9	17.5
	5 月			3.8	26.8
	6 月	2.9	1.3	4.0	20.8
	7 月			3.9	14.7
	8 月			3.9	20.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7 年	24501		3.0	33087		4.6	-8587
7 月	1952	0.2	4.8	2394	-0.1	5.3	-442
8 月	1956	0.2	4.0	2398	0.2	4.4	-442
9 月	1984	1.4	5.0	2428	1.3	6.5	-444
10 月	1986	0.1	6.3	2456	1.2	7.1	-470
11 月	2023	1.8	9.1	2512	2.3	8.5	-490
12 月	2050	1.3	7.8	2569	2.2	9.7	-519
2018 年							
1 月	2020	-1.5	5.5	2543	-1.0	6.7	-523
2 月	2055	1.7	6.8	2604	2.4	10.1	-549
3 月	2100	2.2	9.1	2567	-1.4	8.6	-467
4 月	2105	0.3	9.5	2560	-0.2	7.5	-455
5 月	2147	2.0	11.4	2572	0.5	7.8	-425
6 月	2132	-0.7	9.5	2589	0.7	8.1	-457
7 月	2111	-1.0	8.2	2612	0.9	9.1	-501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4718	2893	1825
	3 季度	1094	852	242
	4 季度	541	406	135
2017 年		2773	3004	-231
	1 季度	897	1263	-366
	2 季度	856	431	425
	3 季度	646	703	-57
	4 季度	374	608	-234
2018 年				
	1 季度	572	-1232	1804
	2 季度	-95	-541	44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3 季度	0.3	0.3	0.2
4 季度	0.8	0.6	0.3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0.7	0.4	0.2
2 季度	0.7	0.5	0.4
3 季度	0.7	0.4	0.4
4 季度	0.7	0.2	0.2
2018 年			
1 季度	0.4	0.5	0.1
2 季度	0.4	0.2	0.4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3.7	3.0	4.0
3 季度	1.0	0.3	0.7
4 季度	1.3	1.5	1.8
2017 年	2.5	5.2	3.9
1 季度	-0.6	1.9	0.6
2 季度	1.9	1.1	1.1
3 季度	-0.1	1.3	0.6
4 季度	1.4	2.1	1.3
2018 年			
1 季度	0.3	-0.7	-0.3
2 季度	1.2	0.6	1.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7 年		0.8	241.1	9.1
7 月				9.1
8 月				9.0
9 月	0.3	0.9	63.7	8.9
10 月				8.8
11 月				8.7
12 月	0.4	0.9	46.6	8.6
2018 年				
1 月				8.6
2 月				8.6
3 月	0.0	0.6	64.8	8.5
4 月				8.4
5 月				8.2
6 月	0.0	0.7	56.6	8.2
7 月				8.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3 季度	1.7	1.8	1.8
4 季度	2.0	1.9	1.6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2.0	1.6	1.0
2 季度	2.5	1.8	1.1
3 季度	2.8	1.9	1.3
4 季度	2.7	1.5	1.2
2018 年			
1 季度	2.4	1.6	1.1
2 季度	2.1	1.3	1.1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3.9	2.9	4.1
3 季度	5.5	2.9	4.7
4 季度	4.0	3.6	4.2
2017 年	2.5	5.2	3.9
1 季度	2.7	4.9	4.3
2 季度	3.6	4.8	4.3
3 季度	2.4	5.9	4.2
4 季度	2.6	6.5	3.7
2018 年			
1 季度	3.4	3.8	2.7
2 季度	2.8	3.2	2.7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7 年	21949		7.1	19623		10.0	2327
7 月	1788	-1.0	5.8	1614	1.3	9.2	174
8 月	1834	2.8	7.0	1629	0.8	9.3	206
9 月	1850	0.9	5.2	1612	-1.0	5.6	237
10 月	1811	-2.1	9.1	1634	1.3	10.8	177
11 月	1887	4.2	8.4	1685	3.1	9.3	202
12 月	1920	1.7	0.9	1692	0.4	3.0	227
2018 年							
1 月	1903	-0.9	9.1	1709	1.0	6.2	194
2 月	1839	-3.3	1.8	1658	-3.0	1.8	181
3 月	1863	1.3	-3.3	1672	0.8	-2.0	191
4 月	1873	0.5	8.1	1696	1.4	8.2	177
5 月	1878	0.3	-0.9	1711	0.9	0.6	166
6 月	1908	1.6	5.8	1743	1.8	8.6	165
7 月	1892	-0.8	9.5	1765	1.3	13.4	128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520	960	－440
7 月	－1627	－1645	19
8 月	118	－26	144
9 月	45	140	－95
10 月	339	617	－278
11 月	－7	0	－8
12 月	－350	－254	－96
2018 年			
1 月	14	426	－412
2 月	9	336	－327
3 月	－411	189	－600
4 月	－138	205	－343
5 月	258	92	165
6 月	89	－385	473
7 月	192	－40	23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3 季度	0.3	0.4	0.5
4 季度	0.2	0.0	－0.2
2017 年	1.7	1.0	0.4
1 季度	0.7	0.5	0.3
2 季度	0.5	0.8	0.4
3 季度	0.6	－0.7	0.1
4 季度	0.2	0.3	0.1
2018 年			
1 季度	－0.2	－0.2	0.0
2 季度	0.7	0.7	0.2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1.6
3 季度	0.2	2.3	－0.1
4 季度	0.7	2.7	1.0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0.5	1.9	1.4
2 季度	1.4	0.2	1.9
3 季度	0.1	2.1	－1.5
4 季度	0.0	2.1	3.3
2018 年			
1 季度	0.0	0.6	0.2
2 季度	1.7	0.2	0.9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6 年	1.0	0.1	1.3
3 季度	1.0	－0.1	1.3
4 季度	1.6	0.6	0.2
2017 年	1.7	1.0	0.4
1 季度	1.5	0.8	－0.6
2 季度	1.6	1.8	0.9
3 季度	2.0	0.6	0.6
4 季度	2.0	1.0	0.8
2018 年			
1 季度	1.0	0.1	0.5
2 季度	1.3	0.2	0.3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6 年	1.1	1.7	－1.6
3 季度	1.1	1.3	－3.1
4 季度	1.9	5.4	－1.2
2017 年	2.5	6.7	3.4
1 季度	2.0	6.6	1.5
2 季度	3.3	6.8	4.3
3 季度	2.8	6.9	2.7
4 季度	2.0	6.5	5.3
2018 年			
1 季度	1.4	5.1	3.9
2 季度	2.2	5.0	2.9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7 年	3.3	2.24	2.8
7 月	3.7	2.26	2.8
8 月	4.8	2.22	2.8
9 月	1.1	2.27	2.8
10 月	3.4	2.35	2.8
11 月	1.5	2.34	2.7
12 月	2.2	2.38	2.7
2018 年			
1 月	1.0	2.34	2.4
2 月	1.8	2.30	2.5
3 月	1.3	2.41	2.5
4 月	2.1	2.37	2.5
5 月	1.3	2.34	2.2
6 月	－2.2	2.47	2.4
7 月	1.2	2.42	2.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7 年	782865		11.8	753792		14.1	29073
8 月	66094	1.3	18.1	61968	-0.5	15.5	4126
9 月	65581	-0.8	14.1	63386	2.3	12.3	2195
10 月	67132	2.4	14.0	63617	0.4	19.0	3515
11 月	68265	1.7	16.2	64711	1.7	17.3	3554
12 月	68791	0.8	9.4	68089	5.2	15.0	702
2018 年							
1 月	67966	-1.2	12.3	63969	-6.1	7.8	3998
2 月	67596	-0.5	1.8	68905	7.7	16.6	-1310
3 月	65613	-2.9	2.1	64862	-5.9	-0.5	751
4 月	68516	4.4	7.8	64245	-1.0	6.0	4271
5 月	68035	-0.7	8.1	70736	10.1	14.1	-2701
6 月	67975	-0.1	6.7	67178	-5.0	2.6	796
7 月	68652	1.0	3.9	69675	3.7	14.6	-1023
8 月	68920	0.4	6.6	70823	1.6	15.4	-1904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1179	189450	-168271
	7 月	642	12695	-12053
	8 月	2354	8472	-6118
	9 月	-1109	15365	-16474
	10 月	1828	9869	-8041
	11 月	1961	8487	-6526
	12 月	4847	27409	-22562
2018 年				
	1 月	-2164	17179	-19343
	2 月	1485	10285	-8800
	3 月	5233	13257	-8024
	4 月	-1011	12636	-13647
	5 月	7835	13486	-5651
	6 月	2567	18900	-16333
	7 月	3469	14804	-11335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6 年		1.4	1.8	0.3	-3.6	7.1	-0.2
	3 季度	1.5	1.7	0.9	-2.7	7.6	-0.2
	4 季度	2.0	1.7	1.0	-2.5	6.8	0.4
2017 年		3.1	1.7	1.3	1.0	6.3	1.6
	1 季度	2.3	1.8	1.0	0.0	6.1	0.6
	2 季度	3.8	1.8	1.2	0.4	5.6	2.5
	3 季度	3.1	1.7	1.6	1.4	6.3	2.2
	4 季度	3.0	1.3	1.4	2.1	7.0	0.9
2018 年							
	1 季度	2.3	1.2	0.8	1.2	7.7	1.3
	2 季度	1.9	1.3	0.4	1.0	8.2	1.8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6 年		2.8	2.3	2.0	1.5	4.2	5.0
	3 季度	2.6	2.0	2.2	2.0	4.3	5.0
	4 季度	2.6	3.3	3.4	2.8	4.5	4.9
2017 年		3.1	2.1	3.8	2.9	5.9	5.1
	1 季度	2.9	3.3	4.4	2.6	5.6	5.0
	2 季度	2.7	1.8	3.9	2.3	5.8	5.0
	3 季度	3.8	1.6	3.6	3.2	6.2	5.1
	4 季度	2.8	1.5	3.4	3.4	5.9	5.2
2018 年							
	1 季度	2.8	1.4	4.6	3.0	5.4	5.1
	2 季度	2.9	2.6	3.5	3.3	4.5	5.3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7 年		6.4	4.5	12.8	5.2	27.5
	8 月	6.2	4.3	12.6	4.9	
	9 月	6.2	4.3	12.4	5.0	27.7
	10 月	6.3	4.3	12.2	5.1	
	11 月	5.9	4.3	12.0	5.1	
	12 月	5.8	4.4	11.8	5.1	26.7
2018 年						
	1 月	5.9	4.3	12.2	5.2	
	2 月	5.8	4.2	12.6	5.0	
	3 月	5.8	4.2	13.1	5.0	26.7
	4 月	5.8	4.2	12.9	4.9	
	5 月	5.8	4.2	12.7	4.7	
	6 月	6.0	4.0	12.4	4.7	27.2
	7 月	5.8	4.0	12.3	4.7	
	8 月	6.0			4.6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7 年		3.7	3.4	3.1	3.8	3.4
	8 月	3.8	3.5	3.1	3.8	3.4
	9 月	3.7	3.6	3.1	3.7	3.4
	10 月	3.6	3.5	3.0	3.7	3.4
	11 月	3.7	3.4	3.0	3.7	3.4
	12 月	3.7	3.1	2.9	3.7	3.3
2018 年						
	1 月	3.6	3.4	2.9	3.7	3.4
	2 月	3.6	3.2	2.9	3.7	3.3
	3 月	4.0	2.9	2.9	3.7	3.3
	4 月	3.8	3.4	2.8	3.7	3.3
	5 月	4.0	3.2	2.8	3.7	3.3
	6 月	3.7	3.4	2.8	3.7	3.4
	7 月	3.8	3.5	2.8	3.7	3.4
	8 月	4.2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4212	4325	－114	4410	6441	－2030
7 月	323.4	347.9	－58.1	388.9	515.2	－126.4
8 月	346.2	381.6	－28.2	336.7	541.6	－204.9
9 月	350.3	374.4	－18.8	376.8	618.2	－241.4
10 月	362.0	369.1	－20.2	389.8	590.1	－200.3
11 月	366.2	382.2	12.1	396.6	578.7	－182.1
12 月	361.1	354.1	8.7	385.5	525.3	－139.7
2018 年						
1 月	364.8	352.4	－41.9	402.8	598.7	－196.0
2 月	336.6	351.8	－15.2	381.9	528.7	－146.8
3 月	384.9	406.7	－21.8	440.1	601.2	－161.1
4 月	373.0	394.4	－21.3	394.7	554.2	－159.5
5 月	394.4	412.7	－18.3	404.9	538.4	－133.4
6 月	398.7	401.2	－2.6	419.0	555.7	－136.8
7 月	371.1	377.6	－6.4	415.6	553.3	－137.7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888	830	59	2178	1507	670
8 月	78.7	73.6	5.1	194.8	145.2	49.6
9 月	78.5	74.3	4.2	186.7	141.1	45.6
10 月	75.8	72.7	3.1	188.8	142.8	46.0
11 月	82.8	73.4	9.4	166.9	137.3	29.6
12 月	77.6	67.0	10.6	176.0	131.9	44.1
2018 年						
1 月	66.0	88.5	－22.5	169.7	148.5	43.4
2 月	76.0	76.5	－0.5	173.2	129.8	56.7
3 月	82.9	75.1	7.8	200.9	144.2	55.2
4 月	73.1	72.1	1.0	199.3	144.2	55.2
5 月	82.1	79.0	3.1	191.3	138.6	52.7
6 月	82.7	73.8	8.9	200.7	149.7	51.0
7 月	79.9	83.4	－3.5	227.6	195.0	32.6
8 月				225.5	196.3	29.2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2991	4473	－1446	3535	2378	1158
8 月	233.0	360.5	－127.5	390.8	224.2	166.6
9 月	286.5	379.2	－92.7	308.0	205.6	102.4
10 月	228.5	374.6	－146.1	315.8	215.0	100.8
11 月	260.9	404.2	－143.3	334.4	219.0	115.5
12 月	276.8	419.1	－142.3	375.3	241.5	133.9
2018 年						
1 月	249.6	406.6	－157.1	336.9	164.0	172.9
2 月	260.3	378.7	－118.4	313.3	190.4	122.9
3 月	291.7	428.0	－136.3	368.7	218.3	150.4
4 月	256.4	396.0	－139.6	362.5	209.3	153.2
5 月	289.9	438.9	－149.1	365.1	213.6	151.5
6 月	273.3	448.1	－174.8	365.7	210.2	155.6
7 月	258.9	437.9	－179.0	344.3	210.3	134.0
8 月	278.4	452.4	－174.0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5737	4785	952	4095	4322	－227
8 月	471.1	405.5	65.6	357.8	396.2	－38.4
9 月	551.2	417.0	134.2	338.2	367.3	－29.1
10 月	447.9	378.6	69.3	367.2	400.7	－33.5
11 月	497.1	420.1	76.9	374.9	381.1	－6.2
12 月	490.4	435.3	55.1	359.8	370.0	－10.2
2018 年						
1 月	492.3	457.4	34.9	307.2	361.2	－54.0
2 月	445.3	417.1	28.2	350.8	350.5	0.3
3 月	513.3	448.8	64.5	394.5	387.0	7.4
4 月	498.7	435.6	63.1	371.8	384.4	－12.6
5 月	507.1	443.3	63.7	391.8	418.3	－26.6
6 月	511.3	449.9	61.4	374.8	394.0	－19.1
7 月	518.2	449.5	68.7	367.2	406.6	－39.4
8 月	512.0	443.5	68.5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5503	5899	－396	3174	2595	579
8 月	463.7	491.8	－28.1	277.7	220.6	57.1
9 月	496.3	526.2	－30.0	289.0	222.8	66.2
10 月	464.6	503.8	－39.2	275.4	223.4	52.0
11 月	502.6	553.2	－50.6	288.8	229.1	59.7
12 月	490.8	553.5	－62.6	295.1	233.7	61.4
2018 年						
1 月	483.9	521.4	－37.6	273.8	247.0	26.9
2 月	337.0	387.5	－50.5	223.6	192.9	30.7
3 月	486.7	546.1	－59.4	299.9	239.8	60.1
4 月	460.0	498.5	－38.5	267.3	225.6	41.7
5 月	485.4	521.3	－35.9	291.2	247.1	44.1
6 月	482.2	532.3	－50.1	282.4	230.3	52.1
7 月	489.9	541.1	－51.2	283.6	261.2	22.4
8 月				283.0	237.7	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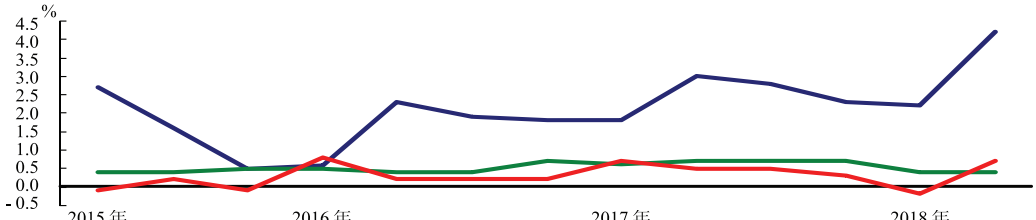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 年	2178	1951	227	1686	1569	117
8 月	192.1	168.7	23.4	152.3	135.1	17.2
9 月	185.9	165.5	20.5	145.6	127.8	17.8
10 月	194.6	169.9	24.7	150.9	142.4	8.5
11 月	200.2	176.3	23.9	153.2	151.1	2.2
12 月	194.5	176.8	17.8	147.9	150.9	－3.0
2018 年						
1 月	209.3	184.8	24.4	145.5	153.1	－7.6
2 月	179.8	156.8	23.1	141.3	141.9	－0.5
3 月	216.4	178.8	37.6	155.9	144.6	11.2
4 月	216.8	183.3	33.5	145.4	161.6	－16.3
5 月	207.2	186.7	20.5	162.1	176.6	－14.5
6 月	196.5	181.5	15.0	129.7	112.7	17.1
7 月	212.7	192.2	20.5	162.9	183.0	－20.1
8 月				158.2	168.4	－10.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2015 年 Q2	Q3	Q4	2016 年 Q1	Q2	Q3	Q4	2017 年 Q1	Q2	Q3	Q4	2018 年 Q1	Q2
美国	2.7	1.6	0.5	0.6	2.3	1.9	1.8	1.8	3.0	2.8	2.3	2.2	4.2
欧元区	0.4	0.4	0.5	0.5	0.4	0.4	0.7	0.6	0.7	0.7	0.7	0.4	0.4
日本	-0.1	0.2	-0.1	0.8	0.2	0.2	0.2	0.7	0.5	0.5	0.3	-0.2	0.7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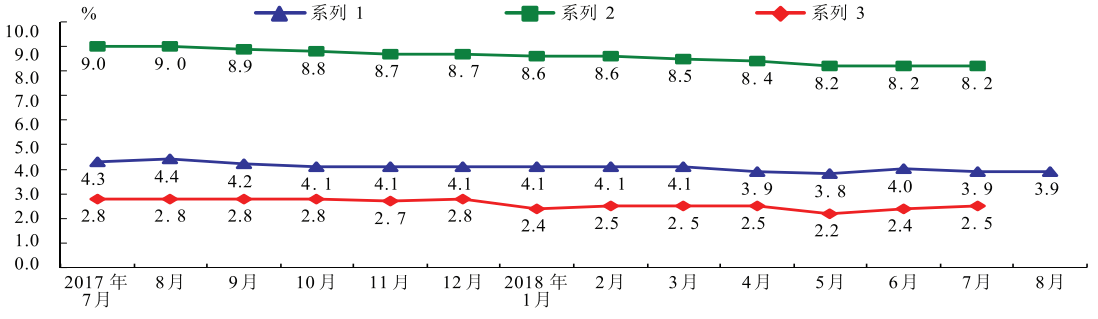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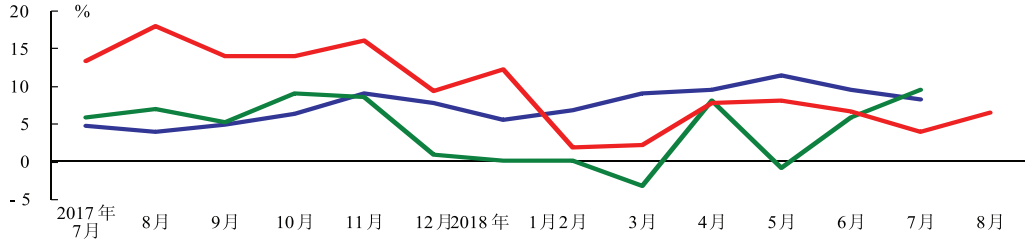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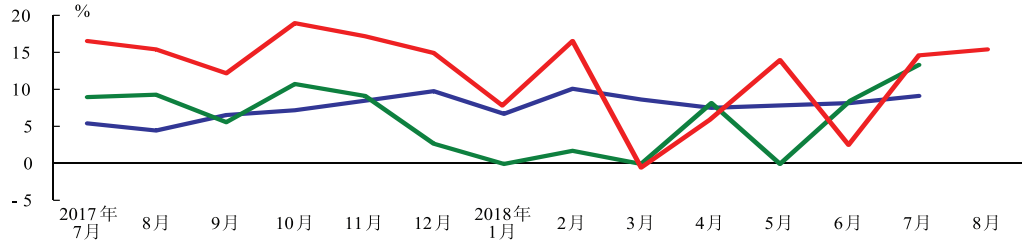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2017 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8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美国	4.8	4	5	6.3	9.1	7.8	5.5	6.8	9.1	9.5	11.4	9.5	8.2	
欧元区	5.9	7	5.2	9	8.6	0.9	0.0	0.0	-3.3	8.1	-0.9	5.8	9.5	
日本	13.4	18.1	14.1	14	16.2	9.4	12.3	1.8	2.1	7.8	8.1	6.7	3.9	6.6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2017 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8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美国	5.3	4.4	6.5	7.1	8.5	9.7	6.7	10.1	8.6	7.5	7.8	8.1	9.1	
欧元区	9.1	9.3	5.6	10.8	9.2	2.7	0.0	1.8	0.0	8.2	0.0	8.6	13.4	
日本	16.5	15.5	12.3	19	17.3	15	7.8	16.6	-0.5	6.0	14.1	2.6	14.6	15.4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Globalization
Monthly
No. 10
October 2018

ABSTRACTS

(1)The compi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Ninth and Tenth Five-Year Plans

Cao Wenlian and Zhang Liwei

The Ninth Five-Year Plan was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fter the goal of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our country, so it embodi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orm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was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and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t was also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o beg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ird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and after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formulation of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took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s the main lin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well 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2018 is the year of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compilation stag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ummarize and review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publish this special article written by Wenlian Cao and Liwei Zhang.

(2)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Huo Jianguo

China's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re inseparable from China's continuous and in-depth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s early as in the beginning of 1980s, China resumed contacts and exchanges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ose relevant representatives conducted frequent communications with China's leaders and officials in char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xplore ways and mean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ing exer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in China. Fifteen years of long negotiations to join the WTO an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have formed important experiences of successful development where opening up promotes reform while reform promotes opening up.

(3)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status and func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ng Changyun and Liu Zhenzhong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5 stages. By analyzing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industry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changes of its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that is,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hat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depth,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promoted in accordance with situation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 and policy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form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demand is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reating demand and guiding demand;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guida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this basis, several judgments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re put forward: the slow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widening gap with the second industry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it is increasingly urgent to improv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in service industry;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whole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should be viewed objectively and avoid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even the whole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industry-oriented to service-oriented is still in progress, and it is biased to simply deny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reform and supervision mode innov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4)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China's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e new era

Yang Danhui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ome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s shrunk, the growth rate of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has slowed, and the global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s facing deep adjustment; on the other hand, countries generally use industrial policy tools to promote investment, foreign capital policy orientation is generally more active, and the competition of attracting foreign capital is intensified worldwide. In the new era,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for China to utilize foreign capital have been changed dramatic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policies of foreign capi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steadily increased and its structure has been optimized. Howeve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bsorbing foreign capital among regions has intensified,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Facing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Sino-US trade war, we should seize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of the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round of major measures of opening up, innovate the ways of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broaden the field of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While opening the door wider and wider to provide mo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investors, we will strive to maintain the activity of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and constantly enhance China's attrac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host country.

(5) China's undertaki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service outsourcing promotes the new pattern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up

Zhu Ful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thus providing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alyz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ervice outsourcing development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comprehensive pattern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up, and provide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development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6)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Yu Qian and Hou Yusha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time series co - integration model analysis into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effect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 using 2007 - 2016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7) The evaluation,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ssue of China's economy leaving real for virtual

Zhang Huanbo, Sun Xiaotao and Guo Yingfeng

For the first time, China established the index system to assess the economy moving from real to virtual. The index based on data from 2010 to 2017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 - realism to virtual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efore 2016, where the index of "financial system self - circulation" has the largest increase, indicating that the biggest problem of economic de - realism to virtual is the futile circulation and transfer of fund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oot cause of China's economic de - realism to virtual is that the "real" sector is relatively dull while the "virtual" sector is relatively activ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public resources, such as fiscal revenue, to the real economy and weak links, standardize the government financing platform, and strengthen the macro - control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of bank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financial service capacity in the counties.

Editor: Huang Yongfu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83362183